

武大校友通讯

2020 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主 编 邓小梅
执行主编 陈东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新才 邓小梅 叶琳娜
刘赛男 肖艾芹 吴根友
张发林 陈东华 陈 纲
金 诚 胡庆方 涂上飙
涂险峰 潘迎春



目 录

卷首语

2021，于变局中开新局 ………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3)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 2019 年十大新闻 …………… (7)

武汉大学 2019 年度新闻人物：苏德超

——将冷门课讲成“校红课” …………… (12)

武汉大学 2020 年十大新闻 …………… (14)

武汉大学 2020 年度新闻人物：王行环

——临危受命勇担当 …………… (19)

武汉大学隆重举办校友抗疫表彰大会 …………… (21)

八位校友当选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校友 …………… (33)

珞珈风采

陈晓红：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的首位华人经济学家

…………… 武大新闻网(41)



勇立潮头敢争先 挥斥方遒开天地

——记冷冻电子显微学家程亦凡博士

.....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46)

刘经南：一句话，一辈子 刘志伟 吴江龙(51)

童朝晖：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 曾德军(56)

于刚：人生无处不可能 温才妃(60)

武汉依然如此美丽

——在武汉大学校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 阎志(68)

宗福邦：毕生年华，尽付冷门绝学 陈菁霞(73)

张继先：“疫情上报第一人” 付晓歌(82)

珞珈记忆

曾绽放在武大的三朵金陵女大玫瑰 陈超(93)

中国“绿色”化学的先驱和斗士

——忆我的导师张俐娜院士 蔡杰(103)

真正“富有”的是杰哥 侯焕昌(108)

我的恩师朱英国院士 黄文超(113)

追忆“火星院士”万卫星 李晨阳 丁佳(121)

我的导师宁津生院士 李建成(129)

追忆美学家刘纲纪 李伟(140)

深切怀念保宗梯老师 李亚相(147)

忆武大老校长李达 刘怀俊(150)

跟随查全性老师半世纪 陆君涛(159)

我和导师陶德麟先生的师生情 倪素香(164)

我的老师李龙先生 孙来清(173)

石屋二老：纪念任凯南、李剑农两教授 夏道平(179)

送别好领导好朋友陈继勇教授 张艳国(184)



- 师教如甘露 浸沐益终生 保宗悌 (189)
- 我的老师 我的母校 陈东升 (194)
- 在珞珈山偶遇名师 珈言 (199)
- 曾经在武汉大学工作学习过的黄冈名流们
..... 李云贵 何飞 (205)
- 再遇名师 齐邦媛 (213)
- 我的恩师桂希恩 杨蓉蓉 (216)
- 沐浴在自由的芬芳里歌唱
——创作《珞珈赋》的回忆兼答刘道玉老校长 ... 何五元 (219)
- 难忘的青春记忆 永远的珞珈情怀 王世进 (229)
- 我记忆中的作家班 於可训 (234)
- 百年信管 盛世华章
——从昙华林到珞珈山 方卿 傅兴荣 (241)
- 珞珈山十八栋的前世今生 涂上飙 (251)
- 历史瑰宝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 文妍 (263)
- 最忆珞珈桂花香 周斌男 (269)

珞珈文苑

- 我疫情下的双城生活 王晓莉 (273)
- 立鸿鹄志 怀不屈心
——谨以此文致谢师朋亲友 朱良 (278)
- 武大之忆
——写在七九级大聚会之后 陈刚 (281)
- 七绝·望乡 曹海钧 (283)
- 逆光的翅膀 陈勇 (284)
- 思武大 怀故人 邓新光 (287)



自醒书	方 舟(288)
我和你们	胡 光(289)
送友援鄂	卢基林(290)
我不会告诉你	李立屏(291)
珞珈山的樱花	李少君(293)
回珞珈山, 见你	梅 朵(295)
保卫春天	牧 南(297)
逆行者: 以战士的名义集结阵地	
——献给抗疫第一线的白衣战士(节选)	王法艇(300)
请明月向世人捎去今夜武汉的问候	吴根友(303)
浪淘沙令	王新才(305)
一封珞珈游子的来信	谢春枝(306)
走在樱的身边	远 洋(308)
久违了, 珞珈山	周中华(310)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312)
征订征稿启事	(313)
关于进行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315)

卷首语





2021，于变局中开新局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当新年的阳光驱散冬天的寒冷，在2021年的第一天，我们一如既往地全校师生员工、向离退休老同志、向海内外校友，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我们刚刚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而至，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局与挑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发挥强大的行动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抗击新冠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并率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恢复经济正增长。

面对新冠病毒肆虐，我们武大人迎难而上、主动担当，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舍生忘死，科研人员争分夺秒、攻坚克难，无数校友千里驰援、守望相助，师生员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书写了无数感人的故事，彰显了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学校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一年来，新增高层次人才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在NSC发表高水平成果数取得新的突破，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项目数创历史新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位居全国高校第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武汉光源、重离子医学中心等重大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2020年是阻击新冠疫情的“大考之年”，也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回望过去五年，学校对标世界一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取得了三个可喜的实质性改变。

五年来，学校聚焦办学核心要素，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产生



的办学成效逐渐显现，高水平人才在数量和占比上实现双倍增，有力带动了高水平成果产出、国家重大项目数等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五年来，学校认真落实师生主体地位，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和人才事业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形成了更加关爱学生、更加尊重学者、更加崇尚学术的浓厚氛围。

五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一流办学标准，积极推进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和管理服务意识深入人心。

回首过往，坚持与感动并存，汗水与喜悦交织。我们取得的点滴成绩，无不凝聚着全体师生员工的勤劳智慧，无不饱含着广大校友的深情厚谊。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向所有奋斗中的武大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武大发展的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展望未来一个时期，“变”仍将是全球最瞩目的主题。看世界，疫情远未结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看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交汇，国家即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看武大，“双一流”建设进入攻坚期，学校改革发展任务依然繁重，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2021年，我们将把握好新阶段的历史新机遇，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全力推动“双一流”建设再上新台阶。

2021年，我们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努力争取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在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在国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中有更大的作为。

2021年，我们将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为契机，完善科学的评价体系，构建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内部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事业不仅在于谋划，更要实干。我们即将踏上“十四五”发展的新征程，我们相信，只要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就能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武大的明天更加美好！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 2019 年十大新闻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学校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经过严格认真评审，评出了“武汉大学 2019 年十大新闻”和“武汉大学 2019 年度新闻人物”。分别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风雨见证珞珈万人毕业盛典；世界第三例大陆首例，人民医院成功实施心脏+主动脉移植；我校承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赛事；武大 3 项成果获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排名我校蝉联第一；武汉大学首次举办引进人才入职典礼；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武大师生以多种形式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协作实验室学生竞赛武大夺冠。年度新闻人物：苏德超。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这次党代会是学校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全面总结了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新时代学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学校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共武汉大学第八届委员会



报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风雨见证珞珈万人毕业盛典

6月21日，暴雨，11000名毕业生和5000多名学生家长与“豪华导师团”一道，风雨无阻，共同参加武汉大学2019年毕业典礼。典礼上，导师团为每位毕业生一一拨穗，授予学位，送上美好祝福，专属摄影师为每位毕业生拍下珍贵时刻，现场气氛热烈而壮观。毕业万人大合唱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第二名。毕业生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毕业典礼庄严盛大，充满仪式感和荣誉感，让他们对进入社会满怀勇气。学校从2017年开始举办由全校毕业生参加的毕业典礼，旨在彰显对学生的重视、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学术的敬仰。

三、世界第三例大陆首例，人民医院成功实施 心脏+主动脉移植

3月13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王志维教授团队为一名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成功实施“原位心脏移植+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联合移植”联合术式，成功拯救患者生命。据文献检索，这一术式此前在中国大陆尚未见报道，世界范围内仅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各有1例报道。

四、我校承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赛事

10月20日至26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武汉大学大学生体育活动中心顺利举行。军运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也是武汉大学首次承接国际体育赛事。为了办好这项赛事，在近两年的筹办工作中，武汉大学举全校之力，以高起点高标准做好各项赛事筹办工作，成立了由校长窦贤康挂帅的军运会羽毛球项目竞赛委员会，组建了一支包含113名P类工作人员、723名V类志愿者的团队，为比赛提供专业的硬



件设施、贴心的赛事服务、严格的安保、完备的网络等，向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水平一流的国际羽毛球赛事。

五、武大3项成果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月8日，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校3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施闯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高精度位置网及其在交通领域的重大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姜卫平教授主持完成的“海洋测绘和内陆水域监测的卫星大地测量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朱欣焰教授团队参与完成的“复杂大电网时空信息服务平台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六、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排名我校蝉联第一

2月22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2014—2018年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我校以429项获奖总数、总成绩98.33分，居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全国综合排名第三位。同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2012—2018年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武汉大学蝉联第一。5月27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我国首个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武汉大学位居第四，在综合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中位居第三。

七、武汉大学首次举办引进人才入职典礼

4月12日，武汉大学首次引进人才入职仪式在樱顶校史馆隆重举行，此举旨在以学校最高礼制，表达学校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并希望能够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加盟武大。作为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我校把人才工作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近年来，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在吸引人才、培育人才方面成效显著，新增“国字号”人才数量增长一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



力显著提升。

八、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8月16日，由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李纲教授作为学术负责人牵头申报的“信息资源管理”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金额为670万元。这是国内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获得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资助45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其中管理科学部资助仅3项。

九、武大师生以多种形式庆祝新中国70华诞

今年是新中国70华诞，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烘托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为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学校举办“壮丽七十年奋进武大人”专题图片展、师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拍摄电影《朱英国》、MV《今天是你的生日》、专题片《学盛国斯强》；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研讨会；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上一堂课”活动宣讲“三个为什么”，以及开展征文和演讲比赛等。由我校参与研制的移动测量系统亮相国庆70周年阅兵式，8名师生代表受邀出席国庆相关活动，216人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3月底到4月初，我校作为主要发起高校，发起“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歌活动，唱响礼赞祖国的青春之声。

十、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协作实验室学生竞赛武大夺冠

9月12日至18日，由中国工程院、英国皇家工程院和美国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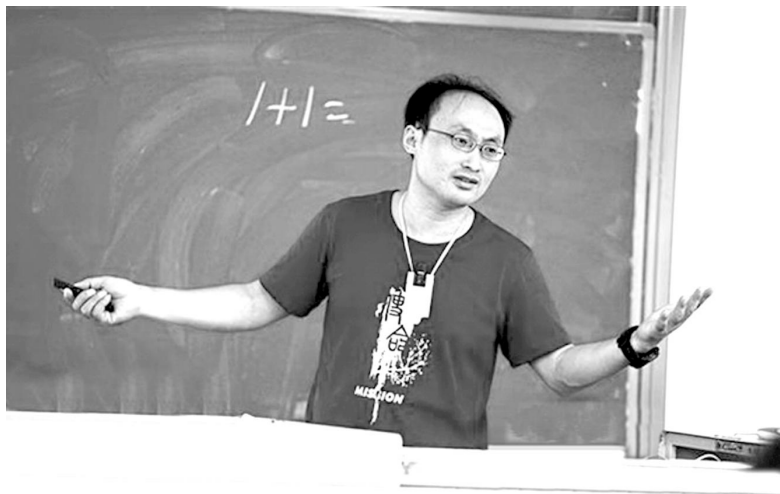
家工程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在英国伦敦举行，我校 2018 级临床八年专业学生洪子茜及所在团队 Empads，在 50 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夺冠。这一年，武大学子在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数学建模竞赛、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给排水科技创新大赛、计算机设计大赛、电子设计竞赛、智能汽车竞赛、电子商务挑战赛、物联网设计竞赛、节能减排大赛、机器人大赛、高校 GIS 大赛等国内外比赛中频获佳绩，充分展示了武大学子的风采。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大学 2019 年度新闻人物： 苏德超

——将冷门课讲成“校红课”



苏德超是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苏德超凭着“爱一行”的真感情和“精一行”的真本领，在三尺讲台上潜心钻研、不断探索、精心授课，把“形而上学”等冷门课程上成了当之无愧的热门课程，给学生以哲学的智慧启迪。苏德超的课引人入胜，经常下课铃响后，一群学生聚到讲台上，把



他围在中间，再讨论上三四十分钟。甚至教学楼熄灯了，学生们还要再拥着他在校园里走上一段路。2019年，他被评为“荆楚好老师”。《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纪检监察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年12月31日)



武汉大学 2020 年十大新闻

一、31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75 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 月，教育部公布 2019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我校申报的 31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及 10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均获批，获批率达 100%，入选数位列全国高校第六位。2 月，在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排名中，我校以奖项数量 126 项、总分 100 分的成绩，连续三年蝉联第一。同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2015—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我校以 599 项获奖总数、98.4 分的成绩居全国综合排名第三位。11 月，75 门课程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入选总数居全国第四位。

二、武汉大学荣获 201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科技工作者荣获多项奖励

1 月，在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武汉大学主持完成的 3 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 1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参与完成的 3 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 1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9 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中，我校获奖 35 项，获奖总数稳居全省前列，其中刘经南院士获突出贡献奖（全省仅 1 人）。此



外，李德仁院士被授予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ISPRS)布洛克金质奖章，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学者；王行环领衔的武汉雷神山医院团队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彭志勇获创新争先奖章，胡钦勇获创新争先奖状；金涛勇获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缪爽获2020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王行环获全国十大“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医护人员坚守抗疫一线， 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荣获表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的医护人员临危不惧，白衣执甲，在战疫最前线书写了令人感佩的武大担当。人民医院除院本部和东院区外，托管武汉市第九医院，主持武昌方舱医院、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光谷日海方舱医院，还支援金银潭医院等。中南医院除院本部外，全面接管雷神山医院，托管武汉市第七医院，主持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人民医院、中南医院检验科党支部获评先进集体，胡克、余锂镭、徐海波、夏剑获评先进个人，余锂镭、夏剑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中南医院检验科党支部获评先进党支部。在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5个集体获评先进集体，16人获评先进个人，2个集体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2人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此外，王行环、李艳获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8位医护人员获“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抗疫特别人物称号。

四、学校启动系列重大科研平台建设， 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学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武汉光源”、重离子医学中心等重大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推进免疫与代谢前沿科学中心、空天信息智能服务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牵头组建湖北珞珈实验室、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成立武大-旁遮普大学红莲型杂交水稻



联合研究中心、中俄极地联合研究中心、喜马拉雅水电研究中心等国际科研平台。科技工作者不断取得新成果：3月，《自然》在线发表了袁声军教授与国内外团队关于石墨烯气体通透极限的研究成果。4月，《自然》在线发表蓝柯教授关于新冠病毒气溶胶动力学分析的研究成果。9月，《自然》在线发表了邓鹤翔、咎菱教授课题组在人工光合作用领域的研究成果。11月，《自然》在线发表宋保亮教授课题组关于胆固醇合成调控新机制的研究成果。此外，我校医学学者也表现不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蓝柯、刘映乐教授等联合团队的论文，《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在线发表彭志勇教授团队的论文和张志将副教授团队的论文，《柳叶刀》在线发表张元珍、侯炜教授等人的论文和王行环教授作为共同通讯作者的论文。

五、云端线下风雨无阻，2020年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6月20日，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在武汉大学举行。这场典礼有660位毕业生代表线下参加，15000余名毕业生通过5G直播共聚“云端”，参加专属于自己的青春盛典，为大学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今年，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举办毕业典礼，正是希望寄托在这场仪式中的武大精神经由毕业生延续和弘扬，同时昭示抗疫胜利，助力武汉重启。今年除毕业典礼外，学校还举办了教职工荣休仪式、学术委员会换届仪式等，充分彰显了学校尊重学者、关爱学生、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

六、武汉大学网络安全学院签约入驻国家网络安全基地

8月28日，武汉大学与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签署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网络安全学院入驻办学协议，正式开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一流网络安全学院新征程。网络安全学院将坚持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实行独具特色的“网络安全学院+创新产业谷”模式，探索产学研协同育人、合作科



研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

七、大型汉语工具书《古音汇纂》面世， 人文社科研究取得系列佳绩

10月30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型古籍工具书《古音汇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由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担任主编，带领古籍整理研究所学者历时22年编纂的鸿篇巨制，与此前出版的《故训汇纂》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今年，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一系列好成绩，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获批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5项，居全国高校第二位；获颁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9项，居全国高校第四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等5类项目数均排名全国高校第一。

八、学校隆重表彰为抗疫做出卓越贡献的校友

11月28日，武汉大学用一场隆重的仪式，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功勋卓著的校友集体、个人及校友之友进行了表彰。在疫情最危急时刻，众多武大校友和校友企业多方奔走、千里驰援，大批医疗界校友战斗在疫情救治一线，多位校友在抗疫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据不完全统计，超过5000名校友参与全球医疗物资采购、运输、调配，捐赠人数超过40万人次，捐赠总额超过12亿元，占武汉市接受捐赠总额的1/4以上。除武汉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武大校友还支援和捐助了湖北省69个地市州县的600多家医疗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

九、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武大成立国际法治研究院、 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跨学科研究平台

11月20日，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成立，这是武汉大学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武汉大学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举措。12月29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湖北省教育厅、文化与旅游厅、武汉大学、在鄂相关高校及湖北省考古文博单位统筹力量共同组建湖北省新时代考古学建设共同体，由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建的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成立。

十、武汉大学蝉联“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12月，我校顺利通过复查，蝉联“全国文明校园”和“湖北省文明校园”荣誉称号，杨昌林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同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蝉联“全国文明单位”和“湖北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自2017年获评首届“全国文明校园”以来，学校深入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行于人人、融于时时、化于事事、见于处处”，为实现学校内涵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一流环境。疫情期间，身处疫情防控“主战场”的武汉大学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新形态，成功实现“停课不停学”。4个党组织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板党支部。学校入选教育部首批师德师风建设基地，成为中部地区唯一入选单位。一批典型人物获表彰：陶德麟教授被教育部追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徐红星院士和龚作炯教授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等。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0年12月31日)



武汉大学 2020 年度新闻人物： 王行环

——临危受命勇担当



王行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教授，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从事泌尿外科医教研工作 30 余年，是泌尿外科微创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4 项)首席科学家、名医百强榜 Top10 Dr. 等，位列中国泌尿外科专家学术影响力第三名(全球学者库 2020 年 8 月发布)。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临床研究成果被国际多种疾病权威指南采纳，主持制定行业标准 7



项，获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 60 余项。领衔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牌；个人获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2020 全国十大“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2020“荆楚好老师”特别奖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临危受命担任雷神山医院院长，将来自 286 家医院的 3202 名医护人员、1000 余名后勤保障志愿者、1.3 万名建设者紧紧凝聚在一起，铸造成一支抗疫精锐之师，取得了近 98% 的救治成功率、医院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环境零污染的抗疫成绩，创造了“雷神山奇迹”。他带领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外科在 2019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榜位列第八名。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大学隆重举办校友抗疫表彰大会

2020年无疑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在武汉、湖北最艰难的时刻，武汉大学校友、社会爱心人士应声而动，倾力相助捐钱物资，爆发出超强能量，用巨大的动员力、超强的行动力为抗疫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武大校友，人人英雄！

为大力弘扬武大校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展示的武大精神，激发广大师生和校友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表达对社会各界的诚挚谢意，11月28日，在127周年校庆前夕，武汉大学用一场隆重的仪式，对在抗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功勋卓著的校友集体、个人及校友之友进行了表彰。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王永辉，校领导韩进、窦贤康、万清祥、吴平、李建成、赵雪梅、沈壮海等出席活动。

200 多位校友、校友之友代表，60 位获得国家或省市级表彰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医护人员代表，以及武汉大学 MBA、EMBA 校友代表，楚商代表，武汉大学各机关直属单位和院系代表，武汉大学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等共襄盛会。

大会以武大校友抗疫宣传片拉开帷幕，宣传片回顾了疫情期间武大校友踊跃捐款捐物、全球采购的真实场景，展现了武大校友众志成城、汇聚一股强大战疫力量的感人壮举。

“武汉，这座屈原留诗、岳飞屯兵、辛亥首义的城市，以危难时刻爆发出的不屈力量，成为中国抗疫斗争的精神坐标。危难之际，武汉大学始终与武汉人民并肩战斗，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共同赋予精神坐标以丰富内涵。”王忠林在讲话中指出，武汉大学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提供重要支撑，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深入科研攻关，积极献言献策，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疫情的钢铁长城，武大校友体现了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球校友纷纷募集物资，捐款捐物超过 12 亿元，提供床位近 6000 张。他强调，武大是世界的武大、全国的武大，更是武汉的武大，支持武大就是支持武汉发展。我们将全力服务武汉大学在汉发展、全力服务武大学子留汉发展、全力服务武大校友回汉发展。武汉会和武汉大学一起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携手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武汉大学在危难时刻坚守教育初心与使命的一次重大考验，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不辜负校友的厚望，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在危急中遇新机，以变局中开新局。”校长窦贤康说，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中，武大校友心中有大爱，心中有责任，肩头有担当，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案，让武汉大学校友成为了光荣的代名词。校友们对母校的热爱，是学校办学最厚重的基石和最坚实的依靠。窦贤康强调，面向未来，武汉梦与武大梦目标一致，起点相同，相互融通，相辅相成。武汉大学在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新征程中，将把伟大的抗疫精神转化



为改革发展的强大势能，把自身发展主动融入复兴大武汉的战略格局中，携手海内外的武大校友主动服务武汉战略发展趋势，为助推武汉加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武汉大学杰出校友、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作为校友代表发言。阎志介绍说，在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次日，他就迅速组织全球采购，先后用 11 架包机将急缺的医疗物资运回武汉，并发动员工分批捐送到湖北的 556 家医疗机构。卓尔倾集团公司之力，设立了 7 家应急医院，搭建起 3 座救命方舱，当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时，又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武汉经验，驰援国际抗疫。最后，阎志用自己原创的诗歌《东湖北岸》歌颂了武汉的美丽，表达了对武汉的热爱。

随后，副校长吴平宣读了表彰文件。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武汉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五个集体获得“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先进集体”称号；艾路明、陈东升、蹇宏、雷军、毛振华、朴钉、孙宏斌、童朝晖、阎志、喻杉、周旭洲、曾文涛、张继先 13 位校友获得“武汉大学校友抗疫杰出贡献奖”（按姓氏拼音排序）；曹照龙、于刚等 46 位校友获得“武汉大学校友抗疫突出贡献奖”；李亦非等 203 位校友获得“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先进个人”称号；朱时茂、陈佩斯等 72 位爱心人士和艾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91 家企业、组织或团体获得“武汉大学抗疫特别公益贡献奖”。之后举行了热烈而庄重的颁奖仪式，到场领导和嘉宾分别为获得以上奖项的集体和个人颁奖。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武大校友捐赠人数超过 40 万人次，捐赠总额超过 12 亿元，占武汉市接受捐赠总额的 1/4。5000 多名校友参与在全球的医疗物资采购、运输、调配，还有一大批无法统计数量的校友投入紧张的志愿服务。除了武汉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武大校友还支援和捐助了湖北省 69 个地市州县的 600 多家医疗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



附：武汉大学校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表彰名单

一、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先进集体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

武汉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

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

二、武汉大学校友抗疫杰出贡献奖(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路明、陈东升、蹇宏、雷军、毛振华、朴钉、孙宏斌
童朝晖、阎志、喻杉、周旭洲、曾文涛、张继先

三、武汉大学校友抗疫突出贡献奖(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照龙、陈锋、陈力、陈亚、陈作涛、程辉、程理财
程新华、杜平、干德义、郭水尧、何绍军、胡光、胡智勇
黄发军、江黎明、蒋国兴、蒋锦志、李健、李从文、梁国坚
刘鹤、刘金成、刘少雄、罗爱平、罗秋平、毛学军、闵卫国
潘新成、阮立平、舒心、田陆、田源、汪林朋、王洪涛
王学海、邬剑刚、吴文忠、于刚、余磊、余仲廉、喻鹏
詹余引、张波、张健、张彤、赵华锋、朱征夫

四、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先进个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帮勇、别茜、宾爽、蔡佳璇、蔡鹏程、曹青、曹祥涛
陈利、陈霞、陈春莲、陈冬玲、陈十游、陈向前、陈晓艺
成逸、仇周延、楚天舒、崔允瑄、戴双武、邓江、邓冠华
邓体顺、邓文基、丁业强、方清海、方添栋、冯映红、冯志强
甘济华、高爱军、高作平、郜晏中、戈昊怡、宫丹丹、苟鸣春
郭敏、郭闽年、郭卫东、郝洁、何玲、何熔、何红明
胡潇、胡济凡、黄山、黄解放、黄颖琳、侯新军、江晖
江明、江孝为、姜发根、蒋文宁、解峰、康庭婷、冷斌
黎文全、李波、李翘、李婷、李传明、李大林、李国民
李慧欣、李吉祥、李坤洋、李敏儒、李先华、李欣欣、李亦非



李中子、连超、梁晓艳、廖智超、林英建、刘辉、刘骞
刘鹏、刘一、刘炳义、刘冬阳、刘立胜、刘挺军、刘晓兰
刘晓艳、龙萍、卢学裕、鲁俊生、路平、罗静枫、吕如松
马文娟、毛赛、梅劲、孟哲、闵泽豪、彭烜、彭晓青
皮晓青、钱鹏、钱海元、丘红、饶岚、任思国、任思言
沙奇斌、邵竞竹、沈姝、沈梦洁、沈祥熙、沈晓冰、石凌峰
苏娃婷、苏文海、苏映江、孙晶、孙廷、孙亚萍、唐甜
陶闯、田曙光、汪素娟、汪元刚、王荣、王蓉、王烨
王梦缘、王亚锦、王一鑫、王芝萍、韦奇志、尉宾娟、魏亮
吴光胜、吴奇凌、吴尚栩、吴舒怡、武鹏、夏恒、夏禹
夏云、夏金莱、夏利兵、肖潇、萧岚、谢越、徐丹
徐峰、徐涛、徐爱珍、徐广煜、徐耀华、许俊平、许庆安
薛刚、晏小明、杨颖、杨恒敏、杨景原、杨震澎、叶静
叶琳、叶青、易海、尹鹏海、应惟伟、于成、余贵华
喻炜、喻学锋、袁杰、袁琼、袁雄、占坤、张骋
张静、张珺、张凌、张艳、张春霖、张红波、张洪涛
张杰平、张萧宇、张新义、赵杰、赵玮、赵剑锋、赵璐颖
赵术开、郑泉、郑晓旭、周建、周荣、周慧君、周立新
周若鹏、周文川、朱金朋、朱双全、朱志国、祝欣欣、邹伟民

五、特别公益贡献奖个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际刚、毕莲娟、曹清、陈佩斯、陈伟杰、程竹筠、崔智星
丁生凤、范旭霞、方源、方雅亮、高小凤、郭华、郭倩华
郝丹、胡继泽、华学明、黄海均、黄岁平、蒋宏卫
KWON JIN WON、赖建昌、郎金花、冷方英、李朝应、李佳平
李珂静、刘敏、刘松、刘艳、刘国俊、刘永远、芦迪
吕华芳、孟宪勇、牛志成、潘建晔、朴春燕、任静、容永祺
芮新明、沈福成、沈莉荔、孙松竹、宛明慧、万沛中、王宸
王晓松、王燕玲、魏来、吴雪花、吴引庆、肖艳、谢荣华
徐爽新、宣关海、杨盛楠、姚翔、于彩莲、俞文杰、张蓓
张鹏、张产勇、张福连、赵慧敏、郑和平、钟明贵、周卉
周评、朱培秀、朱时茂、朱学峰



六、特别公益贡献奖集体(按拼音排序)

352 环保科技公司

CLARIVATE ANALYTICS INFORMATION SER

Ontime Care Worldwide Inc.

W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阿拉山口市广和宏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艾司毕艾埃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

百特(中国)投资公司

北京遍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泊菲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岐黄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启明星辰慈善公益基金会

北京瑞禹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三和爱心基金

北京四维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孙建民、周军、崔劲等 416 名

员工

北京文脉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野狐世纪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弈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博白县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高校青年学者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湖北商会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红十字会
承德御道和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莱茵 TüV 大中华区及其员工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东润公益基金会
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白果树村和天桥村村民
富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恩泽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零壹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
广东省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友总会、天河校友会
广东忠扬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博润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驰天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红十字会
广州市增城区红十字会办公室
广州中体体育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市慈善总会
贵州省测绘行业协会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海宁壹起演绎经纪有限公司
杭州康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万字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虎美玲艺术发展中心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中岗村、郑村、茹凹村

河仁基金会

宏图菁英荟创新发展研究院(广州)有限公司

鸿远电子 666 名员工及家属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

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恒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美好公益基金会

湖北三峡华翔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慈善总会

湖北省红十字会

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

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武大有机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鑫宏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湖南芒果 V 基金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羽体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佳莱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景然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全体师生

江苏幸福天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及下属各院入住长者

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



卡迈智汽车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师范学院
良品铺子
辽宁省辽商总会
蒙牛集团
民生商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 1208 爱心小队
内蒙古兴安盟
乾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泉州市慈善总会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赛生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大学
山东省聊城一中蔚蓝爱心社
山东正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汕头市围棋协会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若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首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与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
深圳博林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博林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深圳龙岗鼎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慈善会
深圳市大洋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赫德工程担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力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维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商证券公益基金会
神华包神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守护白衣志愿小组
四川华慧工程咨询公司
四川省慈善总会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红十字会
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员工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华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建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仓市木材及木制品流通协会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土耳其全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王氏书画家园主编王明和全国书画名家义捐义拍全体爱心书家

藏家

无锡市慈善总会滨湖区基金会
武汉安智禾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呵尔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开来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盛大长青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市慈善总会
武汉市红十字会
武汉市红十字基金会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武汉宜都商会
武汉永隆酒业



武汉臻熙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物理之友

西北师大附中团委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新加坡中央狮子会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新疆克州乌恰县巴音库鲁提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轩凝(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怡丝丁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艺心抑疫艺术慈善义拍

印尼丹格朗八华三语学校

英伟达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英伟达半导体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英伟达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粤开证券

运城崇济医院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马拉松大满贯武汉愿铃鳗-青马团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MBA 同学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中国围棋协会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社会救助金
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
中文学科部分长江学者
中银香港慈善基金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0 年 11 月 29 日)



八位校友当选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校友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他们是武大校训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承者；孜孜前行，担当使命，他们在各行各业栉风沐雨、谱写华章；爱珈爱校，念兹在兹，他们饮水思源，不忘师恩，反哺母校。11月27日下午，樱顶老图书馆大厅灯光流转、气氛欢快，在优美的校园歌曲合唱声中，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校友表彰大会隆重举行。陈晋、程亦凡、蹇宏、毛明、阮立平、喻鹏、曾文涛、朱征夫八位校友(以姓氏拼音为序)光荣当选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校友。校领导韩进、窦贤康、万清祥、吴平、李建成、赵雪梅、唐其柱出席活动。往届杰出校友陈东升、喻杉、毛振华、周旭洲等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代表，以及学校院系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学生代表共同见证了颁奖仪式。

副校长吴平宣读第九届杰出校友表彰决定，韩进、窦贤康为杰出校友颁奖。颁奖仪式通过个人风采展示与为每位杰出校友量身打造的颁奖词，向现场师生、校友展示了八位校友的杰出成就和精彩人生。校友们一一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阮立平校友说，获得来自母校的这份荣誉内心十分激动，非常荣幸能成为武大杰出校友群体的一员，未来定不负母校信任，为助力武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出应有的贡献；勇担民族企业使命，为国家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如果说我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是因为40年前我在珞珈山下拥有了法治的梦想，拥有了一批志同道



合的同仁，一路相互支持、鼓励。”朱征夫校友深情感恩母校培养，向法学先辈致敬。

喻鹏校友动情地说：“母校给了我知识，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方法，今天的这份荣誉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一定牢记这份荣耀和责任，回馈母校，贡献社会。”

曾文涛校友说，武大 127 年的历史中先贤辈出、星光璀璨，乐山精神、爱国爱校的情怀在一代代武大人的血脉中传承根植，是武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获此殊荣，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辱荣光，努力为母校增光添彩。

蹇宏校友激动地表示：“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珞珈山上总是闪亮着善良的光芒指引我方向；在我最低沉的时候，身上的武大骨血总催我奋进拼搏；在我孤独的时候，许多武大校友给了我关心和力量。考入武大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报，能为母校做事是我最幸福的事。”

陈晋、程亦凡、毛明三位校友因工作原因无法亲临现场领奖，他们通过视频传达了对母校的思念、感恩和祝福。

武汉大学第三届杰出校友、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为大会



致辞，向荣获杰出校友表彰的八位校友表示祝贺，他说：“杰出校友是一份终身的荣誉，值得终身珍惜，也意味着更高的标准，期待各位杰出校友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为社会、为母校做出贡献。”

韩进向所有莅临本次大会的校友表示热烈欢迎，向新当选的杰出校友表示衷心祝贺。他指出，今天表彰的几位校友用自己的突出表现和杰出成就为母校赢得了社会赞誉，校友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干事创业精神、赤诚的家国情怀，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精神做出了最好的注解，为武大师生和校友做出了杰出表率，值得所有武大学子学习。

据悉，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校友评选工作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各地校友会、学校各院系、学校老师和校友们的大力支持。共收到各地校友会、学校各院系及个人推荐的32位校友的参评材料。经向校友总会常务理事、各院系、地方校友会征求意见，并经第九届杰出校友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公示，最终产生了八位杰出校友。

附：第九届杰出校友介绍

陈晋，男，1958年10月生。1982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研究、中共党史和理论研究，以及党史文献和理论电视片撰稿。主持编纂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大型系列文稿，主持一系列中共党史和理论重大课题研究。个人论著有：《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撰写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新中国》《使命》《大国崛起》《伟大的历程》《筑梦路上》等10余部影视文献片。论著和影视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高层次奖项。

程亦凡，男，1962年5月生。1982年本科、1987年硕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教授。程亦凡在生命医学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及综述文章 100 余篇,近 20 篇在 *Nature*、*Cell*、*Science* 上发表,直接引领了冷冻电子显微学领域的发展,开创了结构生物学的新篇章。

蹇宏,男,1963 年生。1984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著名保险人,全国保险系统劳动模范,中国大陆第一位 MDRT(美国百万圆桌会议)顶尖会员。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楚商联合会秘书长。曾获“武汉市第十七届劳动模范”“2018 武汉市年度最佳招商大使”“2020 湖北五一劳动奖章”“2020 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蹇宏在凝聚和服务校友,促进母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蹇宏冲在一线,带领团队为众多校友企业家对接和协调物资捐赠,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民间抗疫力量。

毛明,男,1962 年 9 月生。1983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工程系工程机械专业。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坦克装甲车辆总体技术理论探索和装备型号研制。毛明是 99A 式主战坦克总设计师、04 式履带式步兵战车副总设计师,在主战坦克的总体设计、两栖战车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取得了创造性成果,是我国兵器行业新一代科技领军人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分别排名第 1、第 2),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1),出版著作 3 部,发表论文 70 余篇,获发明专利 19 项。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奖、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动模范、中央电视台 2016 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等多项荣誉。

阮立平,男,1964 年 11 月生。1984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程机械专业。公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第十三届浙江省人大代表,慈溪市十一届政协常委。“公牛”作为国内民用电工行业的领导者,以匠心打造民族品牌,连续多年入选“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阮立平关心学校发展,在支持学校发展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喻鹏，男，1965年6月生。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伟鹏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高级经济师。知名侨领，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侨商协会会长。湖北省政协常委。曾获“中国改革开放40年楚商杰出人物”“2020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抗疫突出贡献奖”“2020中国抗疫致敬品牌人物”等多项荣誉。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在美国成立采购医疗防护物资团队，不仅自己捐赠巨额款物支持抗疫，还发动华人华侨社团组织积极参与，累计组织捐赠款物近2亿元。喻鹏关心学校发展，在支持学校发展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曾文涛，男，1963年7月生。武汉大学1994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武汉银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珈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武汉市工商联副主席，武汉市政协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作为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小组组长，曾文涛一直战斗在武汉战疫第一线，不仅自己捐赠款物支持抗疫，还为捐赠物资采购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曾文涛关心学校发展，在支持学校发展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朱征夫，男，1964年9月生。1984年本科、1987年硕士、1999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现任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律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第三任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现为第二任期)。曾获“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等多项荣誉。朱征夫不仅行业贡献突出，还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围绕法治建设和人权保护积极参政议政，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等80多项提案，多项提案具有广泛社会影响。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0年11月28日)

珞珈风采





陈晓红：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 院士的首位华人经济学家

武大新闻网

朴素，低调，留着短发，总是面带微笑……

她有一个在中国很普通的名字——陈晓红。但这位陈晓红着实不普通。

她现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 Malcolm K. Brachman 经济学教授。

12年前，她就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经济学家，也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之一。

今年，她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名单，是经济金融学领域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作为湖北人的她，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从一名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到世界计量经济学领域最顶尖的学者，陈晓红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学术道路。

她在学术上最了不起的贡献是筛分法的应用，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在获奖演说中，两次引用了她的论文，足见她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从“福特班”说起

陈晓红的学术起点大概要从当年的“福特班”算起。

1986年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陈晓红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系统学



习经济学理论。因为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个培训班也常被称为“福特班”，牵线搭桥的便是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氏检验”的发明者邹至庄先生。



“福特班”作为当年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的项目之一，共招收培养了 618 名学生，许多人后来成为重要的经济学家，有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之美誉。

30 年后，当陈晓红与邹至庄教授一同站在台上接受 2017 年“中国经济学奖”时，她激动地说：“我本人就受益于邹教授当年设立的人大培训班。因此我倍感荣幸能够与邹教授分享今年的经济学奖。”

1987 年从福特班毕业后，陈晓红留学北美，第二年取得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继续深造，师从 Halbert White 教授，1993 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年，陈晓红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担任助理教授。这其中的困难程度，佛罗里达大学经济学家艾春荣教授曾这样描述：

“中国大陆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获得北美顶尖经济学系教职的人很少，陈晓红是其中之一。即使是美国人，在顶尖经济



学系生存下来也非常困难，何况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中国人，生存下来的几率更低。”

在芝大，她结识了两位后来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拉尔斯·汉森(Lars Hansen)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2011年获奖)。

两位资深经济学家显然对青年学者陈晓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回顾道：“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我有幸得到(他们)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Lars Hansen的严谨治学和Tom Sargent的虚心好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陈晓红离开芝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Peter Robinson的推荐下前往伦敦政经学院任教，与Peter Robinson、Richard Blundell、Oliver Linton、Javier Hidalgo、许成钢等经济学家共事，进一步磨练了她的学术功底。

艾春荣教授对她的这段经历也作过精彩的总结：

“伦敦政经学院也是一个令神仙都向往的地方，研究环境非常优越和自由……芝加哥大学的挫折并没有影响陈晓红对学术的追求，她仍然沿着既定的方向，坚韧不拔，做她喜欢做的事情。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伦敦经济学院的三年时间将她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为她回到国际学术中心的美国、成就今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年后，陈晓红返回美国，在纽约大学任副教授。同年，萨金特教授正好也开始在纽约大学执教，他们再一次共事了五年，“可以再次向他学习”。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2007年7月，陈晓红受聘于耶鲁大学，在耶鲁经济学系任教授，同时在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任研究员。

这一年，陈晓红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这一荣誉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界可谓仅次于“诺贝尔奖”，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该学会的院士。



在2007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手册》(第6卷下)里,陈晓红受邀独自撰写了第76章一整章——“半参数模型的大样本筛分估算”。范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彤对这一章的重要性做了很高的评价:

“关于筛分估算的章节是使用筛分法的人必读的章节,并且被广泛引用。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晓红《计量经济学手册》中的专题章节促进了筛分法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

从2009年起,她担任了多个计量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副主编,包括《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和《计量经济学杂志》,并从2019年1月起任《计量经济学杂志》的主编。

因为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陈晓红被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授予2017年“中国经济学奖”这一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在获奖感言中,她说:“基金会给我这个殊荣是对我这一代华人计量经济学家和女性经济学家的肯定,我希望此奖能够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致力于计量经济学的创新。”

仅一年多后,也就是今年4月,陈晓红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是其建院以来首位入选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经济学家。

“她为计量经济学方法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她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普遍性和很高的质量。”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这样评价。

从“福特班”到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陈晓红的成就与她的执着分不开,正如李彤教授对她的评价所言:“所有这些无不展现晓红作为学者的美德——一旦开始,定将尽心尽力,追求卓越。”

同行评价

最后,我们引用几段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长江特聘教授孙一啸对陈晓红学术贡献的评价:晓红是全世界范围内在非参数计量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她最了不起的贡献在于几乎包办了两大非参数方法之一的筛分法的所有大样本渐进理论结果。她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超高水平贡献具有奠基性和革命性,并理所当然地影响深远。毫不夸张地说,当今这个年



代，任何一个想利用筛分法去做研究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引用陈晓红研究成果或者受到她的学术思想影响。同时，陈晓红提出的筛分估计方法和统计推断方法在宏观经济学、金融、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等诸多经济学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概括地说，陈晓红的成果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具有通用性。她总是试图在最弱的最一般的假设条件下去研究一个问题的本质，继而得到关于这个问题最通用的结论和方法。也因此，很多其他的计量学者，其中不乏一些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总是可以将她的结果和方法应用到某些特定的模型中从而得到特定的结果。

也正是因为她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很深刻并且影响深远，她发表的文章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非参数统计杂志》最佳论文奖 (Journal of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Best Paper Award)、应用计量经济学理查德·斯通奖 (Richard Stone Prize in Applied Econometrics) 以及理论计量经济学阿诺德·泽尔纳奖 (Arnold Zellner Award in Theoretical Econometrics) 等。这些奖项中的任何一个奖项都会被绝大部分学者视为终身荣耀，而陈晓红的多次获奖，是对她非凡的研究成果以及孜孜不倦的努力的肯定和证明。

我非常荣幸曾与陈晓红以及她的学生廖志鹏 (UCLA) 合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可能存在错误设定的半参或非参时间序列模型的筛分估计与推断》。这篇文章于 2014 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上，而这次合作也让我亲身体会到了陈晓红极其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超高的智慧和技术水平。她对任意一个结果都会反复推敲，力求完美。

(稿件来源：耶鲁北京中心微信公众号及网络；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2 月 26 日，图片有改动)



勇立潮头敢争先 挥斥方遒开天地

——记冷冻电子显微学家程亦凡博士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程亦凡，在武汉大学 1978 级物理系本科毕业之后，分别师从武汉大学王仁卉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武汉大学杰出校友李方华院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教授。2019 年 4 月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2020 年 4 月 27 日，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世界冷冻电镜领域的拓新者

2017 年 10 月，诺贝尔化学奖颁给发明冷冻电镜的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冷冻显微技术领域的贡献。这是属于冷冻电镜领域的“高光时刻”，但是冷冻电镜技术也有过一段坐“冷板凳”的经历。从 20 年前的鲜为人知，到 10 年前被嘲笑为“Blobology”雪人模型，直到攀上诺奖的顶峰，冷冻电镜技术经历了很多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在程亦凡校友所从事的开拓性科研工作推动下实现的。

2013 年年底，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程亦凡与 David Julius 组在 *Nature* 上合作发表论文，报道了 TRPV1 膜蛋白（一种在疼痛和热知觉中起中心作用的蛋白质）的原子分辨率级冷冻电镜结构，在整个结构生物学领域一石激起千层浪，几乎一夜之间，X 射线晶体学界的著名科学家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冷冻电镜技术。程亦凡的研究直接引领了冷冻电子显微学这一领域的发展，开创了结



构生物学的新篇章。“生物通”网站以《程亦凡博士连发两篇 *Cell* 介绍突破性技术》《程亦凡博士 *Nature* 发布突破性壮举》为题做了显著报道。

从物理到生物专业的跨界者

程亦凡为武汉大学 1978 级物理系本科生，1982 年获物理本科学位。1987 年开始在武汉大学物理系读硕士研究生时，看到当时第一篇关于准晶体发现的文章非常激动。因为当时电镜是研究准晶体结构最有效的手段，于是决定加入武汉大学物理系王仁卉老师课题组，学习电子光学理论和电镜实验技术。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是在中科院物理所李方华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进行电子光学、成像理论和高分辨电镜的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博士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挪威和德国做博士后，继续从事材料科学方面的电镜研究。

1996 年，在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5 年后，程亦凡转行进入结构生物学领域。之后分别在美国和日本继续做博士后，分别在 Ken Taylor 和藤吉好则实验室学习冷冻电镜，研究二维晶体和膜蛋白结构。1999 年年底到哈佛医学院，加入 Thomas Walz 实验室。2003 年参与解一个水通道的膜蛋白 (AQP0) 的结构时，获得了 1.9 埃的分辨率。直到 2015 年为止，这也还是冷冻电镜解的分辨率最高的一个结构。2006 年，程亦凡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做助理教授，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工作。2010 年前后，开始和 David Julius 实验室合作研究 TrpV1 (一种在疼痛和热知觉中起中心作用的蛋白质) 的膜蛋白结构。

自 1996 年进入冷冻电镜和结构生物学领域以来，程亦凡就一直对冷冻电镜技术非常感兴趣。UCSF 其他几位教授，包括 John Sedat 和 David Agard，也都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David Agard 教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参与了第一代 CCD 相机的研制，他在很多年前就预见到相机开发对电镜技术的重要性，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直接电子探测器 (direct electron detector, 一种直接电子



探测器件，能够直接检测电子，而不需要像传统 CCD 相机那样先将电子转换成光子，然后再由 CCD 记录光子信号)研发的早期，就预见到了单电子计数的重要性。2009 年，得到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的资助，跟 Lawrence Berkeley 国家实验室和 Gatan 公司一起合作开发单电子计数相机。David Agard 是 PI，程亦凡是 Co-PI，主要负责相机的后期检测和应用开发。

经过几年努力，在 2013 年年初，程亦凡博士将 TrpV1 通道的结构解析到 8 埃的分辨率。随着在电镜技术上的突破，特别是单电子计数相机和他们自己开发的图像飘移校正技术的应用，很快将它的分辨率提高到了 3.3~3.4 埃。获得 Trp 通道的高分辨率结构 (Nature 504: 107-112 & 113-118, 2013)。

Trp 通道功能的确定，一方面解决了其他常见感觉(温、压、部分的痛)第一级的分子机理，意义重大，让饶毅教授直指“Julius 与程亦凡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可能很大”(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749393.html)；另一方面，它也让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冷冻电镜在结构生物学研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合作者 Julius 说，由于程亦凡实验室取得的巨大进展，能够精确地捕获蛋白质的形状改变现成为了低温电子显微镜的一个巨大优势，他预计许多结构生物学家，甚至是那些支持 X 射线晶体学的人，也将会把低温电子显微镜添加到他们的工具箱中(“生物通”网站)。

关于跨界，程亦凡博士说 UCSF 给了他非常好的环境，在他自述当初寻找教职的过程时，他介绍自己是一位物理学家，面试他的系主任的第一句话是：That's great, you know things we don't know(这很好，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尽管他现在从事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但依旧与当初学习物理的过程对他的训练相互呼应，他也勉励学生：“You can learn anything you want, the only question is how much you want to learn it”。

潜心科研的探索者

相比绝大多数较早成功的科学家，程亦凡是人到中年才获得普



遍认可。2006年，已40多岁的程亦凡才刚刚做到助理教授，很可能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年纪最长的助理教授。2012年拿到终身教职，2015年当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程亦凡对于研究的执着和坚持，对于科研领域转换以后始终如一的坚持，对于解析蛋白质结构新方法的不断追求和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是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他有着“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对于科学研究，他说过：“我们不应该单单追求文章数量，今天解析一个蛋白质结构，明天又换一个，这样没有意义。我们要不断开创新方法去解决以前不能解决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获得成就之后，他想的是：“尽管现在冷冻电镜方法已经很普及了，但我总是想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做出更多创新，推进整个领域。”迄今为止，程亦凡已在生命医学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及综述文章100多篇，近20篇在*Nature*、*Cell*、*Science*上发表。仅2015年，程亦凡就发表了*Nature* 3篇、*Science* 1篇、*Cell* 2篇、*Nature Methods* 3篇，直接引领了冷冻电子显微学这一领域的发展，开创了结构生物学的新篇章。

程亦凡不仅为冷冻电镜领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如廖茂富（现为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曹二虎（现为犹他大学助理教授）、李雪明（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等，他还广泛参与世界各国包括国内的各种讲习研讨，不断推广冷冻电镜技术在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并积极协助国内上海蛋白质中心的建设。

程亦凡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他的执着追求。正是这种对人生、对事业、对学问追求的不悔，才使他在科研的道路上最后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和境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程亦凡博士也是马拉松爱好者，多次参加旧金山湾区马拉松赛。在科研的长跑道路上，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晚了很多，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之神只会光顾执着的追求者，2019年4月，程亦凡入选美国艺



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20年4月27日，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程亦凡博士笑称：“希望把冷冻电子显微学自动化到自己结束生命时低头碰上按钮拍下人生最后一张电镜照片。”

衷心祝愿程亦凡博士、我们的杰出校友(武汉大学第九届杰出校友)，在科学的道路上继续引领前行！

(稿件来源：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经南：一句话，一辈子

刘志伟 吴江龙

“在与祖国科技事业共同成长的经历中，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国，涉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一定要能自主可控，一定要有引领性、原创性的科学技术，才能步入强国之列。”——刘经南院士获奖感言



6月12日，北斗三号系统完成全球组网前夕，著名大地测量与卫星导航专家刘经南院士站上湖北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接受湖北省委书记应勇颁发的湖北科技突出贡献奖。

77岁的刘经南，是我国卫星导航技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也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工程应用领域的开拓者。



他带领科研团队不畏艰难、勇攀高峰，从跟随、超越到引领，在我国卫星导航定位领域填补多个“空白”、实现多个“第一”。

不忘初心打破“国际惯论”

初中时，刘经南喜欢生物、化学和天文学。彼时，科学家发现的DNA双螺旋体结构影响着他。他自制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100倍左右，吸引了很多同学。

刘经南高中成绩优秀，本希望考取北京大学生物类专业。但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就读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入校后，刘经南一度想过退学，来年再考一次，因为测绘专业与个人兴趣相去甚远，但老师和家人都劝他坚持下去。

此时，刘经南依然喜欢“生物”。读大一时，他时常去旁听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虽然起初对测绘热情不高，但他觉得“拿好分数，是一个学生应该做到的”。因此，门门课程都是高分。大二时，他接触更多测绘专业基础课，发现也有很多探索性和挑战性领域，逐渐对本专业产生兴趣。





大学毕业，刘经南被分到湖南煤田物探测量队，负责外业测绘，历经各种艰辛，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干就是11年。11年里，刘经南不忘初心：“我想做科学研究工作。”

1979年，36岁的刘经南顺利考入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读研究生。

1980年代，国家部署对西部油气资源进行探测，刘经南受老师委托西进青海、新疆。

高程坐标不精确，容易给后期的开采造成很大的误差。如何提高高程精度，是刘经南他们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挑战，他废寝忘食地埋首数据处理。

“用卫星定位的方式，通过高精度转换模型，就直接可以得到高程达到1米左右的水平”，修正了国际上卫星定位的大地高不能直接用于石油勘探的结论，满足了国家开发西部的重大需求。刘经南也因此收获了人生中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怀疑一切”攀登科学高峰

刘经南热爱教学和科研，喜欢在科研中探索挑战。

他历任武汉测绘学院所所长、院长、副校长，武汉测绘学院合并到武汉大学后，又成为新武汉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再到昆山杜克大学首任校长，一直坚持科研探索工作。

刘经南记忆犹新，上初中时读过一本关于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书，书中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问马克思：你最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回答：“怀疑一切。”

6月10日，刘经南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刘经南搞研究有一个习惯，对于教科书上的证明和理论，他都要先学习，然后找出问题和不足，“我可不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推导它？”

正是因为这种“怀疑一切，敢于挑战”的精神，他带领科研团队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填补了多个空白，创造了数个第一。



为满足国内城市和石油勘探需要，他创造性提出了一整套 GPS 三维地心坐标向量至高斯二维坐标的转换理论，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将 GPS 网三维平差转为二维平差的理论和方法。

研制出我国第一个 GPS 商品化软件；第一次提出 GPS 网随机模型质量控制概念、有关理论和处理方法，成功解决了大规模、高精度 GPS 网整体平差工程的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负责我国第一个 GPS 永久跟踪站(武汉)建立、长年运行和维护，提出一套永久站技术标准……

不仅如此，刘经南还为我国北斗导航卫星广域差分系统的建设，提供了最早的技术思路和技术方案，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第一人，亦参与这个被称为“中国 GPS”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建设至今。

自主创新 剑指“仰望星空”

创新方有未来。

刘经南负责研制的湖北省清江水电开发公司隔河岩电站水库大坝外观变形 GPS 自动监测系统，成为全球第一个完全无人值守连续自动运行的大坝 GPS 自动监测系统。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中，该系统作为主要手段监测超水位蓄水下的大坝变形，对荆江大堤超蓄调度分洪科学决策起到关键性作用。

“如果把我们的研究分成‘跟随、超越、引领’三个阶段，隔河岩电站水库大坝外观变形 GPS 自动监测系统是实现引领的开始。”刘经南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刘经南带领团队参与“北斗”科研攻关。

一举攻克北斗卫星系统多个关键问题，解决北斗二号卫星姿态转换期间(每半年约 15 天)不能服务的问题，建立亚太地区首个包括北斗在内的卫星导航(GNSS)高精度国际分析中心，实现我国北斗异构星座高精度数据处理关键技术的自主掌控。

高精度卫星导航增强服务系统过去主要依赖美国和欧洲。刘经



南说，“它们本来精度也不算太高，我们常常还被故意降低精度。”

2012年，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如何实现北斗系统高精度服务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刘经南带领团队，提出建设国家地基增强系统的创新方案，并在湖北省建立国内首个省级区域的北斗地基增强示范系统。

自主高精度卫星导航增强服务系统，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分米级、重点区域厘米级的定位服务能力，打破国外垄断。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即将于本月发射升空，届时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完成全球组网。刘经南和他的团队迎来“仰望星空”时刻，他们拿下了湖北第一颗北斗多模多频高精度芯片，和中国首颗40纳米高精度消费类北斗导航定位芯片。他们正在继续攻坚7纳米、甚至5纳米高精度低功耗北斗芯片，北斗服务全球的蓝图正在刘经南面前徐徐展开。

（稿件来源：《科技日报》2020年6月12日；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0年6月14日）



童朝晖：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

曾德军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队伍中，医学专家发挥着极为关键的指导作用，童朝晖便是他们中的一位。他是全国知名的呼吸重症专家、中央督导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也是武汉大学杰出校友(第七届)。

1月18日，童朝晖作为第一批援助专家抵达武汉，重点指导和负责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救治，在抗疫前线奋战了整整一个月。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他，对他的一线工作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SARS 老兵再上新战场

国内的医疗界对童朝晖并不陌生。他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部医疗系，分配到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工作；1995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世界知名呼吸病专家、《欧洲呼吸病杂志》前总编 Costabel 教授。

2003年面对“非典”，童朝晖临危受命，连续三个月没回家，带领43名医务人员建立了中国顶级SARS病房，负责诊治的100余例“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实际上，不仅仅是“非典”，他在国家多个应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次，童朝晖再赴疫情最前线。面对领导们、亲朋好友们、同事们的关心，他在朋友圈写道：“你们的关心和爱护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我是一个老兵，有丰富的作战经



验。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过去的一个月，童朝晖的工作越来越忙。他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来到武汉以后，主要负责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每天的工作是诊治病人，优化治疗流程和方案，同时调配危重症专业和呼吸危重症的医生和护士。

“目前各项工作运行平稳有序，危重症病死率已有下降，出院患者比例也在增加。”童朝晖介绍，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协和医院东院区等被指定为重症救治医院以后，他还需要去甄别、筛查重症患者，以便及时将重症患者转到定点医院。

童朝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培训援鄂医疗队，既有诊疗救治技术的培训，也有心理减压的疏导。他说，一些新来的队员刚开始有心理紧张的现象，但大家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环境，都以饱满高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临床抗疫工作。

童朝晖还在中央电视台做直播，接受《新闻联播》《朝闻天下》等多个节目的采访，普及科学知识，解答百姓问题，消除社会恐慌，为疫情防治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临床专家更应该讲科学

作为呼吸重症专家，童朝晖思考的重点始终是如何更科学地救治患者。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五版）》中，新增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这无疑反映了专家组的重要建议。

童朝晖解释道，增加临床病例诊断符合临床诊疗常规和临床医生的诊疗思路。把临床诊断加进来以后，能让更多过去疑似的患者、符合临床诊断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收治和管理，也更加有利于收治重症患者。

针对网络上各种所谓的特效治疗方案和特效药，他说：“每当灾难和疫情发生时，人们总希望能找到一种特效药物来控制相关疾病。但遗憾的是，从来不会有什么特效抗病毒药。”从2003年SARS



后，人类又经历了 H5N1、H1N1、H7N9、MERS 等病毒的肆虐，漫长的 17 年，国内外都没能找到有效的抗病毒药。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不能以个体和个案的经验来证明什么，这是不严谨不科学的。”童朝晖反复强调，新冠肺炎是新发疾病，还有很多未知之处，对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仍然是综合治疗、支持和保护治疗，科学、辩证思维、证据依据充分地诊疗患者。

童朝晖在每天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记录下关于临床诊疗的思考，在朋友圈分享。

比如：抗菌药物的作用、重症患者的营养支持、恢复期血浆治疗、如何看待新冠肺炎患者的淋巴细胞减少等。有时，他大声疾呼：重要的事情说一百遍也不知道是否有效！有时，他提醒同行：“对于在 100% 的给氧及较高条件下的无创通气 2 小时，氧合指数仍小于 150 的患者，应该尽早进行气管插管有创通气。”

他的医生朋友要是连续两天没有看见他发的诊疗笔记，还会怀疑他是不是“中招”感染了，纷纷私信关心他。为此，他不得不发圈解释：昨天比较忙，没时间发经验分享，我身体挺好，感谢你们的关心和问候！

当国家需要时勇敢地站出来

“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当国家需要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在童朝晖看来，“就像战士要到前线打仗一样，国家有危难，战士肯定会冲锋陷阵。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际上也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很大的战争，所以需要我们医护人员站到第一线，去治病救人防控疾病！”

童朝晖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教研工作 32 年，开展了大量创新性临床诊疗及科研工作。他在国内最早将 ECMO 技术应用于呼吸支持，救治了大量严重呼吸衰竭患者。经历过 SARS，作为国家卫健委应急专家，被派到全国各地救治呼吸感染与危重症患者，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近年来创下了多个第一：2008 年发现了北



京市第 1 例 H5N1 禽流感患者，2013 年诊治了北京市第一例 H7H9 患者，2019 年发现并成功救治北京市第 1 例 H5N6 禽流感患者等。

童朝晖的学生中，有 8 名奋斗在武汉抗疫一线。他在朋友圈给学生写下一段话：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你们在家人和全社会的眼中就是这样的英雄！请你们一定注意防护，多加小心。要记住你们的至亲们在日夜记挂着你们，翘首以盼你们归来。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家里始终有一盏灯为你们点亮！”

童朝晖，不正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吗？这次再上战场，童朝晖更加坚定自信，他让记者转告母校师生：感谢你们的关心，我目前的工作、身体都挺好！请大家不用担心。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0 年 2 月 18 日）



于刚：人生无处不可能

温才妃

岁月如歌。精彩总是垂青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

就像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于刚一样，33年前，作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博士生的他，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敲开了美国工程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系系主任马歇尔·费希尔的大门。

费希尔一般不接待没有预约的学生，但他刚从中国访问回来，见证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友好，答应给予刚10分钟时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40多分钟过去，费希尔叫来了系里管研究生的教授派特里·哈克，“看看怎么帮这位大有潜力的年轻人转到沃顿！”

匆匆赶来的哈克，满心狐疑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学生，他想不通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是如何打动管理科学界泰斗级人物费希尔的，更何况——他既没有考托福，也没有考GRE，是怎么来美国留学的？

“我是通过CUSPEA计划来美的！”于刚回答。

“抱歉！它是什么？”……

4天改变人生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于刚报考了“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武汉大学，并如愿被录取。就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他接触到CUSPEA。第一届CUSPEA准备仓促，全武汉大学只



考上1人，及至于刚这届，学校特别重视，专门派了指导教师、组织讨论班进行备考。讨论班总共24人，竟考取了14人，录取率之高令人咋舌。

于刚在录取他的学校中选择了康奈尔大学，这里湖光山色、风光旖旎，最符合他心目中象牙塔的形象。“最要感谢的是，李政道先生和他发起的CUSPEA项目给了我走向世界的机会。”

听完于刚对CUSPEA的简要介绍，哈克很快拨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李政道的电话。没过多久，一张CUSPEA成绩单传真至沃顿商学院。

转学还需要两名推荐人。放弃了物理学专业，于刚不好意思再打扰李政道，于是便找到在美的武汉大学教授、访问学者游朴和刘福庆。拜访游朴时有个小插曲，于刚在游朴所住的楼外从晚上9点等到半夜12点，这位女教授回来看见在大门外一个徘徊的黑影，一直不敢进门，认出是于刚后才松了口气。

于刚的转学申请立即获得批准，仅用了4天时间。也就是说，4天前，于刚还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物理，4天后，他成为沃顿商学院的博士生。

“恭喜你，Gang，成为沃顿郎！”于刚的同学们一半祝福、一半调侃道。

之所以语带调侃，是因为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校报采访了一位刚进校的女生：“你在宾大最大的愿望是什么？”“Marry a Wharton man(嫁一位沃顿郎)！”

进入沃顿，对于刚而言，是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每当毛主席发表新的指示时，于刚和他的湖北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厂同事们都要开着拖拉机去游行，浩浩荡荡上百辆拖拉机，好不壮观；可风光背后，却常常是半数拖拉机由于低劣的质量坏在路上，工厂要专门派人去把拖拉机给推回来。

这样一个画面，久久停驻在于刚脑海。“我更愿意去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如果继续当工人，我会致力于提高落后的技术和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而此时，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理论物理的于刚感到迷茫，众多课程都在数学系所修，泛函、实函、拓扑、数



论，越学越抽象，他发现自己已渐渐失去当初对物理的激情。

恰逢此时，于刚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物理系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被《物理评论 D》(*Physical Review D*)接收，在宾大修改文章时，方知沃顿商学院盛名，他决定找两位沃顿商学院的教授聊聊。于是，便有了前文的一幕。

“建议你马上转学过来。”费希尔对于刚很中意。事实上，在整个聊天过程中，这个提议一度让于刚左右为难。

“我想拿到物理学博士，再入读沃顿商学院。”

“年轻人，拿物理博士学位有意义吗？如果你真心想学管理学，在运营管理界有所作为！”

思考再三，于刚追随了内心的召唤。

从此，物理学领域或许少了一位科学家，但一颗管理学新星却冉冉升起。

由学入商再转折

1993年，“篮球之神”乔丹改打棒球，这个消息令NBA的铁粉于刚感到震惊，他当时十分不理解，直到多年后他遇到同样的困惑，才对人生不断追求挑战有了新的认识。

十多年后，于刚成长为一名学术精英。沃顿商学院毕业后，他就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职，一路做到终身教授和座席教授，获得国际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颁发的弗兰兹·厄德曼(Franz Edelman)管理科学成就奖，发表了80多篇论文，著书4部，获3项美国专利。可以说，学术上的成就，让他捧着“铁饭碗”，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他并不甘心。“‘篮球之神’都改打棒球了，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是什么？”

2004年，一封来自美国猎头公司的邮件，让他与世界电商巨头亚马逊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在经历一番“穷追猛打”、毫无喘息机会的魔鬼式招聘之后，一种强烈的被认可感油然而生。于刚决定离开学术界，加入亚马逊，担任其全球供应链副总裁。



夏日的一天，于刚回到学校清理办公室，竟发现15年的学者生涯留下满满50箱物品，包括数不清的科研论文手稿、若干奖励证书。“当然不舍，但生活不属于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最后，他一狠心将书和杂志送给学生，只留下两纸箱手稿和奖牌。

可惜吗？遗憾吗？外人看来的确如此。但于刚现在回忆起来，“更多想起的是那时的人和事。从前的荣誉变成符号，创造的财富变成数字，真正享受的是人生历程——想做的事努力做到了，实现了社会价值、个人价值，赢得了他人尊重，沉淀为人生中的一笔精神财富，这就够了。”

就像昔日果断转学，让于刚如鱼得水，学物理之后，他发现思考管理问题并不复杂。物理强调缜密的逻辑思维，他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方法正是从物理中学到的。

于刚欣喜于学物理时形成的世界观，并在自己的文集《岁月如歌》中写道：“复杂性是世界之妙，简单性是宇宙之灵；简单性后有复杂性之根，复杂性中有简单性之本。”这也是他的座右铭。

“世界上的事物看似复杂，但都内含规律。复杂的事情可以去寻找它简单的规律，简单的事情也有它复杂的细节。这个世界观让我既可以有高度和视野，也不失去对细节和过程的关注；既有远大的梦想，也会脚踏实地地去实现。”于刚说。

活用在凡事讲究数据支撑、逻辑思维的亚马逊，就是既要简化找到方向，又要关注所有细节，进而产生执行力。因此，“一个人所学、所做都是为日后的事业铺路，并没有什么人生经历是浪费的。”于刚笑道。

在亚马逊小有成就之后，命运的罗盘又在悄悄发生偏转。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渴望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潮中的“弄潮儿”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不久，在猎头的再三说服下，他加入了戴尔，成为其全球采购副总裁，回到中国，主管戴尔在亚太地区的采购，把家安在了上海。

回忆作为学者和职业经理人的不同感受，于刚说：“当教授要有前瞻性，用公理和严谨的方法论去诠释既有现象和预见未知；当企业高管要有领导力、创新力，带领团队齐心协力实现更大的商业



目标。”

那么，是否有一种职业，综合了上述能力，又给人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在于刚的世界里，有这样一项本领——创造机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激情创业成传奇

乐观的人做选择，考虑在最好的情况下最好；悲观的人做选择，让在最差的情况下不是最差。

然而，在于刚的世界里，他做了这样一种人生选择，让选择给人生带来的后悔最小化——“做选择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我不做这件事，将来是否会后悔？’如果会，我就努力去做这件事，哪怕失败。”

创业，就是于刚认为不做会后悔的事。

即便是和搭档刘峻岭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对面坐了4个月才招聘第一名员工，背着儿女的书包挨家挨户散发商品目录，被超市店长晾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道歉，在工商局被年轻的工作人员训斥，于刚和刘峻岭都不曾为这个选择后悔过。因为“选择做一件事，就要接受做这件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

7年间从0到1，他们创建的1号店进入我国电商第一梯队，拥有9000多万名顾客、1万多名员工，在线销售800多万种商品，名列中国百强品牌榜。

1号店案例也成为沃顿和多个商学院运营管理课的热门案例。每年沃顿商学院都会组织一批学生前来访问1号店，听于刚和刘峻岭讲述创业故事成为参访亮点。

及至后来于刚和刘峻岭离开1号店，打造专注“互联网+医药健康”的111集团，他们创办的1号店仍然是业界传奇。

创新大概是于刚最为看重的企业品质。在他的著作《激情创业》一书中，他对创新之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创新氛围、宽容失败等同样在科学领域常谈的概念着墨颇多。



科学领域有两类创新：一类是学习他人精髓，复制到自己的研究中；另一类是原始创新，从零开始创造。“不要简单地追求原始创新，资源不足就先作复制性创新。”于刚援引日本现象说，一开始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复制性创新，后因有了资源和能力进而展开原始创新，并水到渠成地收获不少诺贝尔奖。“任何一种创新都值得鼓励！”

在他看来，科学与创业，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一样的：二者都要创造价值、定义成功，都要一步步发现规律、执行到位。

为了证明一个猜想，学者于刚连续思考了几个星期，一天凌晨3点忽然开窍，兴奋地赶紧从床上爬起来证明。

做虚拟超市，创业者于刚半夜收到朋友转来的微博视频——Tesco在韩国地铁站做虚拟超市，二维码一扫，商品立刻送到家，这个创意让他激动得睡不着，第二天就组织人员启动，花了3个星期将这项创意执行到位。这个项目让1号店移动购物单量翻了三番，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

可于刚并不满足，进一步敦促团队用虚拟现实技术推出“无限1号店”，可在任何场景下一分钟内搭建一个虚拟超市，在复制创新的基础上开创原始创新。

然而，科学与创业也不尽相同。科学强调逻辑思维，面对的是客观世界，有条有理地推导、分析；创业强调用人艺术，面对的不完全是客观世界，重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

如果说有一种职业综合了学者、职业经理人的部分素质，又把概念变为现实、不断创造价值，那就是创业。经历了连续创业，在美国、中国创建了科莱科技、1号店和111集团，这条路对于于刚而言，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不可或缺的品质

要问于刚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不是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嘉奖，不是创建111集团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高光时刻，而是在美国创业时，从未谋面的西北航空董事长在签约前握着他的手说：“于博



士，很荣幸和你握手，都说和你握手就是一个承诺。”

“我听后感慨，在业界赢得这个口碑，认为和我握手比和我签约还重要，岂能不成功？”于刚笑言。

创业三次，融资十几次，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始有终，竭尽全力，于刚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让自己活成一个靠谱的人。

从学者到职业经理人，再到连续创业者和企业家，在他身上，有着一以贯之的特质，“第一个原则，创造最大价值；第二个原则，要么不做，要么做最好”。

他喜欢用笔记的方式，去领悟生活的真谛。“尊重对手，尊重概率，大赢小输。”打完德州扑克，他会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画地总结经验教训。平时娱乐修身，如打高尔夫球、练习书法时也是如此。

每天，或最多两三天，他会做一次总结。有些事做成了，但却不知所以然，于刚会跟自己较劲，“有时，走弯路有助于你想明白背后的道理。”

每天早上，他都要抽出 10 到 15 分钟思考“这一天要做什么”。这 10~15 分钟换来的，是一整天中的要紧事从不会因次要的事情而耽搁。

如果说计划、总结是他提高生命效率的法宝，那么毅力、纪律则是好习惯形成的助力。“做很多事，最后战胜的是自己，这需要毅力、纪律。很多纪律不是强加给别人，而是用于约束自己。”于刚说。

眼前的于刚不像同龄人一样大腹便便，他笑称“体重和大学时期差不多”，而他的“秘诀”就是每周锻炼，饮食饮酒不过量，见好就收。

正因他活得专注、“讲究”，打到灌丛里的球也要一杆一杆认真救出来，推杆要来回看许多遍，不打完最后一杆绝不放弃。一位投资人在和他打了一场高尔夫球后，决定投资他创建的企业。

在于刚的人生历程中，无论是同管理科学之父库珀携手，还是与好友刘峻岭搭档，抑或是跟卓尔集团董事长阎志相交，都能看到“合作”二字的影子。合作的要领在他看来，要有心胸，处事要透



明、公平。

人各有长短，在有限的时间内，是不断发挥长处，还是弥补短处？于刚认为是前者。“让每个人发挥长处，整体就会做得好；努力弥补短处，却没有发挥长处，那么，一个人能做的事会非常有限。”

意识到这一点，于刚在与人合作中，就更注意放宽心胸。“不是有了利益独自贪大，不是有了错误就推给别人。”除非自己撰写的，他与学生合作的论文，从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

于刚还注意处事透明、公平。他和刘峻岭搭档12年，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事毕复盘但从不算账，有了错误各自主动承担。

“合作的真谛在于，价值观一致、互相尊重，彼此都将它视为事业。诚信的本质在于，说你所说，做你所说。”于刚说。

这样的于刚，不成功也难。

（稿件来源：《中国科学报》2019年6月26日第5版；原载《武汉大学报》第1512、1513、1514期）



武汉依然如此美丽

——在武汉大学校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阎志

尊敬的王忠林书记，尊敬的韩进书记、窦贤康校长，尊敬的陈东升理事长，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想表达我的感谢，感谢武大！在疫情期间我作为一名湖北人，卓尔作为一家武汉企业，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学校却给了一份隆重的鼓励，这是对我最大的激励。武汉大学一直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望者，每一次回到这里总能获得温暖而坚毅的力量。

封城当天，我正陪母亲在三亚休假。我立即通知公司向红十字会捐款，这是向陈东升理事长学习。陈东升理事长是率先捐赠的。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中午，我接到了三个电话，有市领导、有朋友，最后一个电话竟然是汉口北的一名基层干警在街口执勤时打的：“你们做批发市场，有没有雨衣？”我问：“你要雨衣干什么？”他说：“我们没有防护服，我们都在街头执勤，想用雨衣当防护服。”可见当时防疫物资之紧缺。

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当即决定组织全球采购。我们组织了一个18人的团队，开始了全球采购。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就找到了货源，这得益于近两年卓尔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采购平台——我们仅用3个小时就买到了300万只口罩和80多万套防护服；这也得益于我们近几年在航空领域的布局，我们以最快速度申请航线，找到飞机，从国内飞到金边和马尼拉，再从那里飞回来。仅用42个小



时，包机就落地天河机场，成为全球第一架落地天河机场的装载抗疫物资的包机。

几个小时之后，第二架包机又落地天河机场。我开始组织在汉员工，把物资分送到各个医院、各个区县，并首先保障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

我以为这就差不多了，当时对疫情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做预估。结果又接到了市抗疫指挥部的电话，让我们迅速找到进红区的防护服，我又赶快开始了第二轮采购。当时我是在三亚酒店的桌子上手写了一封信，然后拍下来发给日本一位熟识的商社社长，请求他们帮助采购，仅半天时间就找到了10万件进红区的防护服。当时用两架包机从东京运回了87000多件防护服，日本人留下了10000多件。自此，我们再没有停下来，通过全球采购、通过供应链资源，总共运回11架包机的物资。1000多万件防护物资送到了湖北省103个市县的医疗机构和各类防疫点。

因我们运回来物资的事被报道出去，大家都以为我跟医院很熟，每天都接到几十个电话让我找病床。那时我的压力非常大，能打我的电话、给我发微信的都是朋友、熟人。我就一个一个医院地找，也找到了武大附属医院，也找了武大校友会帮忙，却怎么努力一天都只能解决三四张病床，中南医院给我解决的就是在原来的杂物间里面摆了一张床，足见当时床位之紧张！

1月28日，江岸区委书记马泽江给我打电话，寻找医疗物资。我提出来拿一个医院做应急医院，他当即同意把武汉市第八医院拿来当应急医院，我们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建了三区两通道，1月30日就开始接收病人。八医院只是家肛肠特色医院，医生护士急缺。找了很多地方，最后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找到了212位医生，我们又包机运送医护人员从西安飞到武汉，第一家应急医院就这样正式运行了。

要保障医院的运行，除了物资之外还需要人，我安排武大校友、公司副总裁方黎出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并担任执行院长，我在每一个应急医院都配备了一位保障物资供应的工作人员。方黎在保障期间一直戴着口罩，进过红区，他脸部的感染到现在还没有



好。我的家乡黄冈当时也很困难，黄冈有段时间是紧继武汉之后被感染人数最多的城市。黄冈的大别山医疗中心刚刚落成还没有床位，我们只用了两天时间建成了 1500 张床位，用于接收病人。我通知了正在新加坡休假的武大校友、副总裁吴奇凌飞到长沙，再找车赶到黄冈，出任黄冈卓尔大别山应急医院的执行院长。我上面提到的两位都是武大校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很好：武大校友，人人英雄！

我们在做大别山应急医院时，陈东升理事长亲自打电话问我缺什么物资，安排一位副总裁和我对接，给我们配备了几百万元的物资。大别山应急医院与我们改造的别的应急医院还不一样。我们一共改造了七家应急医院，其中六家本来就是医院，而大别山医疗中心却只是刚刚完成基建，医疗设备、物资几乎都没有。别的医院我们拿到需求单子时，只要防护服、口罩、面具、手套等，再就是药；但大别山医疗中心提供的基本上是一家新开张医院的完整采购清单，我只有求援。武大校友纷纷伸出了援手。很多校友，包括田源兄、振华兄、蹇宏都给予了关心支持，我们才建起了大别山应急医院。就这样，我们在 9 天时间里建了七家卓尔应急医院，共 4000 多张床位。

2 月 3 日，我接到王辰院士和市领导电话，王辰院士看中了我们的物业——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想用来建方舱医院，我当时 1 秒都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不光把物业拿出来，还把物资、病床找来了。我们是做批发市场的，只用一晚上时间就找到 3000 多张床位，还找到了床单、被套等物资，因为来自批发市场，都是五颜六色的，所以你们看到最早的方舱医院里的床上用品都是五颜六色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由中南医院保障运行，感谢中南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个最早的方舱、一个最大的方舱，两个方舱医院建成之后，我们一直都在支持物资和做后勤保障服务。

武汉市到了 2 月中下旬扭转了人等床的局面，这时我们就开始组织医疗物资的生产。华中数控仅用 10 多天时间就研发出了高速口罩机，并向全国各地供应口罩机。我们卓尔医纺在 3 月份就生产出了有正式批文的口罩和防护服。到 4 月时，武汉抗疫取得了全面



胜利，我们又积极参与了全球抗疫。我编了两本小册子：《新冠应急医院建设运营手册》《方舱庇护医院建设运营手册》。我曾当过编辑，紧要关头，在王辰院士的指导下，我主持编辑了这两个小册子。七天时间编，三天时间翻译，4月18日上线阿里巴巴全球抗疫平台，点击量非常高。10天左右时间就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起到了向全球介绍武汉抗疫经验的作用。到6月时，小册子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版。参与编辑这些小册子的人很多，都是志愿者，包括很多医护人员。这些小册子是大家(包括专家)共同智慧的结晶，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

我一直觉得我们为抗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作为一名湖北人、作为一家武汉企业应该做的，是父母、母校教导我们要用感恩之心回报我们的国家、时代和城市。

实行离汉交通管制之初，我和母亲正在海南休假。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海南开始检测湖北人，我们就进入隔离期，我被隔离了14天。解除隔离后我就决定回武汉，母亲非常支持我的决定。我家的情况是：我有五个姐姐，就我一个儿子，我母亲一直对我备加疼爱，老人家现在已85岁，每天还在关心我吃什么，每天打电话嘱咐我少喝酒，但那个时候她却同意并支持我回到武汉这个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母亲是最伟大的！

面对疫情，我看到了太多人为了这座城市、为了大家奋不顾身，乃至不计生死的壮举。我们社会永远需要热血、永远需要英雄，所以我觉得今天会议的主题“武大校友，人人英雄”非常非常好！在这次抗击疫情中，真正的英雄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是众多下沉最基层的干部和基层工作者，他们都是捍卫生命、捍卫城市的真正逆行者。在5月花开的时候，我因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东湖边隔离，看到了恢复平静且依然美丽如初的东湖，写了《东湖北岸》这首诗：

蓝色的波纹是风的形状
抚摸着湖底隐秘的水草
初见时的东湖扑面而来



午后的荷叶是时间的模样
停留在上面的露珠迟迟不肯离去
就像远山的问候一直在回响
岸边的柳枝绿得正是时候
夕阳也不期而至
水云桥正好有了倒影
不知是湖水还是长堤摇曳了一下
你可曾收到这份来自东湖北岸的波澜

原来我们的武汉依然这么美丽，原来我们生命中还有这么多令人感动的美好，如此值得我们去热爱，如此值得我们去维护！
谢谢大家。

作者系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6 级 EMBA 校友、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校友



宗福邦：毕生年华，尽付冷门绝学

陈菁霞



荣誉和赞美

“我们应该积极准备编纂一部《汉语大词典》，这部‘大词典’应该包括古今词汇，尽可能顾到汉语的历史发展。但是由于种种限制，这部‘大词典’还不可能严格地按照历史原则编纂。（主要因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尚无显著的成绩，汉语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还不清楚。古代文献未能通解的还不少。许多古书的真伪问题、著者问题、撰作年代问题、文字考订问题，等等，都还需要长期的、细致的研究。清代音韵训诂之学偏重先秦经子，汉魏以下成就不



多。唐宋以来语音研究，近年才开始。)”1959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筹备编纂一部历时性的《汉语大词典》，想请丁声树做主编，当年12月，丁先生写出《关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说要编一部兼顾历史的大词典，但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未能付诸实施。

“60年以后的今天，如果丁先生还在，他会怎么想？他该是如何的高兴？同时，我们也会想到黄季刚先生、吴承仕先生，他们如果看到《故训汇纂》《古音汇纂》的编纂成功，又该是怎样的心情？若见到这两部大书，丁先生60年前对汉语研究水平的判断就会不一样。这两部大书，尤其是《古音汇纂》，为下一步的汉语研究提供了多么坚实的基础！这种工作在60年前无法想象，但是在新时期、新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团队，有各方的支持，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10月30日，在武汉大学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古音汇纂》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上，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以一个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30多年的老同道身份”，由衷抒发自己的感想。

《古音汇纂》由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前后历时长达22年。1998年，《古音汇纂》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重大集体科研项目立项，后来，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03年，《古音汇纂》的姊妹篇《故训汇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利今传世的巨制”，把它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列为汉语辞书五部代表作，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84岁的宗福邦先生看上去安详、平和，淡淡的笑容中隐现着愉悦。揭幕仪式上，一旁79岁的安平秋先生扶着颤颤巍巍的宗福邦先生走近《古音汇纂》造型书塔，弟子于亭也趋前搀扶。从1985年领衔主编《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35年间，编纂团队中一拨又一拨成员眼看着他从中年到老年，青丝变成华发。



人生道路的转折

1955年，19岁的宗福邦从家乡广州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原本喜欢文学的他，最大的人生理想是大学毕业能够分配到一家文艺刊物当编辑，或是当记者。“我真的没想到会留校当教师，更没想到会当汉语教师。”宗福邦的普通话很差，平时课堂讨论，他一般不敢发言，但老这样也不是办法。一次讨论的时候，因为前面的人都谈得差不多了，宗福邦站起来说“我保（广州方言中‘补’‘保’同音）充一点”，话音刚落，整个教室哄堂大笑，他脸红得再也不敢往下说了。报考大学时，一心想闯世界的宗福邦未报考家乡的中山大学，初到武大，美丽的校园让他特别兴奋。宗福邦在家乡时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班上同学中也没有广州老乡，刚进武大那会儿，感觉自己“简直像到了国外一样”。他常常在吃过晚饭后，看着太阳在珞珈山对面的洪山慢慢西沉，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无限惆怅。

当年，系主任告诉他留校的消息，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唯恐自己无法胜任汉语教师的工作。“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1960年2月，宗福邦被武大安排到北京，参加语言研究所和文改会合办的音韵学讲习班，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老师一起学习普通话。就这样从音标和发音一点点学起，宗福邦从此开始了他的汉语教师生涯，也为他日后从事汉语研究、编纂词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但有时候“一件事就改变了你一生的道路”。这既是宗福邦对人生的感叹，也是他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总结。

“文革”的头几年，学校停止招生，教师们无课可上，科研工作更是停滞不前。宗福邦说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十年用来当农民做猪倌，剩下的都奉献给了大型集体项目。1975年，他参加编写《汉语大字典》，担任编委和武大编写组组长。此项任务源于同年于广州召开的新中国辞书史上著名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汉语大字典》是这次会议上规划编写出版的160种中外语文



词典中的其中一本。“这也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或许，很多人不愿意做编字典这种寂寞平淡的工作，宗福邦却很高兴，他想把“文革”10年中浪费的学术生命追补回来，能投入到《汉语大字典》这样代表国家尖端水平的编写工作，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学术上的一次重大机遇。

被誉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的《汉语大字典》，其首版由四川、湖北两省300多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经过10年努力编纂完成，于1990年出齐。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完成先贤遗愿，填补学术空白

“至今还记得老理学院翼楼那间简陋破落的大房间，20世纪70年代的办公家具风格，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电扇如同虚设，一排排的木质书架上堆满了手抄的卡片，还有斑驳陆离的枣色油漆桌案前后忙忙碌碌的一群衣装朴素的老师。当我说明来意，询问哪一位是宗福邦先生的时候，从书架后面侧出一张和气的脸，继而走出一位蓝色中山装的微胖中年人，手上灰尘扑扑，拿着几张卡片，团面大耳，说话极慢，一字一声腔。那时候宗先生50出头，还是满头黑发。我诧异地问起，这些书架上怎么都是卡片，这十几位老师都在翻检卡片是在做什么。宗先生告诉我，他们在编一本大书，叫做《故训汇纂》，正在按计划花两年的时间，为辑录的60万张资料卡片做校对和按字目分类的工作。”这是于亭第一次赴汉拜会宗福邦时的情景。1991年，于亭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负笈珞珈山，先是参与编纂《故训汇纂》，1998年开始，与宗福邦、陈世铄两位业师共同主持编纂《古音汇纂》。后来，他承继宗福邦的衣钵，接任武大古籍研究所所长，现在又担任了武大文学院院长。

1983年，国家拨乱反正，发展学术，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宗福邦于同年成为古委会委员，并受命筹建武大古籍研究所，出任



所长。按照古委会当时的规定，每个研究所必须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拿出有分量的成果。武大古籍所队伍基本上是武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原班人马，这是古籍所的骨干力量，也是这支队伍的特色。另外，武大中文系是章黄学派的重镇，宗福邦的师辈中有好几位是黄侃（季刚）先生的弟子。武大古籍所自成立起，就与章黄学派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根据这两大特点，宗福邦将整理研究传统语言学典籍作为武大研究所的专业发展方向。

当年，黄季刚先生在肯定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的价值的同时，曾指出这部训诂学著作在编纂体例和资料收录方面的不足，建议后人校补《经籍纂诂》，同时指出应编一部《经籍纂音》。《经籍纂诂》搜集唐代以前的古籍正文和注解中的训诂资料，内容丰富，这为他们早年编写《汉语大字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编字典要建立义项。这些义项就是利用这些古书里注释家们对它们所做的注释。这些注释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不单单是《汉语大字典》参照《经籍纂诂》，宗福邦在编写《汉语大字典》过程中参照海内外同类著作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的《中文大辞典》、日本的《大汉和辞典》，也都大量引用《经籍纂诂》中的资料。“我们感觉到《经籍纂诂》非常有价值，对学术研究非常有用，但是《经籍纂诂》没有收录唐以后的字义训释资料。我们体会到季刚先生为什么提出要校补《经籍纂诂》。再结合自己的实践，我们深深感觉到，今天的汉语言学领域还有一块很大的空白。”

这就是编纂《故训汇纂》的由来。武大古籍所根据黄季刚先生的学术构想，将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里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关字义训释的资料，进行系统完备的收录，编成《故训汇纂》，其篇幅是《经籍纂诂》的三四倍。而时间上，也比宗福邦原计划的10年超出了8年。“这本书将要完工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古籍所往后的发展。该如何选择？我们决定完成季刚先生的另一个构想，他不是说要编《经籍纂音》吗？那是搜集语音资料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编《古音汇纂》，把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极其丰厚的读音资料这笔遗产和字义资料遗产一样的编出来，把这一块空缺补足了。”

简言之，《故训汇纂》是历代汉字字义训释资料的总汇，勾勒



了两千多年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的脉络；《古音汇纂》则是历代汉字音读资料的总汇，努力探寻汉字字音发展演变的轨迹。《故训汇纂》在时间上接续《经籍纂诂》，且对唐以前的字义资料进行补充丰富，至少在体例上有章（《经籍纂诂》）可循，而《古音汇纂》则完全是新的开拓。“《古音汇纂》碰到的问题要多得多，因为没有参照，完全靠自己探索，探索里边总会有点小的弯路，发现问题就大家讨论，提出新的构想，再逐步完善。”宗福邦说。

2020年11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古音汇纂》高票当选，荣列其中。



遭遇的困难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评价称：《古音汇纂》的完成有赖于宗福邦教授、陈世铄教授、于亭教授带领团队的精诚合作。团队中的主力都是当今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他们不追求个人学术声名自显自贵，而甘于为集体项目和团队合作奉献，一做就是一二十年，为中国的古音研究、学术事业留下了一部丰碑式



的巨著，他们既有奉献精神又有远见卓识，令我敬仰。

“先生教示我的，远不止于授业解惑。追随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立志做一名有操守的学者和教师，皆因敬爱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为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放弃了几乎所有个人爱好和趣味，而且他较之一般做事专注的人，也显得特别持久坚韧。”在于亭的眼中，宗福邦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品质是专注”。

在古籍所团队中渐渐成长的于亭，目睹了导师“萃其全力，直至心力交瘁，年华老去”的过程。和宗福邦一起筹划和主持《古音汇纂》时，于亭还是武大一名年轻的讲师，十多年来，宗福邦一直谆谆告诫他，项目主持人必须要有奉献牺牲精神，不应该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只说不干，一定要吃苦比别人多，做得比别人多。而宗福邦自己也确实在项目工作中自始至终亲力亲为。而与此同时，他还要担任另一个超大项目《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的主编工作。2005年，宗福邦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颈椎高位第一节处骨质畸变造成神经压迫，几近瘫痪。最后，他下定决心去广州动颈椎高位手术，风险巨大，行前，他带上一大摞《古音汇纂》的稿子，计划在手术前后看稿。虽然最后手术顺利，但是他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尤其是手抖日益严重，写字对他成了件艰难痛苦的事情。这期间，他一直坚持带博士，审读论文，经他看过的《古音汇纂》初编稿和初审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他哆哆嗦嗦、凌乱不堪的字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的七八年，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1986年，宗福邦的同学、商务印书馆编辑赵克勤出差途中路过武汉回母校，得知武大古籍所在编纂《故训汇纂》，于是回京后向单位推荐，将该书纳入商务的出版计划，并很快签订出版合同。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出版物的市场情况不太好，商务调整计划，提出压缩《故训汇纂》的篇幅，将原计划的八百万字减至四百万字。听到这个消息，身为主编的宗福邦一个多月里都睡不着觉，头发白了不少。“为什么睡不着？如果我不减到四百万字，他们就不肯出，如果减到四百万，这本书就毫无价值。因为四百万字



跟《经籍纂诂》篇幅差不多，这就意味着必定要删去《经籍纂诂》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而我们新增的资料，也只能部分收录。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说真的是四不像，出版了又有什么价值呢？”最后，几经思忖的宗福邦决定跑一趟北京，亲自找商务的领导商谈。“商务的领导听进去了。他说了一句：就按你们的计划来，不改。这一点我非常感谢。”

早期编写《故训汇纂》的时候，客观条件的艰苦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于亭回忆那时候“不仅要甘于清苦和寂寞，坐遥遥无期的冷板凳，而且往往与个人名利背道而驰，参与的每个人的事业发展和生活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时间长了，人心难免涣散懈怠，时有怨言。宗先生作为主持人，压力巨大，疲惫不堪，但他意志坚定，能善始终”。宗福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团队成员的职称评定和工资收入得不到妥善解决。

“当时评职称都是要讲个人有多少成果，还必须在权威刊物发多少文章，我们这些人都把主要精力用在集体项目上。以我为例，从1975年编字典到现在，这40多年，因为主持这些项目，个人的研究完全停下来了。原来计划80年代大字典出版以后，回到系里教我的书，搞自己的研究，写点书。但是接了古籍所的任务以后，我就必须把古籍所带出来，就必须上重大项目，好好完成它，争取成为这个学术领域新的尖端成果。这样武大古籍所才可能有自己的学术地位。”

宗福邦的很多同伴也是如此。宗福邦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带队伍的任务越来越艰难，大家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作为主编，你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能够保证你底下人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无奈之下，宗福邦找到校领导，最终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队伍渐渐恢复稳定。2003年《故训汇纂》出版，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被誉为“百年学术精品”。武大也将这部书作为学校的代表性成果，凡有外宾来访或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时，都作为礼物赠送来宾。“但是那段路走过来，我们也付了代价。我好几位同辈朋友到退休时只评上了提退教授，还有几位连提退教授都没当上，副教授时就退休了。到今天我一直都感到有愧，总感觉没有尽到我的



责任，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好，对不起大家。”

“他一生从事音韵学术，绍继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也继承清儒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考据学风，敦兹实学，谢彼虚谈。他年青时代，以《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中国语文》，1964）和20年后《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一辑，1984），奠定了在汉语入声性质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地位。但按照他的说法，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十年用来当农民做猪倌了，剩下的都奉献给了大型集体项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话题，要么不能做，要么只能让路，一放再放。”总结导师一生学行，于亭认为宗福邦身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奉献”。“白首丹铅 自具光华。”弟子于亭概括宗福邦的这句话，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27日；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0年11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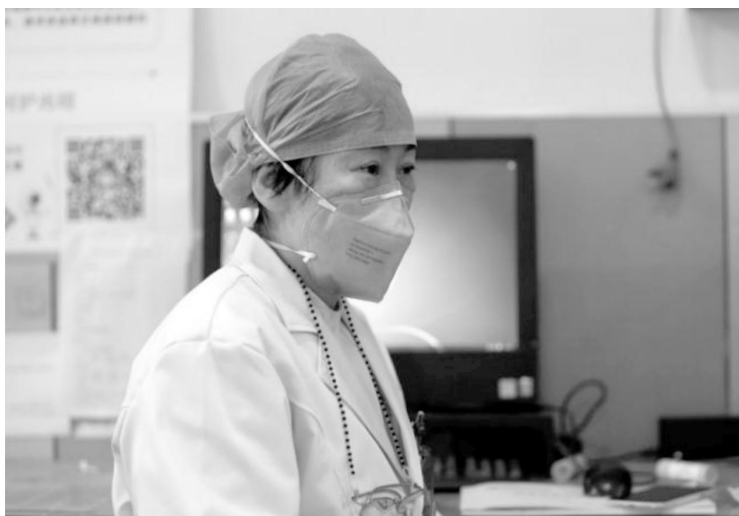


张继先：“疫情上报第一人”

付晓歌

2月6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给予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和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记大功奖励。

张继先是武汉大学1989届临床医学专业校友，作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她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后，最早和院方一起上报。为什么她能成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感觉自己做对了

事情要追溯到 2019 年 12 月 26 日，医院附近小区的一对老夫妻来医院看病，以为只是普通的发烧、咳嗽，拍出来的胸部 CT 片却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

2019 年 12 月 27 日早上，呼吸科交接班时，张继先看到胸片后，凭借自己的医学思维和敏感性，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她赶紧让老两口把儿子叫到医院来做检查。儿子没有任何发热咳嗽等症状，但 CT 片上显示肺部有相同的表现。

这一天，医院还来了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的肺部表现。“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很少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张继先给这些患者做了甲流、乙流、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与流感相关的检查，全部呈阴性，从而将流感排除。

“这到底是什么病？”张继先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12 月 27 日，她把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12 月 28 日、29 日两天，门诊又收治了 3 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到这时，就有 7 位一样症状的患者了。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病症，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有 4 个患者了，这肯定有问题。”张继先判断，7 个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区别。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

12 月 29 日下午 1 时，分管副院长夏文广召集了呼吸科、院感办、心血管、ICU、放射、药学、临床检验、感染、医务部的 10 名专家，大家对这 7 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影像学特殊，全身症状明显，实验室检查肌酶、肝酶都有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当知道还有两例华南海鲜市场类似病史患者在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接受治疗时，医院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12月29日是星期天，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往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傍晚，武汉市传染病定点收治医院相关专家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名患者，接走了6名，其中轻症3名、重症3名，另1人留下继续治疗，于1月7日病愈出院。

疫情发现越早越有利于控制，“我们现在感觉自己做对了！”张继先说。

“张继先能够敏锐发现疫情并及时上报，我们都不感到奇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主任么冬爱说。读书时，张继先和么冬爱是同班同学，睡上下铺。

“上学的时候，她学习非常好，有一股子钻研精神。”“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她对待专业有一种刨根问底的劲头。”采访中，张继先的大学同学这样评价她。



张继先在武大上学时的登记照



第二排右二为张继先

么冬爱认为，张继先能如此敏感地发现疫情，得益于上学时培养的扎实专业功底和医学思维体系，再加上她对工作有着勤于钻研、精益求精的态度。“她是一个心系工作的人，她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同学们分析疑难病症，时刻不忘本职工作，连同学聚会时也不例外。”

SARS 时期锻炼出来的思维

正是因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张继先意识到情况不对，“这个病到底是否具有传染性？”

收治最初的一家三口患者住院时，张继先就在呼吸科病房隔出一块相对独立的地方，打造了一间隔离病房，共有 9 张病床。张继先再次向医院报告了患者的收治情况。

从 27 日发现那一家三口起，张继先就要求所有的呼吸科医护



人员戴口罩，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医院给他们科室批了N95专业防护口罩，“我们只有进入那个区域才戴N95，其他区域还是一般医用口罩。”张继先说。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级医院之一。6位患者被金银潭医院接走后，张继先的呼吸科门诊又陆陆续续收治了类似的患者。到元旦时，这9张隔离病床已不够用了。

仅有口罩，张继先觉得还不够。她又在此时嘱咐科室人员在网上订购了30套细帆布的白色工作服，当做隔离服。2019年12月31日，这批工作服寄到了医院。在进入隔离区域时，张继先要求大家多加一层防护。“不管怎么说，我们多穿一层，对自己防护就好一点。”张继先说。她还明确要求隔离区内的所有医疗用品均不可与其他患者混用。“为了避免二次感染，医疗废弃物做好单独处理。”

一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能够人传人，这30套“防护服”终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当天，医院给他们配备了三级防护服。

随着疫情的发展，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的门诊量开始激增，有相似症状的患者越来越多。张继先担心出现患者交叉感染，和同事们一起给其他呼吸道慢性病住院患者做工作，让他们尽快出院。有的患者不愿意出院，医护人员就耐心地劝说。

尽管防护装备跟不上，但医院处处小心，尽可能把防护做到极致。由于处理得当、上报及时，在疫情大面积爆发前，张继先所在的科室做到了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无患者交叉感染。

张继先说，对传染病的防护意识生根于SARS。2003年抗击SARS时，当时37岁的她是江汉区专家组的成员，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到各个医院排查疑似者。

“我从那个时候就认识到什么叫公共事件、什么叫群体事件。”张继先说，医生看病，要问患者的住址、职业，这一下来了四个华南海鲜市场的，怎么会没有问题？“这就是SARS时期锻炼出来的思维。”



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元旦期间，呼吸科的门诊量开始激增，由原来一天100人左右，增加到230人左右，有着相似病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1月17日，医院将住院部一楼改造为专门的隔离病区。1月30日，医院成为第三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疗定点医院。医院改造成立了6个病区，设置了160张床位，承担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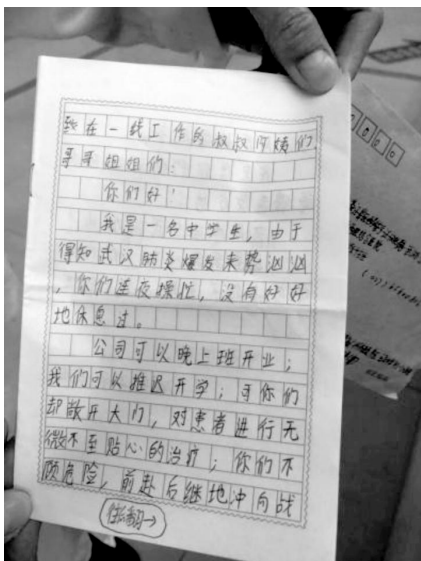
张继先“像救火队员一样”，在离疫情最近的地方战斗。她告诉记者，医院采取的是三级负责制，作为呼吸内科主任，危重病人由她来负责。其他同事忙不过来时，她也会主动顶上去。

疫情的逐渐蔓延，考验着无数医护人员。“从12月底到现在，我们几乎都没有休息过。每天从睁眼忙到天黑，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下班倒头就睡。”张继先说。

据了解，医护人员仅脱一次防护服就需要耗时半小时，有27个步骤，需要12次消毒双手。防护服不透气，还要戴N95口罩，几个小时下来，身上全部都湿透。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医护人员几乎一天不吃不喝。因为N95口罩贴合很紧，许多人鼻梁和眼下都生了压疮。

随着疑似患者越来越多，呼吸科人满为患。需要救治的病人太多了，时间完全不够用，医护人员面临巨大的压力。看着身边的医护人员被感染，张继先心痛又无奈，“我们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做到万全的防护”。

2月8日，中西医结合医院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用稚嫩的笔迹写着“张继先收”，这封信来自广州市五羊中学一位中学生。“公司可以晚上班开业，我们可以推迟开学，可你们却敞开大门，对患者进行无微不至贴心的治疗，你们不顾危险，前赴后继地冲向战场……武汉加油！”信封里还夹了这个孩子捐的五百元钱。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感觉非常温暖。”张继先说，“谢谢这位小朋友，正是因为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我们感到很振奋，很暖心。我们现在坚持工作，才能让更多患者得到治疗。”

张继先说，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同学们通过微信、电话纷纷给她加油打气，提醒她注意防护，注意安全。这也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

据悉，经过治疗，已经有不少医护人员痊愈出院了。张继先不断为同事们加油鼓劲，她告诉团队，以前我们是“白衣天使”，现在我们是“白衣战士”，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采访手记：

当记者用微信联系上张继先时，她还奋战在抗疫一线。工作间隙，她表示晚上可以通电话。

“喂，你好，我是张继先。”在元宵节的晚上，记者拨通电话时，听筒那头传来的声音有一丝沙哑，疲惫感扑面而来。



由于抗疫工作十分繁重，张继先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采访。她说，这些工作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需要团队的共同努力。后来在同学的再三劝说下，她决定接受来自母校的采访。她说，同学们认为她的亲身经历能够激励学弟学妹，听到这句话时，才下决心接受采访。

“医护人员肩负着治病救人的使命。”张继先希望医学生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认真，并且有持之以恒的毅力。

她认为，大学时期认真学好基础知识非常重要，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进行再学习更加重要。仅仅是经过5年、8年的学习，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磨练。“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不断了解最前沿的医学进展，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在临床工作中进行检验，不断提升专业技术能力。”

此外，她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还要有人文关怀。“尤其是要注意与病人的沟通方式，要尽量用病人听得懂的话语与他们交流，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

当得知母校还有部分留校师生后，她十分担心，让记者务必转告各位老师和同学，一定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做好防护工作。“能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我们再熬一熬！”

一件事情做一次容易，如果能坚持做10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热爱。但如果一件事情坚持做30多年，除了热爱以外，或许就还有更多的原因了。记者在张继先身上体会到了，这是一名武大学子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更是一名医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稿件来源：部分素材来自《长江日报》等媒体报道；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0年2月9日）

珞珈记忆





曾绽放在武大的三朵金陵女大玫瑰

陈 超

一、潘耀琮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5—1951)办学36年，共999位毕业生，世人称999朵玫瑰。999朵玫瑰，是中国女性中的幸运儿，是中国女性争取独立自由的先行者。

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潘耀琮教授(1918—1987)就是999朵玫瑰中，绽放在珞珈山上的一朵。

从40多年前最后一次亲聆先生教诲、关爱，到今天第一次看到先生学生时代的照片，才更加懂得当年在武大外文系课堂上、在老师三区住宅客厅里，所目睹和感受到的先生的气质、风范，渊远、深厚、久长。

1936年秋，潘先生考入金陵女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幸运儿们”流离逃亡，继续求学，教育抗战。

1938年9月，金陵女大历经两个月——7月15日—9月14日，经水路(上海—香港)、陆路(香港—汉口—重庆—成都)，跋涉2500多公里，到达四川成都华西坝，在轰炸与空袭警报中，与其他四所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办学，共设文、理、医、农、教5个学院、60多个系，前



后有 3000 名学生。



(潘先生公子，武大 1977 级校友章建平博士提供)

学生可以跨校、跨科选课。主修英国文学、辅修教育的潘先生所修近 33 门课程里包括：艺术入门、普通心理学、初等物理、中国文学史、中文散文名著选、英语作文与文学、16—18 世纪英语散文、英语作文、英国小说史、英国独幕剧、近代英文文学背景、古典文学、翻译、中古文学、英语辩论等，并完成毕业论文：“Three Plays Based on the Novels of Charlotte and Emily Bronte”。

当时的金陵女大大师云集：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赖朴吾、魏时珍、李晓舫、张大千、傅抱石、卜凯、沈宗翰、戚寿南……更有学者和各界人士的来来往往：1941 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演讲，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海明威也就吼叫般完成了演讲。1943 年，“李旋风”李约瑟先生在坝上进行了 12 场演讲，一直持续 20 多天。

当时的学术研究、教育和生活的物质环境匮乏，但教育的精神、理念、实践，却刚毅而坚卓。

1941 年，潘先生毕业后，被举荐在金陵女大英文系任助教。并很快晋级，教授一、二年级英语课，与自己的导师克馥兰博士



共事。

系主任克馥兰教授在一封写于 1945 年 2 月的信中这样描述师生两人共同教学的故事：这个投影机归我们专门使用，由我和潘小姐负责，我们就像两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晚间 5—6 点，就在宿舍放电影，学生们非常踊跃。我感觉这种教学方法很有前景。



来源：Special Collections, 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RG 11, Box 408, Record 3567).

潘老师教英语，语法扎实，强调交际口语，尤其通过放映英语电影进行教学很受欢迎。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从华西坝返回南京复校。师生分六批，走陆路，从成都坐(军用)敞篷卡车到宝鸡(陕西)，再乘火车经西安、洛阳、徐州到南京。23 天后，(1946 年)5 月 25 日 10 点 15 分左右，潘先生乘坐的车队到达上海火车站(北站)。

.....

1947 年 7 月 17 号，潘先生乘 General M. C. Meigs 号轮船从上海出发，8 月 25 号在三藩市靠岸，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

1948 年 6 月，金陵女大再次举行毕业典礼，吴贻芳校长发表赠言：“同学们，由于抗战，条件有限，本届毕业生不多，只有 28



位。人数虽然少，但是，将不在多而在精，金陵女大从来都是不重数量而重质量的。如今，经过四年的校园生活，28棵幼嫩的小树，已经长成28根栋梁之材；有了这28根栋梁之材，可以搭建一间宏伟殿堂。明天，你们即将走出校园，奔赴四面八方。希望你们不是温室的花朵，而是生命力顽强的种子，不管撒到什么土壤里，都能破土而出，抽穗扬花，开花结果，对人们有所奉献。”

同年同月，潘先生在大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1952年，潘先生从南京来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当时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取消外文系，直至1958年才恢复），和袁昌英先生一起合编《武汉大学讲义——外国文学》。

珞珈春与秋，玫瑰铿锵。

二、黄孟姒

阅读，寻觅，与故人交谈，不舍放下……邂逅更多珞珈山上的金陵玫瑰：黄孟姒，朱君允，两位同是金陵女大第四届（1922年）毕业生。



来源：Special Collections, Divin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RG 11, Box 397, Record 918).



黄孟姁四年前入学时正逢 1919 年五四运动，各地学校停课，金陵女大的年轻姑娘们也要停课，校园里的外籍教师当然感觉这是盘古开天地的举动，不鼓动，也不阻挠。原因是北京大学那时已开放了，实行男女同学；再者，同在南京一地的东南大学也在准备男女同校。（朱君允原话）

身为金陵女大学生领袖成员的黄孟姁，入学前就在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 Hall for Girls)年刊《凤藻》创刊号上(1919 年第 1 期第 11~13 页)发表文章《今日女学生应有之觉悟》，反省女性读书的意义和责任：

“我等女輩家庭責任之大，有三：第一，當力排多妻主義，以重人道。第二，當註重幼稚教育，以固人格之基。第三，當改良家庭衛生，俾國民有趨於健全之一日。對於社會亦有三。第一，當創建慈善事業，以救貧苦病老之同胞。第二，當設立學校，以求教育之普及。第三，當創辦實業以蘇垂斃之民困。……即明一己對於國家之關係，又有對於家庭社會盡責之覺悟，益以堅誌耐性，以善所操術，為國犧牲，為人服役，則不愧今日之女學生矣。”

主张“当注重幼稚教育，以固人格之基”的黄孟姁刚好赶上 1922 年的学制改革，即北洋政府公布的“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根据新学制，一门崭新的课程——社会科，取代了清末以来注重道德教育的小学修身科。

1923 年，黄孟姁和王伯祥先生共同为“社会科”中的地理科课程起草了《新学制小学学程纲要草案：地理科课程纲要》。这是中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上首次问世的专门纲领性文献，具有开拓性意义，其两大主旨为：“（一）启发研究环境生活的兴趣，并使了解人事生活与地理系的各种大问题。（二）培养人生和自然的情感，

地理科課程概要（黃孟姁 王伯祥擬）

（一）主旨

（一）啟發研究環境生活的興趣，並使了解人事生活與地理關係的各種重大問題。

（二）培養人生和自然的情感，養成對於環境喜考察、思索、研究等習慣。

（二）程度（最低程度）

《教育雜誌》1923 年，第四號，第十五卷



养成对于环境喜观察、思索、研究等习惯。”这个文本见证了前辈教育革新的努力。

1924年，金陵女大礼拜堂奏响婚礼进行曲，黄孟姁小姐与时任东南大学教授的查谦先生喜结良缘。

1925年4月11日，查先生、查太太的长子查全性出生。

1932年，查谦先生出任武汉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教授，黄孟姁也在英文系任讲师。后来的故事，武大人就熟悉了：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1977年建议恢复高考。



查全性教授女公子、武大1977级校友查小蕙博士提供

** 王伯祥，1890—1975。我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出版家，与章元善、顾颉刚、叶圣陶、俞平伯，并称“苏州五老”，亦称“姑苏五老”。

三、朱君允

之前，朱君允为人们所知，或许是因为熊佛西——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之一；朱君允为武汉大学校友所知，或许是因为1947年珞珈山上的“六一惨案”，朱君允是当时五位被捕的教授之一。

1940年秋季，吴贻芳校长请遭遇婚变的朱君允在金陵女大（四川成都华西坝校区）讲授“西洋通史”和“英国文学”，这一年潘先生在金陵女大读四年级。



1942年，朱君允受朱光潜教授邀请到武汉大学(四川乐山校区)负责武大女生管理工作，并在英语系授英语散文。朱光潜“深知夫人人品学识俱佳”，朱君允从此开始一份武大缘。

1946年，朱君允携三个子女随武大迁回武昌珞珈山，和她同期在英语系的教授有袁昌英、张月超、许海兰等。1952年，潘先生初到武大，这对金陵女大姐妹从师生成为同事，并合住特三区一套四合院式的西式平房，同门出入，成一段佳话。1953年，武大外语系调整至中山大学，袁昌英教授和潘耀琰教授转到武大中文系，教授英国文学，而朱君允则主要从事校工会等社会工作。在女工部，她为建立托儿所、缝纫组等四处奔波，并当选为武汉大学第一届教工会的主席，还被选为湖北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窗高穹深，木桌厚重，书墨香醇，前人音容，可闻可感，往事钩沉，在这静谧中。

先辈察我心诚？我在阅览室里寻找朱君允，而她却分明就在墙外，图书馆门前：

“一九二五年
暑假，一個夏
末秋初的上
午，在美國哈
佛大學圖書館
前，那層層石
級的梯步上，
一樵站在石階
頂級的左邊玻
璃門外，方剛
站在石級右邊
的中層，背倚
石欄。經菊農
的介紹，和他
們兩位初次見
面。
…
…
”

*一樵，即顾毓琇；菊农，即瞿世英。

我在寻觅那个“之前”，成为熊夫人之前，成为母亲、且独自将三个孩子抚养成成人之前，成为教授之前，从“全国人民大会代表”到“右派分子”之前……

之前，之前的那个朱君允，命运沉浮，世事沧桑，初心安好？

1922年金陵女大毕业后，朱驕为自己更名朱君允，并于1924



年9月赴美国留学，在布林莫尔(女子)学院(Bryn Mawr)读历史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来源：LancasterHistory, Lancaster, Pennsylvania。(Rebecca Walton Greist Photograph Collection。Object ID: RWG-01-05-48)。

初出国门的朱君允感叹美国女大学生“天真烂漫的快乐生涯”。观景西洋，调侃起来却东方韵味十足：

難。易，但是致。有的一的襟緩件唇們穿的唱早上and喜裏真
。是天生...一種，倒也，袖步黑，粉。詩上歡的女好玩
人美人...風另揚移，大褂，面朱。一定要禮穿。孩子，這

哈哈，朱君允小姐够俏皮的。



繁盛區不談風景。遊玩之余，至今印象猶存的是波斯頓美術館中一幅詩人唐德

(Darce) 慕美圖。

著色艷而純潔——這畫的史事艷跡，精神都在顏色中烘托出來了。比契斯

(Beatrice) 著淺紅

衫，唐德著大紅袍。

全畫的空氣是和，

靜，逸。比契斯仙逸

卻又莊穆，與我們心

目中的洛神情影，神

情態度迥然不

同。……宇宙精華也

祇有美術，詩人能得

其神髓！

(遺憾的是，这幅荷兰画家 Ary Scheffer 作于 1851 年的油画当下没有展出，我一时还不能亲临瞻仰。)

战乱年代，独自谋生并抚养三个子女，自然灾害，饥荒……命运多舛的后半生中，朱君允始终留有对美的敏感和惊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她的诗文就集结成册，书名《灯光》，当年的武汉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陈西滢亲自为这本文集作序：她有一支生动的笔，而且她对于中西新旧文学有高深的修养。……作者是中华民族一个极有勇气的女子，她文章中并没有只字诉说她目前的身世和藏在心灵深处的悲痛。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她还是眼望着一线的《光》，期待着《黎明》。

20 世纪 60 年代初遇灾荒年，时已年迈体衰的朱君允坐在矮凳上，在自家门前翻土捡石、种蔬菜，辛劳有所得时，填词寄情赞美：

玉米

黄澄粒粒玃珠价，碧润株株串宝财，
万民饿饱赖多栽。风雨顺，老幼笑颜开。

丝瓜

施肥润土殷勤侍，搭架牵藤仔细培，
黄花翠叶映窗台。清夜月，绿洗玉瓜罍。



** 1948年，朱君允的小女儿熊性淑收到金陵女大录取通知书，却为学费发愁。而此时，在武大任教的赵新娜收到父亲赵元任先生寄来的20美金，资助任何一位无钱求学的中国青年。熊性淑幸运得到赞助，却终因战乱未能赴南京，借读武大外语系。20世纪50年代初，金陵女大女婿查谦先生在华中工学院亲自主持了熊性淑的婚礼。日后，熊性淑的儿子张力毕业于武大外文系。

档案资料：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别馆藏金陵女子大学校史资料，包括：董事会会议记录、报告、教员和学生档案、校友问卷、年刊、通讯、书信、日记等。

作者系外文系1977级校友



中国“绿色”化学的先驱和斗士

——忆我的导师张俐娜院士

蔡 杰



张俐娜，高分子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

我最早听说张俐娜老师是在大二的时候，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她很厉害，科研非常了不起。到了大三，我因对这位厉害的女教授实在感到好奇，便趁一次下课时和同学一起偷偷跑到张老师的实验



室去了。张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风度优雅、端庄秀丽。

后来，我进入张老师创建的武汉大学天然高分子与高分子物理实验室。有一次，张老师和我们谈起将来的打算，听我讲完正在选修双学位和想做科研之后，她问：“你想要做什么？要双学位就别到我这里。”深思熟虑之后，我考取了张老师的研究生。自此，我对张老师有了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做事非常专注。

2020年10月17日，我的导师张俐娜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和她为之奋斗一生的高分子物理和天然高分子科研事业。

巾帼楷模 珞珈独秀

博士毕业后，我在张老师的推荐下获得日本学术振兴协会（JSPS）奖学金，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张老师在东京参加国际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跟我谈起，她曾在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的推荐下作为访问学者在大阪大学开展高分子溶液理论研究，深刻感受到巨大的差距而更加刻苦努力。

张老师不仅自学了日语和英语，还在短短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两篇英文研究论文。从日本回国后，张老师选择坐“冷板凳”，从事当时在国内并不受重视的天然高分子研究，就是为了让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不再落后于发达国家。深受张老师的感召，我也放弃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 Derek G Gray 提供的 offer，在完成东京大学的工作后回到母校任教，作为张老师的同事加入团队。

经过近30年的不断努力，在张老师的带领下，团队针对农林渔业废弃物中大量的纤维素、甲壳素和壳聚糖等生物质资源，潜心研究、攻坚克难，不断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并初步实现绿色工艺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和甲壳素纤维的工业化，研究成果的原始创新性、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国际天然高分子领域著名研究团队。

张老师也在2011年获得国际可再生资源领域最高奖——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同年，张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年唯一的女院士，



也是珞珈山上唯一的女院士。2015年，英国皇家化学会 *Chemistry World* 刊物评价她为“中国‘绿色’化学的先驱和斗士”。

深耕厚植 求是拓新

张老师经历过一个特殊的年代，历史的原因让她错过了最适合打拼的青春岁月，直到46岁才得到施展才华的舞台，算是“半路出家”的科学家。

天然高分子的基础研究长期以来都是非主流，我最敬佩张老师的就是她甘于坐“冷板凳”，勇于探索、不怕失败。纤维素是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同时也是最“顽固”的天然高分子。传统黏胶法生产纤维素人造丝和玻璃纸由于使用了有毒的二硫化碳，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开发新溶剂和新工艺成为国际学术和工业界长期以来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张老师给加入实验室的每位研究生的第一个课题都是“寻找纤维素新溶剂”，鼓励大家持之以恒、大胆创新，不能遇到问题“绕着走”。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发现低温预冷的氢氧化钠/尿素水溶液能够在数分钟内快速溶解纤维素，并提出溶解机理，开发出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湿法纺丝新工艺。我也因此作为第三完成人与张老师一起获得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成为张老师的同事之后，我仍然习惯于解决“硬骨头”，做有挑战性的工作。2012年年底，在我破格通过教授职称的第二天，张老师希望我能够在甲壳素新溶剂上多想想办法，解决当时仍然需要循环冷冻—解冻溶解甲壳素的难题。在实验室已有基础上，我们赶在新年前筛选出能够在数分钟内溶解甲壳素的新溶剂，申请中国发明专利，并很快获得授权。

后来，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甲壳素和壳聚糖新溶剂体系，提出新的分子机制和原理，并构建高性能和多功能甲壳素和壳聚糖新材料。张老师深耕厚植、求是拓新的科学精神将被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纯粹学术 言传身教

在成为“高分子物理”专业课主讲教师之前，张老师要求我随堂听了她整整两个学期的课。我注意到张老师每学期都要更新课件，每次上课前都会提前认真备课，始终如一坚持站在讲台上授课。

每届学生私底下都称呼她为“张奶奶”。张老师曾荣获 1993 年“全国优秀教师”、2000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17 年度“武汉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2019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杰出贡献校长奖”等荣誉。国庆节入院的前几天，张老师还抱病连续两天坚持参加学校 2020 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学典礼。这也是武大学子最后一次见到张奶奶。

张老师经常对我说，我们不能只埋头写论文，还要多做一些公益性工作。2012 年，她组织撰写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天然高分子基新材料丛书》(共十本)，是国内外第一套详细介绍天然高分子的学术专著。2014 年，她又承担中国科学院咨询项目，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历经两年多时间，通过多次调研、考察和研讨，最终形成《关于海洋生物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的咨询报告，并呈送国务院献计献策。

每次陪同张老师出差，从来都不会有旅游等娱乐活动。张老师的朋友经常劝她注意休息，她说：“我都还没退休，你们怎么能退休呢？”她唯一的爱好就是科研，开足马力永不停歇。正如张老师所说：“我从事这项研究，是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们世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尽我们所能建设好这个国家。”久而久之，我也养成开完会就返回学校工作的习惯。

张老师经常鼓励我们，“中国人应该做自己的创新工作，而且在做基础研究时还要考虑应用前景，这样才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也才会有科研激情和动力。”2019 年，在张老师 79 岁时，她说，“国家需要绿色发展，所以我要把我们的技术做成各种各样的材料。我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让我们的产品慢



慢走向市场，走出一条新的‘官、产、学、研’道路。这是我一个新的梦想。”

张老师在离开我们的半个多月前，不顾医生和我们的劝阻，依然前往外地合作企业了解项目的最新进展，并讨论后续工作计划。回来后她还非常开心地把带回来的样品拿给我看，让我跟企业继续加强联系。即便是在最后的日子，她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她的绿色梦想。

（稿件来源：《中国科学报》2020年11月3日，标题有所改动）

作者系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1997级校友



真正“富有”的是杰哥

侯焕昌

广东梅州城区仲元路，有一个小小的侯屋，住着五家人，也许是全梅州最小的侯姓祖屋。但就是这间不起眼的老屋，在六十年前，引来了梅州中学有名的老先生，考究为何在此普通环境下，能累出优秀学生，产生读书人。

拉开读书序幕的是我父亲兄弟俩。据说伯父侯天生酷爱化学，读中学时就常在家做会变颜色的化学试验，引得小孩啧啧称奇。未几，伯父考上清华大学赴学，适逢抗战加内战，家里失去了在南洋经商的爷爷的经济资助，生活困顿，我爸侯湘生初中毕业即辍学去小店做学徒，兄弟俩约定挣钱后互相供对方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广州政府工作任科长，工资涨到令人羡慕的80多元，他却毅然辞职，自学高中课程并考取华南理工大学后留校任教，工资倒退，20世纪70年代只领70多元，我问他后悔不，父亲笑答：上大学是毕生愿望，岂敢悔之。

我堂伯有七位子女，侯杰昌(杰哥)排行老二(其他兄妹都多有建树，这是后话)，我们都尊称二哥。他学习禀赋优异，记忆力惊人，家里人都相信他能考取任何一所大学。据说堂伯眼见伯父远在北京，多年未能回家谋面，故吸取教训，规定杰哥只能选读广州的学校，杰哥不从，要去北京，僵持不下，双方让步最终选在武汉。

命运就是如此神奇，杰哥与武汉大学就此结下一世缘。在轻松度过本科学习后，杰哥以优异成绩毕业且免试保送读研究生，在毕业后留校任教。至此，侯屋的读书潮兴起，父兄给了我们最好的引领和激励。尤其是我们和杰哥两家，在我们上下三代中，考取清华



北大的有三人，考取武大的有四人，考取华中工学院的有三人，考取其他大学的还有 10 多个，出国留学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 10 多人，最厉害的群芳妹在哈佛做的博士后；成为老师的有 10 多人，且一半是大学老师。



小时候，父亲经常讲伯父和杰哥的读书事迹，并告诉我们远在太原的弟妹们读书用功出色。“狡猾”的父亲从来不要求我们读书，但却在我们心中埋下了读书的种子，我考上重点大学后他还故作惊讶。

我们都很期待杰哥探亲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和蔼可亲，满脸笑容，洪亮的声音总是能感染所有人。他从不谈论自己，更多的是讲伯父和父亲的事迹。1980 年，我从《人民日报》等报纸看到湖北破格提升了三名教授，首位就是侯杰昌。自豪之余我对他表示祝贺，他淡然道：“出差在外不知道，回来捡了个教授做做。”未几，他征询我意见，刚获得一笔科研成果奖金，问是买录音机还是洗衣机好，我问他为什么只能选这两样，他解释前者能帮助学英语，后者能节省时间多读书。

20 世纪 80 年代中，杰哥来广州出差，邀我一叙。晚上聊得太晚，没有公交车回不去了，我只能受邀和他挤在梅州驻穗招待所的小床上过了一夜。我估摸小床大约 1.2 米宽，那时的他已经是空间物理系主任了。学空间物理的就是能伸能屈啊！



20世纪90年代，我到武汉大学看望他，第一次进他家，感叹他生活的清贫；他解释：其实前几年有机会回广东工作的。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杰哥的发言引起了当时的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副院长、我国著名电子学家冯秉铨的注意，冯先生知道他是梅县人，力邀他加盟华工，却被杰哥婉言谢绝了，理由是舍不下武大，且夫人有风湿病不适合潮湿地方的生活。

那次，杰哥花了半天时间带我徒步参观校园，一路欢声笑语，所遇见的老师、学生都对他礼貌问候，不敢上前打招呼的同学也都投来仰慕的眼光。行到一处纪念碑，杰哥介绍是为纪念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所立。他说，此公非常了不起，一生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十几个职务，但最后立下的遗嘱却是：墓碑上所有职务都不要，只留“前武汉大学校长”一职。杰哥轻轻的几句话让我明白了：真正富有的是杰哥、是侯老师！



我后悔之前对武大和杰哥了解不多，没能慕名前来投读武大，好在弟弟联昌在我的动员下进入武大就读。杰哥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了极大帮助，他笑说联昌和温坚（另一亲属）周末到他家，能



吃掉十斤牛肉。我说怪不得你都被他们吃穷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联昌出息后，每次去看望杰哥，都尽量给个大红包感谢老哥，甚至还给杰哥换了大电视，充当了我和杰哥的纽带。

杰哥对亲属的要求很严格。据说他小妹远途来武汉探望，他竟然告诉她怎么坐公交去武大，完全没有派车去接的意思！一次我在他家做客，学校一位处长刚好来电话请示工作，杰哥请他帮忙订餐请我吃饭。饭毕，二嫂悄悄地去把账结了。又有一次，杰哥到珠海出差，我同学是当地一位银行行长，想读武大的研究生班，杰哥热情地给他介绍了各专业，不久还寄来招生介绍及复习资料，却丝毫没有帮其他忙的意思。我同学只能知难而退，还苦笑着赞扬了侯校长。



二嫂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杰哥同样出色。我们都非常喜欢二嫂。遗憾的是，二嫂患类风湿病二十几年了。每年寒暑假，杰哥便带上夫人全国各地遍访名医求治，所幸病情控制住了。二嫂经常调侃：侯杰昌在外是校长，在家是我的保



姆。恩爱之情，羨煞我们。在二嫂生命的最后几年，杰哥更是尽全力服侍。二嫂在天堂应该也是满怀深情地等待着她的他的。应该是杰哥也舍不得她，竟然在她走后没多久就得了脑瘤。我和弟弟专程前来探望，弟弟说最多只能谈半个小时，不能过分打扰他；杰哥见到我们却非常高兴，谈了一个半小时。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会住下来陪老哥好好聊聊的！

杰哥，您走了，但没带走满面的笑容

杰哥，您走了，但没带走爽朗的笑声

杰哥，老伙计，您没带走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杰哥，您慢走，来生咱们还做兄弟！

作者系侯杰昌堂弟



我的恩师朱英国院士

黄文超

初识先生

1996年，我考取了四川农业大学，4年本科学习之后，2000年，我又继续在本校攻读硕士研究生。2003年年初，离我硕士毕业还有半年时间，我的指导老师曹墨菊教授来到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朱英国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植物雄性不育研究，曹老师了解到我要继续深造之后，积极推荐我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曹老师告诉我，先生是一位人品很好的教授，学术成就很高，在领域内十分出名。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就积极备考，在考前一个月，我来到了武汉大学，一是想提前熟悉环境，二是想见见真真切切的先生。我怀揣着一颗紧张而又忐忑的心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初进先生的办公室，看到的是一个房间被隔成了非常狭小的两个单间：外面是先生的助手工作的地方，里间才是先生的办公室，这与我之前想象的有些不一样。一进入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了一位头发花白、脸上有些白斑，但精神非常好、也很和善的老者。先生很热情，站了起来，用略带罗田乡音的普通话招呼我坐下，还倒了一杯温开水递到我手上，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此时此刻的我不再紧张和忐忑，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轻松而又温馨。先生随后说，欢迎报考武汉大学，国家现在急需具有农学专业基础的人才，并向我介绍了团队的一些研究成果，这让我更加向往加入先生的团队去学习和提升自己。



一腔热血找到了方向

2003年4月，我以优异的笔试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但入学还要通过面试这一关。当时国内正暴发非典(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很是危险，先生知道我是四川人，学校在四川雅安，从雅安到武汉上千公里，路途遥远。于是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荣廷昭院士，委托他组织有关老师，在四川农业大学对我进行面试，先生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我的面试成绩也很优秀，这样我就很顺利地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7月，离入学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四川农业大学办理完毕业相关手续后，我未做丝毫停留，就买了前往武汉的车票，我想尽早来到先生身边，聆听先生的教诲。在武汉大学安顿好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先生，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亲切和蔼，关心着我的衣食住行。先生问到了我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坦白地说，我当时心里还真没有什么研究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我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一颗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决心。我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告知了先生，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很和蔼很耐心地告诉我，要深入了解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跟随师姐师兄们学好技术、打好基础；要多读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跟紧国际研究前沿步伐。先生说，做科学研究既要埋头苦干，也要抬头看路。先生也谈到了红莲型杂交水稻，让我多了解水稻雄性不育与育性恢复方面的知识。之前我一直都是以玉米为对象开展研究，完全没有接触过水稻，是先生让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水稻叫做“红莲型杂交水稻”，还让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红莲型杂交水稻”是国际公认的水稻三大雄性不育细胞质之一。

领受核心科研任务

初到武汉大学，先生让我从最基本的水稻杂交开始研究，我做杂交研究的水稻试验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8月的武汉，太阳毫不



留情地肆意照耀着大地，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武汉是全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名声绝不是虚传的；更为要命的是，水稻的开花时间偏偏就集中在太阳最直射地表的时刻，中午12点左右，我必须抢在那个时间点去田间授粉，方能杂交成功，否则将颗粒无收。我每天头顶烈日、脚蹬长靴、身穿长袖，汗水像泉涌一样从身体里向外流淌，数度模糊了我的双眼；而我却像士兵一样始终高昂着头，无比忠诚地守卫在稻田里，做着杂交试验。在我眼里，我守卫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科学研究，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有一天气温特别高，太阳似乎是要把自己的全部能量都赐予大地，尽管我自小就生活在农村，具有极好的耐受性，但这样的火热炙烤，已达到了我的生理承受极限，我那颗坚守的心开始动摇。这时，先生来到了试验田，喊着我的名字。那时我正低头做着水稻杂交，看见先生很是诧异：先生没有戴帽子，更没有打伞，肩上就搭了一条毛巾，那条毛巾有些旧，已让汗水浸透。先生站在试验田埂上，一面擦着啪啪直滴的汗水，一面关切地询问我喝水了没有，要防止中暑，试验进展得怎样。先生的询问让我顿时觉得凉快了，一下就把太阳炙烤的难受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自豪地告诉先生，已经完成了304个单株的杂交，今天就能完成任务了。先生很是高兴，让我等试验完成后就去他的办公室。当天下午，我兴冲冲地来到了生命科学学院大楼第三楼层先生的办公室。先生看着我说：文超，你具有吃苦精神，我们现在想把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交给你。时至今日，我已深刻领悟到了这项研究是先生提出并毕生坚持的一项核心科学研究任务。先生的语气很严肃，却又是用商量的语气说：我们打算把“红莲型杂交水稻恢复基因的克隆与分子机理”的研究任务交由你去完成，你觉得怎么样？先生这么重视我、信任我，我立刻向先生表明了态度，毅然接受并将全力完成这项研究任务。先生会心地笑了。

研途的挫折与坚守

接受这项研究任务后，我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研究中，我首先要突破的是构建出高质量的水稻基因组文库，这项工作的技术性



非常强，需要提取大量的质粒载体利用超速离心机进行纯化，并提取水稻大片段基因组 DNA，利用限制性内切酶进行消化，脉冲电泳分离，连接转化，最后获得水稻基因组的阳性大片段克隆，从而成功构建出基因组文库。以前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没有任何基础，这项工作对于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我绝不能退缩，不能辜负先生的信任。我从最简单的质粒培养、收集和提取开始，不断地向师兄师姐和同学们请教，先生也时刻鼓励我，并帮助我分析实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渐渐地，我对这项实验树立起了信心，并沉浸到了实验中。

2004年1月21日，农历大年三十，我没有回四川宜宾老家，依然沉迷在实验中。那时，我的眼里、脑里、心里，全是水稻基因组文库构建实验。那天先生一直在他的办公室、实验室陪着我，并让我给千里之外的亲人打了电话报平安。我告诉父母，先生就在我身边与我一起过除夕，父母很激动，要求我好好跟着先生学习，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大年初一，我早早地来到了学院，整个实验大楼除了值班人员外，没有看见一个人。我快到实验室时，却突然发现先生的办公室是开着的，里面竟然是先生。先生也看见了我，微笑着向我说新年好。在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里，先生没有陪伴家人，却守护在我的身边，与我共度新春佳节。扭头进入实验室的我流下了滚烫的泪水。在付出了近一年的艰辛努力之后，临近2004年春节，我终于成功构建出了籼稻9311大片段基因组文库。先生为我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进步感到开心，但之后的研究却并不顺利。

2006年6月，是我们这一届博士的毕业季，看着身边的同学各自带着沉甸甸的成果如期毕业，我内心五味杂陈、无比失落；我独自一人来到珞珈山顶，默默地发着呆。先生通过电话找到了我，让我赶快去他的办公室。先生让我坐下后，同样地倒了一杯温开水递给了我，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先生要我孝顺岳父母，保护好爱人，爱护好家庭。先生向我谈起了他的人生经历，20世纪70年代，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三系杂交水稻协作组组长，带领50余人在沔阳（现今的仙桃）排湖农场开展协作研究，当时所有人团结



一心，互帮互助，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协作组被强行解散，先生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付之东流。先生没有怨言，更没有放弃，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团队从零开始，坚持水稻研究，最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马协型杂交水稻选育成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红莲型杂交水稻的种子生产也取得重大突破，被大面积推广应用；2005年，先生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生是在用切身经历向我传递着那种永不言弃、百折不挠的精神。先生的话语再次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我渴望去探索红莲型杂交水稻恢复基因的奥秘。



2013年9月7日，朱英国老师(右)在田间指导黄文超(左)进行水稻研究

成功克隆红莲型杂交水稻恢复基因

2006年11月，我重新准备了实验材料，带到了海南南繁基地种植。2007年3月，先生来到海南研究基地，穿着长筒套鞋(海南田里常有水蛇、石块，防护用)，拄着一根竹头棍子(用于察看水稻的长势)，带着我来到试验田，亲自教我把水稻单株一株一株套



袋自交，以构建更大的遗传作图群体。因为曾经的失败经历，这次的套袋工作我做得特别仔细、认真。3月26日，接到家人电话，我妻子生产了，是个儿子；我连忙把消息告诉了先生，先生听后非常开心，叮嘱我结束田间工作后尽快回家，照顾好家人。40天后，我收完水稻种子，才安心地回到了武汉。看到摇床里的小生命和默默守护在旁的爱人，我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感恩，愧疚对家人照顾不周，感恩有妻如此。8月，先生号召实验室10多位同学和我一起，在武汉花山基地对由2万多个单株的遗传作图群体逐一进行花粉的育性调查。大家克服重重困难，足足奋斗了两个多星期才获得了全部数据。最后，我们通过遗传分析发现，红莲型杂交水稻的不育性是由两对独立非等位的核恢复基因所控制，分别被命名为Rf5和Rf6，由此我们提出配子体细胞质雄性不育作物的双基因恢复模式。双恢复基因模式对于指导红莲型水稻和包台型水稻及其他配子体细胞质雄性不育作物的强恢复系选育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得到了国际公认。随后，我们又把恢复基因Rf6定位在第8染色体，并进一步进行了精细定位，通过农杆菌介导的功能互补试验，验证了PPR894为Rf6的一个崭新的恢复基因，在成功克隆到红莲型杂交水稻这个重要的恢复基因后，我们又利用酵母双杂交技术鉴定出了Rf6的重要互作蛋白OsHXK6，并建立了Rf6恢复红莲型杂交水稻不育性的分子模型，相关成果于2015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受到了领域内专家们的瞩目和一致好评。

兼任秘书见证先生为国操劳至生命最后一刻

2010年1月，我留校工作，兼任先生秘书，在协助先生处理一些日常事务的同时，继续从事着恢复基因Rf6分子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工作。兼任先生秘书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触先生、了解先生。先生胸怀宽广、待人宽厚，和先生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先生从未批评过我及他人。有一次我向先生倾诉委屈，先生却告诫我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我学会包容他人，善待他人。在先生执教50周年座谈会上，先生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在省领导、



学校领导，以及老师、同学、同事们的言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先生温和的性格、谦卑的为人、大海般的胸怀深深地震撼了我。先生热爱事业，将毕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水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先生自19岁那年离开家乡徒步100多华里山路，只身来到武汉大学求学，并留校工作，时至今日已有60个年头。先生留校后，毅然选择以水稻为研究对象，终身与水稻打交道。在先生的带领下，通过53年的努力，武汉大学的水稻研究已经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并重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研发体系。在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罕见。

2013年7月22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大学鄂州水稻基地，专程考察了红莲型杂交水稻，并看望了先生。总书记拨起红莲型杂交水稻优异品种珞优8号，夸奖禾苗长得壮实。先生向总书记汇报了红莲型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展。当听说红莲型杂交水稻已经在国内外推广面积累计上亿亩后，总书记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为国家粮食安全所做的突出贡献；并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自己。先生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带领团队，不顾70多岁的高龄，忘我工作。先生常说总书记来看望我们，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懈怠；我们要加紧高产、优质、多抗和广适应性水稻新品种的研究，加紧红莲型杂交水稻的基础研究，切实践行好习总书记提出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自己”的最高指示。

2015年体检时，先生的身体有些指标异常，先生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医治；同时也没有放下工作，始终心系田间地头和实验室、心系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忘我地工作着。先生告诉医生说他是老人了，时日不多，要抓紧时间再为国家多做点事。先生多次把病房当成办公室，指导着团队成员开展杂交水稻品种选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先生也时刻关注、支持着国家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患病期间还带领团队开展“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长江流域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没有丝毫松懈。2016年，国家科技部委托专家对先生领衔的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评估结果



为优秀；每年4月，先生不顾病情，坚决要求离开病房，前往海南南繁基地，深入田间察看水稻生长情况。

2017年4月11日，先生作为主席团成员，在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做主题发言，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勇于拼搏，不断创新；希望我国的杂交水稻能为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造福全世界。6月上旬，先生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组织的会议，会议间隙，先生曾多次与我商讨如何办好9月拟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长江流域杂交水稻协同创新中心”学术研讨会；就在去世的前一天，先生还专程召集相关研究人员，商讨着杂交水稻新品种研发事宜。

2017年8月9日2时51分，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听闻先生离去的消息，大家悲痛万分。先生把毕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党和民族，以及千千万万老百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心系国家的粮食安全。先生的一生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有幸与先生同行14年零1个月7天，感激先生对我的守护和培养，感激先生对我成长的耐心等待，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先生宽广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以及百折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奋力前行。

作者系生命科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追忆“火星院士”万卫星

李晨阳 丁 佳

2020年5月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首席科学家万卫星在京病逝，享年62岁……

5月20日晚上，一场暴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21点38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62岁。

悲伤逆流成河。大弟子丁锋又想起了4月底的那一天。当时万卫星刚刚拔掉呼吸机的管子，病情稍有稳定，气息还很微弱。丁锋去医院看望他，他只轻轻说了句“7月份”，然后便是一声叹息。

丁锋没有接话。但他心里清楚，老师说的是中国火星探测器发射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他最想看到的就是火星探测器上天，可他从没说出来。他是那种特别照顾别人情绪的人，怕给大家留下心理





负担。”

万卫星的一生，虽然做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大事，但私下里却不是一个喜欢表露情绪的人。如今这声轻轻的叹息，听起来是那样令人心碎。

继承衣钵

万卫星的生命在探测器上天的2个月之前，戛然而止。

对于40多年的老友宁百齐来说，这令人扼腕的一幕，仿佛26年前的悲伤记忆在重演。

从大学时代起，宁百齐和万卫星就是同学，一起读书、工作，又一起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来到北京。

1994年，万卫星和宁百齐一起陪同导师李钧院士出差。李钧因有心脏病史且身体不适，选乘了软卧车厢，两个学生则为节约经费坐在硬座。

晚上，广播突然响起：软卧车厢有乘客心脏病发。两人心知不祥，赶紧冲向导师的车厢，果然看到李钧院士已经深陷病痛之中。虽经尽力抢救，却依然回天乏术。

“李先生是64岁走的。可谁能想到，老万比他还年轻。”宁百齐声带哽咽。

李钧当年去世时，正是课题组发展的关键时刻。悲痛之余，万卫星扛下了老师未竟的事业，立志为中国的空间科学打开一片新天地。

2004年，由于学科调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时任所长丁仲礼和副所长朱日祥的邀请下，万卫星携整个团队来到北京，加入地质地球所。

到北京后，万卫星越来越忙。宁百齐半开玩笑地抱怨：“以前我们天天在一起，现在我都见不着你！”

“无关的事我不管，可这些都是‘有关’的事啊。”万卫星好脾气地解释。

其实，作为一个老牌的地学科研机构，当时的地质地球所正面



面临着学科发展上的“瘸腿困境”：地球物理学原本包括两个二级学科——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但长期以来，空间物理学的发展不是很好。

万卫星团队到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造了当时岌岌可危的地磁子午观测台链。

北起漠河、南至三亚的地磁子午观测台链，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子午工程”的重要依托平台，但由于缺少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发展得极为艰难。

特别是位于祖国最北端的漠河站，在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50℃ 的苦寒之地，不仅需要有人值守，还时不时得派北京的工作人员去检测维修。

“这成了大家眼里的鸡肋。”当时主管台站的朱日祥说，“放弃吧，这些台站的科学意义确实非常重大；留着吧，又没人能把它们用好。”

万卫星团队力挽颓势，改造出了具有地磁、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多种国际先进手段的空间环境综合观测子午台链，有力支撑了地质地球所地磁与空间物理学学科的发展。

而后，万卫星又主持建设了三亚大型相控阵非相干散射雷达项目，立志为中国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空间探测设备；由他牵头重组的中科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也迅速成长为跻身国际前列的研究平台。

当然，还有举世瞩目的中国火星探测计划。

“天问”问天

4月26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来到解放军302医院。在万卫星的病床前，邵鸿告诉他，火星探测项目有名字了——“天问一号”。

万卫星露出了微笑。

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长诗。170多个问题，从天地初分、日月星辰，一路问到历史兴衰、苍生社稷。如今的中国科学



家，终于要把那些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科学问题，递交到苍穹深处。

万卫星是湖北人，同屈原是老乡。他和屈原一样，为了向上天提出最有价值的问题而穷思极想。

当今的深空探测和行星科学，早已不满足于到星球表面逛一逛、看一看。中国已经掌握了把探测器送到火星的技术，但飞上火星后，究竟应该做些什么，“问”些什么，这正是万卫星作为首席科学家的职责所在：为中国的第一次火星探测计划，制定出一套既有技术可行性，又有科学突破性的探测目标——他知道，只有在真正科学目标引领下，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

2017年春天，万卫星把一份名单交给学生魏勇，让他联系这些人来地质地球所参加火星探测研讨会。魏勇一看名单，愣住了：这些人的单位五花八门，既有国家航天局，又有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

“万老师，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会是这么开的。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就是尝试一下，看看科学家和工程师能不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

长期以来，深空探测领域都存在工程和科学“两张皮”的缺憾：工程师研制设备和载荷，却不知道这些设备将要执行什么任务；科学家有想要探索的目标，却又不知道怎样通过设备实现。

终于，万卫星带领科学家，与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师张荣桥带领的工程师团队，在一张桌子上“会师”了。

“大家整整讨论了一个上午，会议非常成功。”魏勇回忆道。

“卫星”飞旋

从2008年布局火星电离层研究开始，万卫星就像他的名字那样，成了一颗绕着行星飞转的“卫星”。在之后的短短10年间，包括万卫星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发奋进取，实现了中国行星物理学从无到有的跨越。

2017年，中国首个官方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万卫星担



任主任。火星、水星、金星、木星、彗星/小行星……他描绘了一幅放眼数十年的中国行星探索路线图。

2020年1月12日，与病魔缠斗已久的万卫星作了人生最后一次学术报告——《下一代金星探测》。看着讲台上的恩师，魏勇百感交集。10年前，万卫星也像这样组织了一场金星探测研讨会。

这两场会议的听众里，有不少是相同的面孔。万卫星曾笑称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魏勇记得，那场会议结束后，他跑去对万卫星说：“万老师，既然咱们要搞行星研究，我就去德国马普学会申请行星科学的博士后。”那时，国内行星物理学几乎一片空白，这条路孤注一掷，充满风险。“要是我混得不好，您可得给我一口饭吃！”魏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求”万老师。

万卫星郑重承诺：“只要我还没退休，一定帮你到底。”

“当时会场上的20多人里，只有一两个是真正的行星科学科班出身。而今天，这批人已全部成长为中国行星科学领域的中流砥柱——这与万老师的精神感召不可分割。”魏勇感叹道。

中国的行星科学起步较晚，任务艰巨。即便万卫星这样一个行事平和、不疾不徐的人，心里也暗藏着一团急切的火苗。

“尽管中国仍未超过美苏在第一次探测热潮时的技术成就，但世界行星科学水平已经远超当年。这决定了中国无法直接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

“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然而要走的路又很远。”

他在文章里写下自己的忧和急。回到现实中，他继续像一颗卫星那样，围绕行星，昼夜飞驰。

直到病魔探出一脚，绊倒了他。

好人万卫星

自2017年起，短短半年，他暴瘦几十斤。

没人意识到有什么异常。年轻时，万卫星以爱吃甜食闻名，他和宁百齐一起坐长途车，宁百齐一小听可乐没喝完，他已经喝掉一



大桶了。人过中年，他却成了节食减肥的倡导者，跟学生一起出差，总会苦口婆心地叮嘱：不要喝果汁，不要吃糖。

“哟，老万，减肥这么成功啊？”同事打趣他。

他笑笑说：“这不挺好的吗？”

消瘦、便血、频繁感冒……身体发出的警告却被一一忽视。每年4月例行的职工体检，他没顾上去；到9月份的院士集中体检时，肿瘤晚期的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可是我马上还要出差……”

“你还出什么差啊！”医生急了。

从那天起，这颗“卫星”的轨道发生了偏移。每隔一段时间，万卫星都要去做一次化疗。学生们自告奋勇地轮流送他去医院，但他稍稍有些精神时，还是会自己偷偷开车去。

他甚至统计了每个化疗周期的身体变化，以此编制出一个新的工作“日程表”：刚刚结束化疗的几天，反应严重，格外痛苦；快到下一次化疗时，又感到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你们有事来找我的话，就挑两次化疗中间那几天吧，那几天舒服些。”

就像认真工作那样，他认真地配合治疗、谨遵医嘱，然而2020年3月31日，他的病情出现了恶化。

入院后，这位“国宝”级别的科学家从未向医院和医生提出任何要求，从没询问过自己的病情，即便疼痛难忍，也只在医生问他是否需要止痛针时，默默地点点头。

“小时候看电影，我们都希望好人能够长久。”和他共事十多年的潘永信院士说，“可偏偏是脾气又好、心态又好的万老师生了这样的病，最让人痛心。”

手牵子午，目探火星，守地巡天，叩问青冥——如果万卫星是科幻电影里的主人公，不知会有多么炫目的人生。

但生活中的他太平凡了，质朴的穿着、敦厚的性格，仅有的标志是弯弯的眉弓和笑眼。因为很少在媒体上曝光，即便是天文爱好者，也大概率认不出他的名字和面孔。

跟同事在一起，他就只谈工作，不问其余。甚至直到去世后，魏勇才从他儿子口中得知，万老师和自己是同一支球队的铁杆



球迷。

足球、排球、围棋、桥牌、《动物世界》……家人历数万卫星生前的种种爱好，让陪伴他多年的同事都惊讶不已。

像每一位普通人，万卫星会省吃俭用买一台心仪已久的照相机，也会熬夜看球赛，甚至跟儿子抢夺遥控器，家里的书柜上摆满了他喜欢的历史书籍……

但从2004年来到北京后，工作骤然繁忙，他留给这些爱好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他的球友都在武汉，北京一个也没有。”

死则又育

万卫星幼年丧父，母亲一个人把他和三个姐姐拉扯大。1977年恢复高考，他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赛中脱颖而出，跳出“农”门——历经无数艰难坎坷，终于成长为中国空间科学和行星物理领域不可多得的大家。

“国家是要把他当帅才用的。”叶大年院士说，“现在正要‘帅’呢，可惜……”

万卫星留下的遗憾，太多太多了。

如今，火星探测计划蓄势待发，三亚非相干雷达即将竣工，无数的蓝图待展，主帅却已不在。

斯人已去。万卫星梦想中的那条中国特色行星科学强国路，还好走吗？

“放心，一切都在正轨。”他的学生说。

“请放心，自有后来人。”他的同事说。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这是屈原《天问》的第十七问：月亮何德何能，消亡之后，又能化育新生？

过去数十年间，万卫星培养出了一支国际水准的年轻团队。地质地球所的80后研究员，有1/3来自他的团队。

丁锋继续深耕重力波研究，以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稳重，让团队平稳运行；魏勇2015年成为地学领域首位80后“杰青”，现担任中国科学院A类先导“鸿鹄专项”首席科学家，继续投身于我国行星



科学一级学科建设；任志鹏 31 岁创下“优青”最小年龄纪录，领衔开发出国内迄今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电离层-热层耦合模型，并初步拓展到火星和金星；乐新安归国后，接任万卫星的学科组长，和几位年轻人一起继续着非相干雷达的征程……他的近百名毕业生，每人的专业都有所不同。



2019 年教师节

当学生接过万卫星留下的旗帜时，发现早已是旌旗遍野，猎猎飘扬。

当初万卫星来到这个以固体地球物理为传统优势的研究所，开辟出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的一片天空，地质地球所所长吴福元院士曾打趣他：“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地上，而万老师在天上。”

“万老师在天上。”

这句话，于今念起，悲欣交集。

(稿件来源：科学网公众号 2020 年 6 月 3 日)



我的导师宁津生院士

李建成

1990年至今，我师从宁津生老师已有30年了，这是我的幸运。宁老师言传身教，爱生如子，在我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风范，始终引领和激励着我。

爱生如子的老师

硕士毕业后，我报考了宁老师的博士。那时候，我只知道宁老师是我国地球重力场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听过他的一些讲座和报告，但没有听过他的课。当时，我有幸拜读了宁老师和管泽霖教授合编的《地球形状及外部重力场》，发现地球重力场领域很有挑战性。也许是个性使然，我认为如果我能坚持深耕这个领域，未来有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

开学报到那天，宁老师约我在办公室见面。当时，宁老师在我眼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专家，因此见面前我的内心稍有志忑。一进门，宁老师就微笑着招呼我坐下，亲切的语气立即抚平了我紧张的情绪。随后，他给我介绍了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和前沿动态，勉励我潜心研究，力争有所建树。这次见面，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研究方向。

读博期间，宁老师还委托王昆杰教授和晁定波老师共同指导我，优质的导师资源为我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巨大帮助。同时，宁老师带我参与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并且成功建立了当时我国阶



次和精度最高的地球重力场模型以及我国首个5'×5'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现在回想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参与大型科研项目，从中学到的很多东西对我后来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宁老师的指导下，我还参与了“攀登计划”等国家项目，为提升自身学术研究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在研究工作中常常遇到困难，他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并在关键时刻提出令我醍醐灌顶的想法。他时常教导学生们只要持之以恒，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宁老师当时担任国际大地测量协会学术杂志《大地测量手稿》和《大地测量公报》编委，他总是第一时间将这两本杂志送给我阅读，让我及时了解学术前沿。1993年，在我博士论文答辩前夕，宁老师正在加拿大访问。为了参加我的答辩，他费尽周折调整行程，在百忙之中专程赶回，令我万分感动。

宁老师一生崇尚学术，极为重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1994年夏天，在宁老师的帮助下，通过多方努力，我被选派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做学术访问。在访学期间，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了解我在国外的研究进展和生活情况，强调一定要把本专业领域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学回来。他还要求我们潜心学术，心无旁骛，不提倡我们过早地承担行政工作。1995年，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学院推荐我担任副院长，时任学校校长的他没有表态支持；1996年，有人推荐我去学校科技处任职，他表示反对；1999年，我担任测绘学院院长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当院长不能影响业务工作！”2011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宁老师非常高兴，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继续出成果！”他叮嘱我要一如既往地站在教学科研一线和学术前沿。他还向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建议，不要让年轻的院士过早地担任学校行政职务，担心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2014年年底，我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学校的管理工作自然会分散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宁老师每次碰到我，都会特别嘱咐：“建成，学术不能丢啊，要见缝插针搞科研！”宁老师要求我不仅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同时也要深入教学第一线。在他的教导和期望下，我目前虽然行政事务繁忙，社会工作繁杂，仍然坚持为本科生授课。为了培养我在教学上有所建树，进



一步开阔视野，从2005年起，宁老师让我参与教育部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测绘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并于2012年把测绘学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交给我负责，不遗余力地通过实际工作进一步锻炼我、培养我。

“大学的产品就是学生，老师应该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宁老师从1956年大学毕业开始便从事教学工作，不管有多忙，给学生上课这件事，他从来没有丝毫放松和怠慢过。即使是很熟悉的讲稿，他在每次上课前也要重写，及时更新内容。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称他是“课讲得好，人长得帅”的好老师。

正是宁老师这种做事认真、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仁爱无私的态度深深地感动并默默地影响着我们，让我们终生难忘。可以说，能成为宁老师的学生，是人生的幸运。自从成为他的学生以后，我一路追随，从未离开。30年来，宁老师和我在学术上薪火相传，师生情谊深厚，在测绘界和教育界被传为佳话。

儒雅豁达的学者

宁老师是一位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的学者，人们称他是一位好先生。他作为校长和下属平等相处，与同事真诚相待，对学生和蔼可亲。宁老师博学儒雅、宽厚豁达、严谨谦逊的风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和周围的人，这也为他赢得了师生、校友以及业界的尊敬和爱戴。

宁老师心胸豁达，从不记仇。1950年代末期他被错划为右派，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却对那些曾经对他不友好的同事和同学总是表示理解和原谅，他认为那是特殊时代造成的。宁老师也从不和那些批评他、甚至让他下不了台的老师计较。我了解到，1980年奥地利学者 Moritz 来学校讲学时，宁老师做翻译，李庆海先生现场就指出他翻译得不准确，非常不给面子，让他下不了台。宁老师丝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反而认为李庆海先生治学严谨。这体现了宁老师对长者的尊重和宽广的胸襟。2010年，我在测绘学院倡议成立李庆海先生奖学金，宁老师特别支持我的建议。



宁老师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充满爱心，从不居高临下直接批评人，总是耐心地与学生讨论。在出差的火车上，宁老师和我们一起聊天，非常随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乐呵呵地与人打招呼。他身边总会围着很多人，不管是学生、同事或是业界同仁，都享受与他一起聊天、探讨和交流的快乐。“这是当老师的最大快乐！哪里都有学生，而且学生都跟你很亲近。”宁老师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和氛围。

他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而且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他当校长期间，也不让自己指导的学生享受特殊照顾。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的博士招生规模较小，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博士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几位刚留校的博士申请副教授岗位，学校觉得我们还需要历练，宁老师没有因为他的学生在其中而破例。1994年，国家测绘局设立了跨世纪人才计划，尽管宁老师对我寄予厚望，却由于我是讲师最终没能评上。他心里十分难过，却没有任何表露。对于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和鼓励。1994年8月，学校派我去美国做半年的研究工作，离开前他对我说：“目前学校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没有学成归国，出现了人才断档，你完成研究后一定要按时回国为学校的发展做贡献。”按照他的要求，我于1995年1月如期回国，他特别高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掀起了一波出国潮、下海潮，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面临很大挑战。我在1995年申报了教授岗位，得到了他和时任院长刘经南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力排众议将我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

宁老师总是不遗余力地关爱学生，帮助别人，但同时，他又对学生严格要求，从不袒护，要求我们诚实诚恳做人，严肃严谨做学问，这让我们受益终生。

鞠躬尽瘁的校长

1984年，宁老师从讲师岗位被推选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武测）副校长，3年后任校长，直至1997年2月卸任。在10多年的校长岗位上，宁老师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他在任期间学校



的办学方向清晰明确，教学质量快速提升，办学实力和整体水平大幅提高，为我国测绘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校和学科发展方面，宁老师做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长远布局。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大地测绘学科发展处于低谷。宁老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远见，带领老师们积极探索卫星大地测量方法，来进行学科转型。

1988年，宁老师作为校长举全校之力，向世界银行贷款数百万美元，建立了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作为原武测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委员会主任，为实验室的建设、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实验室发展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申请贷款时，国家测绘局对他提出明确要求，“保证以后这笔钱学校还70%，国家局还30%。”在当时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学校要还70%，加上每年的利息，压力确实很大，但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保证书。他为我国第一个测绘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建立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学校持续发展抓住了难得的机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6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建校40周年之际，正值国家“211工程”计划的推进时期。能否加入“211工程”，是国内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分水岭。武测作为亚洲唯一的以测绘学科为主的高校，自然也期望能进入“211工程”，但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全国众多高校都在竞争。在湖北省，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也都在极力争取，专业性极强的武测并不具备优势。尽管当时武测为适应测绘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与导航等一批新专业，但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实力差距仍然悬殊。当时，宁老师正好受到教育部委派，参与武汉大学“211工程”预审专家组的工作。他充分吸取了武汉大学和其他已经通过“211工程”预审高校的经验，领导全校上下努力整改，学校终于在1996年通过了“211工程”预审，为学校进一步发展争取了广阔的平台和有利的支持。

他总是从大局出发，从不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1993年，学校将工程测量系和大地测量系合并，成立了地球科学与测量工程



学院。1995年，学校把学院的土地管理专业调整到地图制图系，成立了土地科学学院。当时，院里的老师都舍不得将大家于1986年办起来的土地管理专业划出去，宁老师作为校长强调，这是为了学校发展做出的决定，要求全院老师顾全大局，给予理解和支持。

为加强测绘领军人才的培养，宁老师给工程院领导建言，建议在土木工程学部下设立测绘工程学科。随后，测绘学科的学者申报院士，就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在他的带动、培养和支持下，测绘界领军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大学，不管是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或者其他类型大学，其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培养学生。”宁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20世纪90年代，测绘学科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以往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严重落后于学科发展，迫切需要教学改革。1996年，宁老师提议由校内几位院士一起为大一新生开一门基础课，明确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当时新入学的本科生里，十有八九第一志愿报的不是测绘专业。”他强调，“最早开设这门课的初衷，是挽留想转专业的学生。”1997年9月，“测绘学概论”正式开课。22年来，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刘经南、张祖勋、龚健雅等院士以及测绘界的知名教授先后加入教学团队。这门课程，被学生称为“最奢侈的基础课”，已成为全国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教育教学的示范课堂。

近年来，虽然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也早已离开校长岗位，但老校长的测绘情怀依旧不减。他依然坚持在讲台上，为00后新生讲授测绘课程，激励同学们立志为祖国测绘事业发展而刻苦学习。

成果丰硕的“大地之星”

宁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大地测量学家，毕生从事地球重力场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是我国这一领域研究和教育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布设天文重力水准网、推求大地水准面形状、研究卫星重力学和固体潮、建立地球重力场模型等方面均颇有建树。自1956年



大学毕业到学校工作，他一生与大地测量结下了不解之缘，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大地之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宁老师和同事们对推求我国高精度天文大地网的整体平差所需要的高程异常、垂线偏差等地球重力场参数所采用的理论、方法和精度等进行了研究，完善了苏联专家布洛瓦尔为我国设计的天文重力水准布设方案。所提出的意见成为我国实际作业的标准，研究成果也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大地测量专业开展大地重力学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新的内容。宁老师与他人合著的《大地重力学》比较深入地研究了重力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在天文大地测量中的应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是这一领域教学、科研和生产的重要教材和参考书。

20世纪70年代，国家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这其中就有一个确定“大地原点”的重要问题。大地原点是一个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基准点，要围绕它进行大量的测量活动，如天文测量、重力测量、三角测量、人造卫星测量、全球定位测量等。在这些测量活动中，大地原点标石的稳定极为重要，任何细小的变化都会使测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使用的大地测量坐标系统的坐标原点是苏联玻尔可夫天文台，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需求。因此，1975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班子，开始探索中国大地原点的设置，宁老师被学校安排参加此项工作，那一年他43岁。面对没有退路的任务，他带领一帮科技人员，搜集分析了大量资料，并到郑州、西安、兰州等地，对各地的地形、地质、大地构造、天文、重力和大地测量等因素进行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在研究过程中，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利用最小二乘配置确定建立原点所需要的相对大地水准面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其成果为确定我国大地的地心坐标及椭球定位提供了科学依据。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测绘学领域的泰斗和先驱夏坚白院士的主持下，宁老师与人合作翻译了《卫星大地测量学原理》《卫星大地测量概论》两部外国文献，较早涉足了卫星大地测量学研究，同时他意识到，中国测绘科学与教育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此后，他时刻关注国际大地测量学科发展动态，及时将“利用最小二乘配置确定相对大地水准面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成果引进到测绘学科专业教学中。在此期间先后出版《地球形状及外部重力场》《重力与固体潮教程》《地球重力场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等著作，翻译出版《大地测量学》《高等物理大地测量》等外文文献，不仅为我国多项测量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也缩小了物理大地测量领域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利用卫星和地面重力资料联合建立高阶次高精度地球重力场模型，且发展迅速，而中国在这一领域较为落后。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宁老师将研究重点转向地球重力场逼近理论，致力于建立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地球重力场模型和区域大地水准面。1990年，他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新技术项目“地球重力场模型研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180阶完全阶次的地球重力场模型WDM89。1994年，他又主持完成国家测绘局“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地球重力场精细结构和我国大地水准面的精化”，进一步发展了高阶地球重力场建模理论，研究出适合我国局部重力场情况的360阶地球重力场模型WDM94，同时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内分辨率为 $5' \times 5'$ 、精度为米级的中国大地水准面WZD94，满足了当时测绘生产的需要。WDM89、WDM94两个模型都是当时我国阶次最高、精度最好的地球重力场模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应用于我国地学、空间技术、海洋、地球物理、地震、地质等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成果分别获得1991年度国家测绘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97年度国家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带领晁定波等专家在我国率先开展了整体大地测量学、大地测量学科发展战略等多项前沿研究。研究成果获得1993年度国家测绘科技进步二等奖，对我国推动大地测量学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宁老师是一位永远进取、不知疲倦的实干家。进入21世纪后，年逾古稀的他仍没有停止探索地球重力场的步伐。在“九五”期间，他又参与主持国家测绘科技重点项目“全国及省市地区高精度高分



分辨率似大地水准面的技术研究及实施应用工程”，完成了新一代中国似大地水准面 CQG2000，其分辨率为 $5' \times 5'$ 、精度为分米级，为我国 1:5 万甚至 1:1 万测图中以 GPS 水准测量代替几何水准，提供能满足精度的高程异常值，这一成果获得 200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宁老师还是我国较早从事卫星重力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他就开始接触并探索卫星重力学问题。21 世纪初，国际上新一代卫星重力计划的相继实施使得卫星重力学成为现代大地测量最活跃的分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研究团队对卫星测高、卫星重力梯度以及卫星跟踪卫星等卫星重力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进行全面研究，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我国在测绘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软件等方面已和世界测绘发达国家具有同等水平，虽然现阶段还存在些许缺陷，但正在逐步完善，相信有一天我们中国定能成为测绘强国。”他对中国测绘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宁老师于 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建筑工程学部首位测绘学科院士，在担任学部常委和副主任期间，为学部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不退休的“两委主任”

宁老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大地测量学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长期担任教育部测绘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测绘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推动我国测绘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测绘界同仁们称为永不退休的“两委主任”。

自 1984 年起，宁老师担任中国测绘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在国家测绘局测绘教材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1990 年，他开始担任国家测绘局测绘教材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下简称“两委会”）。随着职能和隶属关系的变化，教材委员会先后更名为国家测绘局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他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 2012 年，由



于年龄的原因不再担任“两委会”的主任委员，但他仍是“两委会”的名誉主任委员和顾问。他在“两委”主任的岗位一干就是 38 年，是一位“超龄主任”。在此期间，他带领“两委会”一直致力于我国测绘教育的发展与壮大，致力于测绘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在引领中国测绘教育的改革方面做出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在“两委会”的推动下，测绘教育紧跟经济发展对测绘人才的需求，不断发展，从专业目录调整后测绘类下设一个专业，到现在测绘类下设 6 个专业；从原来的全国 30 多个测绘类本科专业建设点，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个本科专业建设点，以及 200 余个高职高专测绘专业点。

在担任教材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他大力推进高校测绘教材建设，使测绘教材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到自编、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配套，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高质量测绘教材建设体系。

在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由原来以教材编审为主要内容，转向对学科的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咨询和指导。宁老师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对测绘学科专业带来的强烈冲击以及难得的发展机会，他带领“两委会”针对测绘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现状和未来发展、社会需求与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内容更新、改革热点难点等问题，每年组织两次以上高等测绘教育改革的研讨会或院长论坛，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测绘学科发展方向探索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测绘教育与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发展。

他带领“两委会”开创性地举办“全国高等学校测绘类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至今已经 20 余年，对引导和激励青年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规范教学过程，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全面提高测绘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他开创性地举办“全国大学生测绘技能竞赛”十余年，不仅检验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真正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的目的，也增强了学生之间团结协作意识和不怕苦不怕累的优秀品质，对学生未来发展影响深远。他开创性地举办“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科技论文竞赛”11 届，激发了



广大学生崇尚科学、勤奋学习、勇于进取的精神，以及勤于思考、善于分析的创新意识，提高了学生科技写作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为我国测绘科技创新事业培养和积蓄人才。

宁老师身体力行，永不停歇，他凭着对我国测绘事业执着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把“两委会”打造一个和谐、进取的大家庭，为校际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校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大家心目中，他是永不退休的“两委主任”。

宁静致远，津津乐道，生生不息，宁老师人如其名，他对我国测绘科技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有口皆碑，他是我们睿智儒雅的老师，更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0 年 3 月 17 日)
作者系信息学部(原武汉测绘学院)1983 级校友



追记美学家刘纲纪

李 伟

刘纲纪先生的最早一批博士生、追随先生近 30 年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邹元江教授，曾经写过多篇关于自己导师著作的书评等文章，对刘纲纪的学术思想、为人生平非常熟悉。

但在为导师撰写悼词生平时，邹元江写到凌晨三点。

万籁俱静时，想到珞珈山那盏苦熬一生的明灯终于熄灭，师生再也不能当面长谈，邹元江潸然泪下。

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87 岁。

刘纲纪先生主要从事美学原理、艺术哲学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同时在美术理论、中国书画史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开拓性研究，并有重要建树。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他是一位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家。

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学贯古今、享誉海内外？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遍访刘先生的同事、学生和亲人，探寻大师耀眼的一生。

中国美学界数一数二的人

“忆当年合作 音容宛在；虽今朝分手 友谊长存。”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得知自己的同学、合作者刘纲纪去世，悲痛地写下唁电。

短短两句话，浓缩了中国美学界“北李南刘”两位大师一生的



相知情怀，更是当代中国美学走向繁荣的写照。由两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二卷，填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读过《中国美学史》的人可能会发现，刘纲纪撰写的著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美学思想为指导，论述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并处处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做了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深刻分析，许多论述极富创见。

此后，刘纲纪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艺术文化的“六大境界说”，即儒、道、楚骚、玄学、禅宗及明中叶后具有近代人文主义、个性解放色彩的自然人性论，并一一作了深入分析。

“在文化逐渐成为软实力、凝聚力与竞争力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学事业，使之在国际上更多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刘教授在这一方面几十年来做了艰苦探索和努力，取得重要成绩，是我国美学界少有的具有相当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美学家。”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美学家曾繁仁教授7年前曾对刘纲纪撰写的《周易美学》一书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这本《周易美学》著作的写作出版，是刘纲纪用时4个月，通宵达旦完成的，1994年正读研究生的邹元江见证了这部著作的写作历程。那几个月时间，刘纲纪是珞珈山最晚熄灯的人，成为当时武大学人勤学的标志。

该书出版后，约稿编辑获得编辑界大奖，邹元江写了4篇书评，全部发表在顶级期刊……一本书，成就了许多人。

诸多开拓性的研究，令刘纲纪早早就成为一座大山，一座研究中国美学、艺术、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不可绕过的高峰。

作为北京大学同学和长期的合作者，李泽厚对刘纲纪有着比一般人更深的认识。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就公开说：“我觉得他的水平很高，思想深刻。在目前的中国美学界，无论从美学理论上还是从对美学史的了解和掌握上，他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一直埋头



工作，不计名利，对科学有献身精神。”直到2002年，李泽厚先生在《浮生论学》一书中仍坚持这一看法，说：“做美学研究的当代我们这辈人中，我认为刘纲纪是最不错的。”“虽然他最近还很厉害地批判我，但他有哲学深度。”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范与刘纲纪交往较多，20世纪80年代，刘纲纪与李泽厚合著《中国美学史》时，为了写作联系方便，刘纲纪曾借住在北师大宿舍。

李范经常去看望刘纲纪，见证了刘纲纪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写作的情景，常常是书桌、地上满是烟蒂。

德国著名汉学家卜松山在欣赏刘纲纪先生的艺术作品集时，想起中国一句古话：诗书画如其人。“欣赏刘先生的画作，他的容貌、人格仿佛就浮现在眼前。”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傅伟勋教授在一些文章中谈到刘纲纪先生给他的印象时说，“刘纲纪具有哲学家的风骨，且为人诚挚可亲，实不多见，治学之勤，功力之深，令人叹赏。”

哲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情怀

“做古代学问，但不能忘了是一名现代人。”刘纲纪常常强调，做学问不能同现实隔离，要有现实关怀。

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已经是武大哲学学院二级教授的邹元江讲述了导师的一生。在他看来，刘纲纪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是一盏照耀后人的明灯，影响了自己的整个人生。面对刘先生的期许，自己常常因为有愧，不敢自称是大师的弟子。

“先生有幼功，在大师荟萃的北大熏陶之下，迅速成长。”刘纲纪先生1933年1月17日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号营村，195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来，从小家境不错的刘纲纪自幼爱好文艺，13岁时曾拜名师学习中国书画，幼功的积累，为他今后研究艺术美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北大4年，刘纲纪除了努力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外，



还师从中国美学界前辈学者邓以蛰、宗白华、马采三位著名教授学习美学与中国书画史论，与大师们成为忘年之交。

作为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刘纲纪曾经多次指出几位大师家藏古画的假贗之处。后生可畏，大师们感慨着。

196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刘纲纪的第一部专著《“六法”初步研究》，那时他年仅27岁。这部论述中国绘画理论纲领——“六法”的专著，曾得到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赞许。这是刘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影响极广，是刘纲纪在美学研究上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也预示了他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刘先生对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大胆独立思考，绝不允许学生盲从。作为导师，他更注重因材施教，不仅指出学生学问短板，更关注学生的性格不足之处。

当时，刘纲纪在北大的名气很大。担任北大学生诗社的社长，吹笛子、拉二胡、美声唱歌，他是天生的从事美学研究的人才。作为一名较早发表文章的北大才子，他用稿费买西装，偶尔还会请同学们下馆子。才华横溢的刘纲纪，征服了当时北大俄语系的校花孙家兰，后来两人牵手相伴一生。

刘纲纪是一位有生活情调的人，喝德国黑啤、品咖啡，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极具现代感，非常关注社会现实。“做古代学问，但不能忘了是一名现代人。”刘纲纪常常强调，做学问不能同现实隔离，要有现实关怀。

“必须具备哲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情怀。”这是刘纲纪常常对学生提到的要求，两方面缺一不可，也是一直走在国内美学研究最前沿的武大哲学学院招聘新教师的标准，延续至今。

刘纲纪与武大的渊源离不开一个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彼时，重才、惜才、爱才，还不拘一格地用才、育才的李达，亲自到刘纲纪在北大的学生宿舍，邀请刘纲纪来武大，并愿意担任他的硕士导师，1956年本科毕业之后，刘纲纪从此与珞珈山结缘。

李达非常理解、尊重并支持刘纲纪的兴趣与选择，在他离开北京仅一个月之后，又将刘纲纪送回北大进修美学和艺术，并专门给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教授和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写了介绍信。两年



多后，刘纲纪返回武大任教，至此 60 个春秋，珞珈山的夜晚总有一盏明灯在亮着。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耀南 1997 年考入刘纲纪门下读博士，当时他只读过刘纲纪的书，仰慕大名，却从未见过面，在参加了博士入学考试之后，李耀南忐忑地敲开了刘纲纪的办公室大门。

初次见面，两人长谈了两个小时。李耀南回忆称，当时已经 60 多岁的刘纲纪思维敏捷，言谈之间饱含激情，一种渗透理性光芒的激情，时刻不能懈怠的学风，至今感召着自己。

博学乐观，成风化人

“文革”期间，刘纲纪被下放到襄阳一个农场负责放鸭，刘纲纪没有忘记读书，正是在池塘边，他读了朱光潜对黑格尔 110 万字的巨著《美学》的译作等著作。

清苦的生活，很快迎来了思想著作的井喷，回到武汉之后，他在夫人所在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的一间狭小宿舍里的一张小凳旁，流着汗，陆续写下了多篇艺术哲学著作。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为我们后辈树立了如何做一个学者的榜样。”我国著名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当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武汉大学任教，同刘纲纪在哲学系共事达 30 余年，对刘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多有了解。“刘先生有坚定的学术信念和人格操守，直到耄耋之年，仍然殚思竭虑，笔耕不辍，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美学研究事业。”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易中天 38 年前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刘纲纪是答辩评委之一，两人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在会上发生争论，易中天也大胆地回应：“我还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尽管两人当场争执得面红耳赤，但刘纲纪仍然对易中天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给了优秀。

正在国外来不及赶回国内参加追悼会的易中天感慨：“这样的师德师风，让我终生难忘。”他遥寄挽联一副以表哀悼：大美无言，治学本当知纲纪；中庸有道，为师原不计逆从。



李耀南告诉记者，刘先生对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大胆独立思考，绝不允许学生盲从。作为一名导师，他更注重因材施教，不仅指出学生学问短板，更关注学生的性格不足之处。

李耀南回忆，自己从农村出来，刚开始性格上有些胆小怕事，刘先生看出问题后，经常教育他：胆子要大一些，不要怕。

“这个问题你已经想清楚了，如果是你没表达好，那就是你没本事！”博士论文预答辩时，看到李耀南又有些胆怯，这一次刘纲纪有些急，这一番少见的发火，也激了一把李耀南。

最后，论文答辩现场上，李耀南放开表达，侃侃而谈。

顺利通过答辩，刘纲纪非常高兴，拉着李耀南合影留念，这一难忘瞬间，李耀南至今珍藏在家。

如今在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任教的张完硕教授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作为一名韩国博士留学生，当年先生每周给他一个人上一门课。台上70多岁的先生侃侃而言，台下张完硕似懂非懂。回去后，还要反复听录音，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请教一番，老师就不厌其烦地再讲一遍。

“先生不用电脑，从来手写，手指上磨了厚厚的茧。”如今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的王海龙博士，曾跟着刘纲纪先生学习5年，见证了80多岁的老人熬夜帮博士生修改论文的过程。“先生对学问和学生都极负责任，从来亲力亲为。写书，从查资料到最后，都要自己完成。”

刘先生的2008级博士李红霞含泪追忆：说来惭愧，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先生熬了一个整夜修改的。那天从先生手里拿回他修改过的论文，看到先生憔悴的面容，还有熬夜后的眼睛，心中满是愧疚。那时递交给先生的博士论文，我还没来得及写前言，先生高屋建瓴地把我论文将来要做的、而我还未能看到的方面都指了出来。

王海龙有些痛心地说：“这几年先生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但是他从不拒绝学生的活动邀请，非常支持年轻人。”曾担任武大研究生会主席的吴汉勋透露，武大书画协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已经举办30多年，刘纲纪先生一直坚持亲临现场开笔、点评，



身正为范，启蒙激励着一代代珞珈山的年轻人追求美好。

“未来只能怀念先生的音容笑貌，细读著作，追忆精神，继承遗志。”武大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说，每次拜访先生，都是在谈学问，先生特别自然地表达着自己对中华深厚文化传统的自信，也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吴根友透露先生晚年遗愿：为进一步摆脱当年思考的时代局限性，他要重写中国美学史，在病床上仍然坚持。“作为后人，我们希望先生的遗稿很快能整理出版，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他对一些问题更深入思索的成果。”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 1523、1524 期）

作者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深切怀念保宗悌老师

李亚相

我在武大物理学系学习六年，因为保宗悌老师没有讲授过物理学系的基础物理学课程，我在半导体专业无缘聆听保老师讲授的专业课，故与保老师没有什么接触。但因他是著名空间物理学大师桂质廷教授的得意门生，且在空间物理科研方面卓有成就，早有所闻。

得知保老师调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任教时，还以为是当年任华南师大校长的颜泽贤(武大物理系1969届校友)聘调过来的。后来才得知，保老师在武大物理系任教几十年，虽然教学科研成果突出，却是命途多舛。直至刘道玉任校长后，才真正被重视重用。大概是1986年，保老师回广东南海老家探亲，与南海县领导相见，保老师向南海县领导表示，想为老家做点贡献。县领导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后来，通过多方沟通联络，保老师大约于1989年调到广州华南师大任教。

1965年，武大物理系1962级同学由湖北省统一安排到荆门县搞“四清运动”，保老师被分配到6743班(1967届物理系3班)，和同学们一起在荆门县拾回桥四方公社搞“社教”，曾与吴湘东同学同宿一个茅棚草垫上，因而保老师与674(1967届物理)年级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

复课闹革命后，保老师又为674无线电专业同学讲授“天线”“电离层电波传播”等课程。

1992年始，我在组建武大广州校友会物理分会过程中，通过华南师大任教的钟穗萍同学才认识久已闻名、却从未谋面的保老



师。此后，每年一次的武大物理系 674 广东同学例行聚会，我们都邀请保老师及其夫人（武大生物系毕业的曾翠瑜老师）参加，师生相聚其乐融融。年节期间，我们还会约上同学登门拜访，祝福两位老师节日快乐。

2018 年，我们几位校友到保老师家里，告知准备以广州校友会物理分会名义倡议在武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树立著名无线电大家桂质廷教授雕像事宜，保老师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很快写出了《师教如甘露 浸沐益终生》的纪念桂质廷大师的文章，在 2018 年版《羊城珞珈情》一书中出版。

2020 年 1 月 11 日，在广州校友会举办 70 岁以上校友参加的“团拜会”前，考虑到保老师年事已高，我只用微信将此消息告知他，并没有询问他是否参与，意思是由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不料，团拜会已经进行了一半，保老师在其夫人曾翠瑜老师的搀扶下慢步进入了会场，我与 674 同学们快步迎上去，大家欢呼着拥抱在一起，开心地与保老师、曾老师合影留念。

1 月 20 日，曾老师告知钟穗萍同学，保老师住进了广州中山医院；后又告知 2 月 6 日进入 ICU 抢救室。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同学们不便前往探视，只能祈祷保老师能有奇迹出现，转危为安。不料后来却传来保老师于 9 日凌晨 3 时仙逝的噩耗。



2015 年 9 月 26 日物理分会成立时与学校、物理学院、广州校友会领导和广东物理校友合影(前排左 4)



万万没有想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保老师却离我们而去，连送别的机会都没有。11日团拜会上的相见和合影竟成了保老师与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和最后的留影。

我们终生难忘与保老师的师生情缘，愿保老师一路走好！尊敬的保宗悌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8年2月2日在广州校友会物理分会举办的广州(校)叟友飨春茶话会上(前排右1)



2016年3月5日与1967届物理系同学在华南师大聚会时合影
(前排左5曾翠瑜老师，左6保宗悌老师)

作者系物理系1962级校友



忆武大老校长李达

刘怀俊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离开湖南大学正式调任武汉大学校长职。当晚李校长通过校广播台发表广播讲话，翌日正式上班，他在武大工作直至去世，是武大主政时间最长的校长。学校成立新的校务委员会，设校长办公室，任命谭崇台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学校其他机构和人员均无变动，学校日常工作照常进行。

李达校长在武汉大学主政期间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对教学和科研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对待学校教职工态度诚恳、礼贤下士。在他任武大校长期间，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学科研工作很快步入正轨，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学者、中共“一大”代表由衷尊敬与爱戴。大家不约而同地尊称李达同志为我们的“老校长”。

重建武大哲学系 李达到武大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并对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武大哲学系立即进行恢复重建工作，在老校长的重视和领导下，发展成为著名哲学系之一。李达明确表示：在学术上竭诚拥护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大胆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一成不变的中山装 李达老校长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他总是穿着一身中山装，庄重朴素。他尊重知识，平易近人，将学有专长的老先生视为办好武大的基本力量，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以发挥所



长。如有特殊任务要布置给指定的专家、老师，不是直接让校长办公室通知或打电话，而是亲自登门拜访，以同事态度与之当面商量征求意见，力求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主动性，使教学科研任务高水平顺利圆满完成。他爱护学生，如有学生前来拜访，他会放下手头工作亲自接待。在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达更是努力为全校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十分重视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当时的珞珈山校园，晨读朗诵外语之声风气盛行，图书馆、阅览室前排长队求一自习座位等现象，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李达当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当时武汉大学有两位学部委员，与他同时当选的还有数学系的李国平教授。1956年，经教育部评定，武汉大学有六人被评为一级教授，他们是：中文系刘永济、刘博平，历史系李剑农，哲学系李达，数学系李国平，生物系高尚荫。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在武汉筹备设立分院，李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临时党组书记、武汉分院院长，兼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及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李达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做出了人所共知的重要贡献。李达写作专著《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动因，来自毛泽东的提议。1961年8月，毛泽东特约李达在庐山会面，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问题。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赞扬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认为：现在此书还有重大意义，应该修改出版。毛泽东的谈话给了李达很大鼓舞，他欣然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哲学系青年教师中遴选几位助手，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分为上、下卷：上卷论述《唯物辩证法》，下卷论述《唯物史观》。李达的写作班子里有他的学生和助手陶德麟，后来成长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经过四年的努力，上卷内部讨论稿于1965年撰写完成，装订成铅印本，李达将书稿寄给毛泽东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审阅；但第二年夏天李达便被批斗致死。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出版



社请陶德麟根据李达生前意见对上卷送审本进行了必要修改之后，才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正式出版。

李达的组织观念极强。在任武大校长期间曾向党组织坦陈：“因愤恨陈独秀专横，于1924年离开了组织。这是我所犯的绝大的错误。”他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决不做违反党的事情。”

理论界鲁迅

1956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武汉东湖宾馆^①（梅岭一号），他知道李达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特别嘱咐省委联络员梅白说：“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却仍然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第二天，毛泽东要梅白去请李达。李达来到东湖宾馆见到毛泽东十分激动，连忙叫道：“毛主席……毛主席……”也许不习惯的缘故，一连说了几次“毛主席”，后面那个“席”字就是没有跟上来。毛泽东见李达那副“窘态”，呵呵笑了起来，连忙握住老朋友的手说：“鹤鸣兄，不要自己难为自己了。你主、主、主什么，你曾当过我们党的第一任宣传主任，那时我叫你主任没有？没有啊！我们还是过去在清水塘办自修大学那样，你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 受毛泽东乐观大度精神感染，两位契友畅谈起来。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

^① 毛泽东一生中曾多次来武汉，并下榻东湖宾馆，此前下榻次数对外一直公布为44次。近日东湖毛泽东纪念馆馆长郑敏庭告诉记者，经过研究室向100多位相关人员求证确认后，修改了这一数字，增加了1953年4月、1963年4月、1965年1月至2月、1968年6月这4次下榻时间。现有纪念画册：《毛泽东在东湖梅岭（1953—1974）》（汉英对照）画册收录了毛泽东同志48次下榻东湖宾馆的珍贵资料。



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鹤鸣兄，不要再自责了，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

李达见毛泽东对自己这样评价有些不好意思，憋在心里多年的话不吐不快，连忙说道：“当时，要是听你的劝告，不与陈独秀赌气而离开党，说不定我还真的与你去爬雪山、过草地了。”毛泽东说：“鹤鸣兄，你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你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特别是不久前，你砍胡适的那一板斧，是何等的痛快！”他们边谈边开着玩笑，一谈就是一下午。

聘用“右派教授”曾昭抡 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李达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反右权威”，他曾经发表过一系列反右“檄文”。李达爱护学生，视学生为国家宝贵后备人才，把保护学生视为职责所在，他明确表示“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他时刻不忘罗致人才，即使被划为右派的专家，也毫不犹豫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大名鼎鼎“右派教授”曾昭抡^①，也被李达邀请来武汉大学

^① 曾昭抡(1899-5-25—1967-12-8)，字叔伟，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昭抡1912年考入长沙雅礼中学，1915年考取学制为8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1920年毕业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1926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1957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1957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受李达校长聘请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1967年12月卒于湖北武汉。



任教授，曾昭抡重回讲台和实验室非常激动，很快组建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他除上讲台、实验室外，大多时间在图书馆，主编了200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专业课程教学，建立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科研组。在他的影响下，青年教师查全性和他的学生刘道玉等青年学子迅速成长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曾昭抡头上，他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綱被残酷夺去了生命，他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的罪名进行批斗。曾昭抡当时已病魔缠身，癌细胞开始转移，1967年12月8日，在无亲人陪伴的凄惨情景下默默离世，终年68岁。1981年3月，教育部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1985年武汉大学特拨专款设立曾昭抡化学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李达与毛泽东吵了一架 1958年毛泽东南巡来到武汉。某一天，李达在东湖宾馆见到毛泽东，老朋友一见面，即对当前局势展开讨论。李达面对毛泽东直言不讳地问道：“润之，你说说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看了那两句口号后，不以为然地说：“鹤鸣兄啊，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口号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鹤鸣兄，你是搞哲学的，实际上这个口号也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是一定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当时在座的王任重等人吓坏了，连忙劝阻。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回道：“你不要用帽子压人！”接着直言规劝道：“润之，这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头脑发热。你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万万不能头脑发热，如果你发热到39度高烧，



下面就会烧到 40 度、41 度、42 度……这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毛泽东也不客气地回答：“鹤鸣兄，你说我发烧了，我看你今天也发烧了，而且有华氏百把度了。”在这次争论中，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谁也没有说服谁。两位老朋友不欢而散。

“我们有责任” 李达对 1958 年的“教育革命”持反对态度，用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左’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话实说。1958 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1961 年，李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直言：这一时期武汉大学教育的失败！他说：“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是不对的”；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学校办工厂，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李达说：“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

这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看望李达。杨秀峰与李达曾同在北平大学任教，是李达的老朋友。他此行目的是为即将出台的《高教六十条》征询意见。李达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建议实行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

武大“三家村”

“文化大革命”来临，李达因为正直和耿介竟亦惨遭批斗，被残酷迫害致死。1966 年 4 月 10 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人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接着，一些人出于各种动机写了“揭发”材料，编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武大也有“三家村” 武大紧跟北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步伐之后，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在经受了哲学系部分师生对“大叛徒李达”的批斗后，李达



心中愈加烦闷，他对生活秘书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他心情更加忧郁，沉默寡言。7月中旬武汉天气酷热难当，武大的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校长居所上方，批斗广播加大音量不间断播放；李达所住小院外被一批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都高叫着“打倒李达！”，来自他湖南家乡的“贫下中农代表团”中有个“农民”上来就要用锄头把李达打死；还有个“受过李达批评”的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由于连日饱受肉体摧残和噪音刺激，使身犯严重疾病的老校长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个“+”号)，血压上升到236/114。本应当急送医院就诊，却由于他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学校卫生科奉命停止了她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必须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被强迫停止供应。

毛泽东指示“不要把李达整死” 鉴于李达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王任重先后三次直接请示毛泽东。前两次均未表态，第三次毛泽东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也向毛主席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产生一线希望，他写了一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夫人石曼华送到武汉东湖梅岭1号毛泽东住处。石曼华无奈道：“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思考再三要刘秘书马上送出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可他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了。工作队拆开信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也不敢扣押，却直到7月29日，才将李达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与内涵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而头天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直到8月10日，才收到“李达的信”，但看到的并不是李达原信，只看到一张条子：“李达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对李达的求救，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



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然而无论毛泽东的指示还是王任重的保证，都没有传达到，武大“革命师生”也根本不知道竟有如此重要的“指示”和“保证”。

8月上旬，李达病情愈来愈重，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我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连此求生愿望亦遭严厉拒绝。8月13日凌晨5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上午9时，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冷酷无情的拒绝。李达自知生命垂危，却仍在顽强地坚持着，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对夫人石曼华说，如果病好了，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告状”。

李达最后一次向党委书记请求去医院治疗，仍然遭到拒绝。他悲愤交加地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李达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把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却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照护。接着李达就被冠以“李三”这一侮辱性的名字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米未进，石曼华托人捎带牛奶过去，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随后，工作队就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

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武大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李达”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委对李达处分的决定：“开除党籍，按地主分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与此同时石曼华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了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劳改”生活，并勒令石



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

李达恢复党籍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李达去世30年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从湖北武昌九峰山公墓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作者系数学系1952级校友



跟随查全性老师半世纪

陆君涛

时间过得真快，从1963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留校工作算起，我与查全性老师共事已半个多世纪了。

我是1960年秋季以“代培生”身份到武大化学系插班进入三年级学习的。我原是1958年入学的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河川系学生。1959年，正值“大跃进”的第二年，中央领导鉴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下文件指示“凡有条件的工科大学都要办理科”，于是许多自认为“有条件”而实际上并无条件的非综合性大专学校就在自己的学生中选定若干“预分师资”，送到综合大学去学理科，指望学成后回来当理科教师。这样，武大化学系1958级(即1963届)就增加了一个由外校送来的代培生组成的约30人的代培班。刚到代培班不久，就从比我早来一年的同学中得知，查老师曾是地下党员，又是业务尖子，刚从苏联进修回国，是全校教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那时，“又红又专”是大学生的努力方向，因而我对查老师虽未谋面已生敬仰。

后来，系学生会组织了一次“红专报告会”，请查老师主讲。报告会地点在学生俱乐部(现樱顶学生食堂上面)，同学们都坐着自带的当时学生标配的小板凳。查老师那时还不到四十岁，戴着玳瑁色边框眼镜，已开始谢顶，但精力充沛。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内容现已无记忆，但有一句话我一直没忘：读书不是一本书一本书地读，而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读。这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就是跟着课程安排一本书一本书地读的。后来，我逐步领会到，围绕问题读不同的书确实是求得对某一问题



的深入理解及不同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的好方法。

听课使我对查老师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先给我们上的课是化学系四大基础课之一物理化学中的电化学部分。当时化学系有几位老师以课讲得好著称，但我最喜欢听的还是查老师的课，觉得他的课讲得活，常触类旁通，将电化学与其他课程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在四年级分专业时我申请学“物理化学专业的电化学专门化”(当时的学科分类方法如此)。

在电化学专门化，查老师给我们开了两门课，分别是“实验室电学基础”和“电极过程动力学”。教材都是查老师自编的油印讲义，边上课边印发。那时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讲义的纸张粗糙、颜色土黄，但散发着油墨香。“实验室电学基础”是一门很有特色的课程，从交直流电和检流计开始，到电动机、电子管、半导体，再到当时的先进仪器示波器。这门课对我们后来在工作中掌握各种仪器的帮助极大。

查老师编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讲义值得特别说一下。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电化学专门化，但都苦于没有合适教材。查老师的讲义在同行中流传后，受到普遍好评。1963年，第一届全国电化学会议的与会代表一致要求查老师在讲义的基础上写成专著正式出版。经两年努力，《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终于脱稿。遵照查老师安排，我为全书手绘(那时还没有电脑)了全部插图，并于1965年到位于恭王府的科学出版社与白明珠编辑联系出版的后期工作。此书原定于1966年出版，但因“文化大革命”推迟了十年，到1976年才问世；后来在1987年和2002年先后修订扩充成第二、三版并多次重印。这是一本至今长盛不衰的中文电化学专著，对国内电化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查老师于1957年被派往苏联进修，师从现代电化学奠基者之一——弗鲁姆金院士，1959年回国后在“热化楼”的一楼(包括其后面的几间平房)建立了电化学实验室。在我做毕业论文时，他有四五位更年轻的教师协助工作，已有一名研究生在学。科研方向包括了电化学的主要领域，如化学电源、金属腐蚀与防护、表面活性物质在电极上的吸附、电化学测试新方法等。所用仪器设备在当时都



属比较先进的，其中质量较好的如标准电阻箱、电容箱和部分示波器等都系从苏联进口。在尽量添置先进仪器的同时，查老师也从实际出发自己动手做一些小仪器，如电子管恒电势仪、半导体放大器、自动控制的拉单晶装置等。查老师对仪器有极强的驾驭能力，因熟悉其性能从而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大多数情况下仪器坏了还能自己修，给示波器“开膛破肚”是“家常便饭”。

我的毕业论文是用滴汞电极研究碱性溶液中汞的电化学氧化，所用主要仪器是国产 882 型自动笔录式极谱仪。查老师先将仪器说明书给我，要我两天看完。虽然上过“实验室电学基础”，可是看到迷宫似的线路图我还是觉得无从下手，花了两天仍没看出头绪，经查老师一番当面讲解后终于豁然开朗。从此，我对仪器的电路图就不那么怕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实验室得到一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进口的顺磁共振仪，我被安排负责管理。使用过程中顺磁共振仪出现过许多故障，凭借随查老师工作积累起的信心和勇气，硬着头皮啃说明书和电路图，终于一次次克服了故障。那台仪器一共用了 20 年，直到“全面器官衰竭”。据我所知，这是全国同时进口的同型仪器中使用年限最长的一台。这是后话。

通过上大课、小课及毕业论文等活动，我对查老师的了解逐步增加，觉得查老师是我所遇到的老师中最善于学习和最有发展前景的，从而产生了毕业后在查老师身边工作的愿望。“文革”后，查老师成为武大第一位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似乎印证了我的看法。我来武大时是华东水院的代培生，但到毕业时原来“工科大学办理科”的计划已作废，允许我自行填报毕业分配志愿。1963 年毕业时，分配志愿表上我填了“留校工作”，结果被批准，从此开始了与查老师一起工作的岁月。

在与查老师共事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一起做过不少课题，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200 瓦间接氨-空气燃料电池”项目。该项目由邮电部下达，与武汉邮电学院合作，目的是为边远无人地区微波中继站提供自动化长期连续工作电源。该项目开始于“文革”期间，动员了当时武大电化学几乎全部的研究力量。查老师带领大家做实验和分析实验结果，也一起轮流值夜班检测电池放



电。那时粮油都计划供应，但因公值夜班有特供夜宵，每人二两面条、一个鸡蛋、一勺食油，加上几片青菜和一点酱油。查老师与我们一样，干到半夜转点时在实验室电炉上煮面条。经过查老师与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的攻关，历时七八年，燃料电池项目基本达到了设计目标，并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后得到外国同行好评。虽然因不久后国产通信卫星上天，微波地面中继站已不再必要，此成果最终未投产实用，但攻关过程中学到的科学知识和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后工作有着长远影响。

在燃料电池项目攻关期间，有一天查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总算比较会用欧姆定律了”。一位资深物理化学教授用这样的语言谈及一个初中就教过的物理定律，初听不禁会令人感到意外，但我立即联想到当时正在研究的“多孔电极极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电极内电流、电势的三维分布，而此分布是欧姆定律与电化学定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欧姆定律的公式很简单，但在这样复杂的实际问题中，在该用到它的时候能想到它并正确地运用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可以说是将书本知识用于具体实际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一种体现。

在与查老师长期共事的过程中，还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深广的意义。在燃料电池攻关中，我们不断结合自己的工作探索着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经燃料电池攻关这一长时间跨度的硬仗，我们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查老师将此总结为“在研究重大应用课题的同时，力图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认识”。这句话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似乎不言而喻，但却是长期亲身探索的总结，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我有幸跟着查老师，在燃料电池攻关中，走过了一遍“从实际问题中提炼出科学问题，将科学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的全过程，获益匪浅。1973年，邓小平刚复出，查老师就以武汉大学化学系电化学研究室的名义在《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在科研中要注意基本理论研究》的文章，以自身经历呼吁正确对待理论研究。

我觉得，“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是我跟随查老师数十年的最大收获，这也是武大电化化学的特色和传统，一代又一代的武大电化



学人都不同程度地受此熏陶。我欣慰地看到，新一代的武大电化学人正继承和发扬着这一学风，相信他们能不断开创新局面，做出新成绩。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 1509 期)

作者系化学系 1958 级校友



我和导师陶德麟先生的师生情

倪素香

惊悉导师陶德麟先生 2020 年 5 月 24 日下午五点零八分溘然仙逝，学生不敢相信，悲痛不已。5 月 28 日与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心情始终无法平静。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时在脑海浮现，一切都仿佛在昨天。谨以此文记下先生的指导与教诲，表达学生无尽的怀念与哀思！

幸入陶门，师生结缘

初识陶德麟先生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从东北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懵懵懂懂地踏入哲学园地，就听闻陶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陶先生大学毕业后就留校担任时任武大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在我入学的那一年被国务院评为博士生导师，对我们来说唯有崇敬和崇拜。那时我从未想过、也不敢想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学生，谁承想十年后我竟能忝列门墙，有幸与先生结下不解的师生缘。

我 1984 年入学，1988 年获得学士学位。而 1984 年至 1988 年，正是陶先生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时期。因行政事务繁多，陶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只是做过几场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毕业那年陶先生作为系主任专门给我们毕业生做的毕业演讲。六月初的武汉，天气开始微热起来，坐在下面静静聆听的我们还没有那么强的热感，在作报告的陶先生却因为站着讲话而汗流满面，不时用手绢擦着汗。当时负责组织活动的辅导员看到此情景，询问陶先生是否开启电扇，陶先生说，电扇噪音太



大，影响效果，同学们不觉得热的话就不要开了。就这样，在闷热的环境下，陶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勉励我们继续前行，要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母校的培养。虽然陶先生那天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我记忆模糊了，但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形象却从此在我心中树立起来。他不仅儒雅、博学，更是有爱心，关心学生。先生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而是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后，我萌生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此时陶先生已是武汉大学校长，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讲师，自然是不敢报考他的博士的，所以我最初想报考的是另外一位导师。当我把报考博士的想法向系里汇报后，系里建议我报考陶先生的博士，因为研究方向更切合我的研究基础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于是我在报名表上导师一栏中斗胆填上了陶德麟先生的大名。填报报考申请后，我想还是要跟陶先生联系一下，请教一些问题。考虑到陶老师工作忙碌，我选择在休息日和晚上联系，但打了两次电话都是师母接的，陶先生忙于公务没有在家，只能向师母告知我的想法。第三次我再冒昧地打电话时，师母说陶先生已经知道我报考的事情，他现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接待我，让我跟欧阳康老师联系报考博士具体事宜。还是因为忙，博士生复试陶先生也没能参加。就这样，一直到我收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没能与陶先生见上一面。

1994年，我终于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弟子。不幸的是博士生入学体检时，我被查出患了气胸病症而住院。幸运的是因为住院，我见到了陶先生，有了跟导师的第一次私下交流。当时陶先生因探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副校长来到校医院住院部，正好是我住院的地方。我听到医生说校长来了，连忙起身走到走廊，看到校长一行走来，我马上走上前，对陶先生说：陶校长好！我叫倪素香，是您今年招收的博士。陶先生问：你怎么在医院？我说我体检查出患了气胸，现在住院治疗，不能上课，非常不好意思。先生说：你安心治疗，课程以后再补。听了先生的一番话，稍感欣慰，于是安心养病，经手术治疗康复后在第二学期开始上课、补课，顺利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

在我攻博期间，先生还承担着重要的行政和科研工作，只能利



用休息时间给予我学业的指点和教育。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从选题、提纲到初稿、定稿，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先生在我论文初稿上留下的批语和建议，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启示，我也得以顺利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998年5月26日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与导师的合影

倾心教诲，师生情浓

陶德麟先生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影响着他的学生，更是以他的高尚道德和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不管行政事务多么繁忙，先生一直站在学术工作的最前沿，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我以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而倍感光荣，更荣幸的是先生不仅在我们就读期间教授我们学业，更是在我们的事业发展中不断给予鼓励和帮助。

我博士毕业后，先生仍不断给予我学术上的关心和事业上的引导。我的博士论文在2001年出版时，我忐忑地向先生提出，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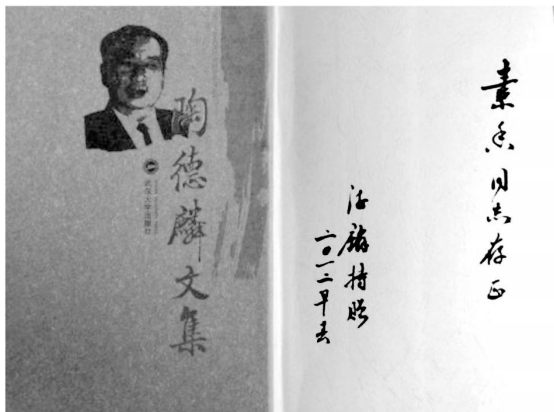
能拨冗为拙著作序，先生欣然应许。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巨大工程中增添了坚实的砖石，在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作者的初衷所在，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也成为我学术研究道路上最大的动力。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伦理研究”在申报过程中也得到先生的指点和支持，先生亲自修改我的申报书，让我感动不已。在项目完成2008年出版之际，又得先生大力扶持，再次为该成果的出版作序。他在序言中再次勉励我：从博士论文《善恶论》的纯理论的研究转换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作者来说也是一次跨越式的进步。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我以为《制度伦理研究》一书为制度伦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相信出版后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也希望作者把此书的完成当作新的开端，虚心听取专家学者和其他广大读者的批评，继续作更深入的研究。作为作者的导师，我也愿借此机会对多年来帮助和扶持倪素香同志成长和进步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先生的肯定和抬爱，我十分感激！

为了提携后学和弟子，陶先生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子课题的研究，继续给我提供求教和学习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了课题团队，在陶先生的指引下继续探索和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这一课题，研究成果201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再次为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作序，他说：“作者并不回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各个历史阶段争论的焦点问题，客观公正地分析其背景和特点，是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中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本书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本书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史的简单描述，而是探讨了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及其如何在问题的争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因此，本书也呈现出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理论研究的深度，具有问题意识和历史视角，是问题史与发展史的统一。”这又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鞭策。

先生卸任校长一职后，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哲学的现



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著作多部，笔耕不辍。陶先生还把他出版的《陶德麟文集》签名后送给我，让我开心不已。



2012年春节先生送我的大作并签名

先生也开始参加学术会议，并不断在会议上发表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让与会专家和学者深受教益。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因此有机会我就尽量参加有先生出席的学术活动，继续领略大家的风采，继续接受先生的引领，和先生的学术情缘也越来越深。

我今天能有幸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者和博士生导师，与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我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先生仍以他的高尚人格影响着我，引导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先生不仅教会了我专业知识，更为我树立了做事和做人的典范。



2014年与先生在新洲参加学术研讨会

殷切关怀，师恩永存

先生退出领导岗位后，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和接触。先生对学生的点拨和提醒如春风化雨，他从不严厉批评学生，总是在轻言细语中透着严谨和温暖，在润物细无声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博士毕业后，我基本上每年的教师节和春节都会去拜访先生，如果碰巧家中来客不多，先生就会和我聊起家事，聊起他成长的过程。从交谈中我知道了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末儒士，在家乡开办学馆，一生清贫；他的父亲幼承家学，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在家中藏匿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并护送出境被当局免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父亲贫病交加，仍拒绝为当局服务，于1949年病逝。陶先生的母亲曾就学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中小学教



师。陶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素养，与他家庭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当年他父亲不顾生命危险保护共产党人的情景，让人由衷地敬佩。我当时好奇地问：您父亲为什么会那么勇敢？先生说，自己的父亲当时并没有询问到自己家里躲避的人的身份，但心中已猜到他们可能是共产党，父亲觉得不管是什么人就这样被国民党杀害都是天理不容的，应该想办法保护他们。另外，先生说他的父亲对国民党的很多做法早就多有不满，以致在1948年愤而退出国民党并拒领退休金。先生在1978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勇于担当精神，一定有其父亲的影子；先生百折不挠、人道情怀、虚怀若谷的高贵品格，想来也是深受家学的陶冶，让后辈敬仰。

先生曾和我谈过他的求学经历，我想也是在敦促我勤勉奋进吧。先生没有上过小学，抗战时期举家迁至恩施，学习环境异常艰苦，就这样，先生在12岁时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省立实验中学。先生说，尽管那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大家在油灯下读书，在河水里洗脸，在操场上进餐，但这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培养了自己浓厚的报效国家的情怀。先生还补充说，因为是省立中学，他们的学费是免费的，食宿也是免费的，抗战胜利后他随实验中学迁回武汉继续学习，也是免费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抗日战争那么艰难的环境下，一些中学竟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教育。先生说，这是因为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大多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所以政府决定全部免除这类中学的学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先生特别感恩这一段生活，尽管有许多困难和艰辛，但有国家的支援和大家的努力，让生活充满了希望，奋斗有了期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大学同时录取，最后因为要照顾母亲选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听先生讲述他的求学经历，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先生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坚持不懈地求学求知，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先生并没有直接告诫我说要不畏艰险、要永不懈怠，但他的人生经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是他书写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先生还和我谈起过他在“文革”中的过往，可谓刻骨铭心。当年年仅35岁的先生成了全校的“黑帮分子”之一，被囚禁起来批斗审查，随后被送到襄阳劳动改造，其间又一度被加上所谓“5·16分子”的罪名，关在单身牢房里被刑讯逼供，并以“假枪毙”相威胁。其中有昔日的同事为表忠心，对先生拳打脚踢；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对先生揭发批判，先生虽然伤心但并未记恨。他和我说其中一个伤害过他的老师，后来因为住房的事情求过他，他并未打击报复，而是吩咐相关部门按照规定予以解决。我问先生为什么不恨那些打击他的人，先生说：“文革”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错不能让个人来背负，我个人不需要他们道歉！这是何等的胸怀！后来担任领导职务，面对批评他的人、甚至不同意见的人，先生也总是一笑了之；甚至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先生总是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爱护和帮助。宽容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对对手的宽恕更是一种难得的道德境界。先生的博大胸襟和虚怀若谷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足以让对手折服，让世人敬佩，让学生仰慕。

先生不仅给学生、弟子亲人般的关怀，其实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怀有加的。先生生病期间我多次探望，没有想到先生不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体，而是总在问我的身体如何，让我十分感激。最初因为住院与先生的邂逅，成了先生一直不忘的关怀，几乎每次聊天先生都会嘱咐我注意身体。先生不仅关心我，还时时询问我家人的情况，对我女儿能出国留学后又回国读博士，先生由衷地高兴。即使女儿不在国内，我去探望先生和师母，临走时师母也会拿出一盒糖果让我带回来，让我跟家人分享。先生一家对待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同仁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收到过先生春风般的嘱托和师母送的巧克力。先生却从来不接受学生们的吃请，每年教师节弟子们都想请先生聚一下，先生总是以身体不适为由予以拒绝。他在八十寿诞之际要请学生们聚餐，大家却觉得应该是学生请先生才对。先生发话：如果不让他请，他就不出席。弟子们只好依了先生。先生高洁清廉、正直仁厚的品格可见一斑。

2020年1月20日，我应邀在省人民医院采访先生，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记忆清晰。当我说到2020年是恩



2010年先生八十诞辰宴请汉弟子

格斯诞辰 200 周年和列宁诞辰 150 周年时，先生马上说恩格斯生于 1820 年 11 月 28 日，今年是 200 周年诞辰；列宁生于 1870 年 4 月 22 日，今年是 150 周年诞辰。听到先生对几个诞辰日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且准确无误，就想先生的身体应无大碍，很快就会治愈出院的。谁承想这一次和先生的见面竟是永诀。采访的稿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陶德麟教授》于 5 月刊发时，正准备拿去给先生过目，却是噩耗传来。这篇采访成了先生最后语言和文字，也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纪念和缅怀。

先生用其一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教给我们学术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先生用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们每一个的人生之路。于我而言，先生不仅是一位恩师，也是长辈，是如父亲一般的亲人。先生谆谆的教导、时时的关心、暖暖的问候，点点滴滴学生都记在心里，存在脑海。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恩师的教诲和关怀会让我受益终生，也将永存心间！

作者系哲学系 1984 级校友



我的老师李龙先生

孙来清

知道李龙先生是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其时我正在从一个高校“两课”老师向法学老师转型。其后，我陆陆续续读了先生的一些著作和学术论文，慢慢被先生平实的语言和强烈的思辨所吸引，也逐渐产生了追随先生读书的想法。

初见先生是在2014年元月的一天。上午8:30，我按约来到武汉大学东中区一幢住宅楼的三楼，为我开门的是师母龙女士。我清楚地记得先生当时上身穿着件浅色羽绒服，下身是蓝黑色裤子，脚上趿着一双布棉鞋，面西端坐在沙发上。客厅一角的空调并没有开，居北的厅内确实有点冷，我想这也许就是先生腿上为什么还盖着一个淡花小棉被的缘由了。落座后，师母热情地为我倒上茶，我则满是忐忑地递上早先准备好的简历。先生接过材料，对我说：“我的眼睛不太好，看不太清楚，你就把你的情况给我讲讲。”可能是通过我的语调觉察出了我的紧张，先生几次微笑着安慰道：“喝点水，慢慢说，别紧张。”或许是先生的包容与理解暖化了客厅里的空气，我的心绪很快也就平复了下来。

整个会面过程中尤令我震撼的，莫过于先生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与我进行的一番交谈。我想略述所及众多话题中的两个：一是在谈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时，先生认为，人之“三性”应该是认识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锁钥。人有“三性”，即人不仅有理性和感性，还有灵性。没有对人的灵性即能动性的认识，就不能正确解读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西方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往往专注于人的理性而忽略人的灵性，他们的理论出现偏颇也就在所难免



了。二是在谈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先生认为这一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先生首先从欧洲的凡尔登体系、凡尔赛条约体系、布雷登森林体系，一直谈到世界银行对治理的界定，又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治理，谈到了公报中的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先生还简单地谈了治理与管理、治理与善治、治理与共治、治理与法治的相互关系。先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的两块基石，应该让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谈判民主共放异彩，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些艰涩的理论，在先生那里则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既不突兀又不失灵动。细思，则又句句珠玑，听来确有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之感。由此联想到梁任公初会康南海后所发之慨叹：“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虽时事移换，却也未免感同身受。离开李宅，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三月份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会是什么结果了，因为这次会面本身已足可让我受益终身。

先生一生际遇坎坷。虽出身书香门第（先生的祖父、曾祖父都是清末进士，曾祖父李蕊还是清末翰林，著有《兵镜类编》一书，伯父李祖荫是著名的民法学家），却幼年丧父少年丧母，13岁就不得不从军学医。1954年9月，先生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在那里，天资聪慧的先生本该会获得一个美好甚至伟大的人生起点，因为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先生就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法学》等报刊上发表了文章；而且在那一年，先生还参加了全国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获授“青年法学家”称号。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整个社会都被一股无以名状的洪流所裹挟，作为一个青年大学生，先生终究无力逃脱。1957年先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极右”，旋即又在1959年因投书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入狱20年后，于1979年年底获得平反，并于1980年1月24日43岁生日当天出狱，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待分配毕业生。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有感于人生最宝贵的20年是在监狱



中度过的，出狱后的先生尤知时间的珍贵，决心要将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天道酬勤，先生在1989年就晋升为教授，2004年获评首届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更于2010年获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跌宕的人生经历，先生一向惜时守时。凡交代给学生的读书写作任务，皆有明确的时限，若以天计，则在截止日前一到两天，先生必会电话询问进展。在我的印象中，凡每次约好与我的会面时间，先生必在会面前10分钟左右给我打电话，用他那带有浓重湘音的普通话询问着：“小孙啊，你到哪里啦？”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对他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我的理解，先生这么做，可能不仅仅是对守时的言传身教，也是让那些一不小心忘了赴约的学生有一个弥补的机会，而学生又不会因此而陷入尴尬，足见先生的用心良苦，诚所谓“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

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从来都是身教甚于言传。先生虽已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坚持每日阅读且笔耕不辍。在2015年11月8日举行的“李龙先生法学思想研讨会”上，时任法学院院长的肖永平教授就曾讲，在全院每年年终的学术成果统计中，先生总是位列前茅，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佩。在学术研究上，先生认为有“三重境界”，即了解前沿为第一重境界，研究前沿为第二重境界，创造前沿为第三重境界。先生希望学生都能至少处于第二重境界，并力争都能达到第三重境界。先生认为，要达至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阅读经典与学术创作齐头并进，来不得半点怠慢。先生对马列经典的反复研读，对一个个学术前沿的开拓，如对“人本法律观”、和平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等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30多年的教学科研中，先生获奖无数，单是国家级一等奖就有六项，培养的博士生更是多达百余人，其中不乏法理学名家。因学生中有太多人都已成长为法学院的院长和高校的校长，以至于有人戏称先生是“院长与校长加工厂”。

待我入先生门下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正进入提速期。先生几乎每个月都要赴京参加有关书稿的



审议会议，这对于一位 80 岁的老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由于先生不谙电脑，每每所提建议都要通过手写完成，再交由打印社打印，亲自校对后，再将电子稿发送“马工程”办公室，无形中又要多出许多事，加之每次会议日程又很紧凑，去京一趟，每每疲累，师母心疼，总是有意无意地劝阻，但先生总说：“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我是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又是法学组负责人，我不去怎么行呢！待到这些教材审议完了，我就一心在家带博士。”因为年龄与身体的原因，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就不得不需要一名陪同人员。由于与我同届的是一位师妹，陪同先生出差多有不便，于是我就成了先生的选择。但逢出差，先生总是提着他那不知已经用了多少年的黑色提包，我每每要帮他提包，他都拒绝。其实那个包里装有衣服、书稿等，重达十几斤，他每次都是自己提，走得还不比我慢。考虑到他的身体，我不得不反复提醒，要他走慢点；而先生每次都报以微笑，脚步却从来没有放慢过。

先生生活非常简朴，从不浪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陪同先生去北京。订的票是上午，这就不得不在火车上吃午饭。我们点的是梅菜扣肉，记得是 65 元一份，先生知道价钱后，懊恼不已，并严斥高铁经营的垄断，也为自己没能对我订饭进行有效监督，因此超出出差补助标准而后悔。此事直至我们返程，先生都还耿耿于怀。后来我俩决定，再去北京一定要乘坐中午 12:15 的车，虽然到达酒店时会有点匆忙，但可以在家里吃过早中饭再出发。现在陪同先生出差的已是我的师弟了，但这一“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我喜欢陪先生出差，原因有三：一是我个人较为懒散，每次出差，先生必问最近读了什么书、思考了什么问题、写了什么文章，如此，我也就无法不用功了。二是先生最喜欢与学生纵论古今。出差路上的几个小时，就是我们师生互相交流讨论的时间，也是我学习先生观察问题、论证问题方法的好机会。我的几篇文章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触发灵感而完成的，虽然并不是每一篇都刊发了，但智识上的锻炼却是不争的。三是这会让我不断地走近先生。先生的一生本就是传奇，通过先生每次或多或少的回忆，我每每会在先生铺陈的人生画卷中穿越时空，在与他所处的那个激荡的时代的对话中



感受沧海桑田。其实，任何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样一位老人面前都会显得苍白与无力。

当然，出差途中也并非全是学术研讨那么严肃的话题。快乐怎么可能舍得离开这样一位充满故事的老人呢？先生虽然皓首穷经，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先生才能在数次面临几乎绝境的情况下抱持信念，并赢得与命运对弈后的胜利。在狱中那会儿，先生热爱读书、下棋，因为是狱刊编辑，也能抽抽烟、喝喝酒。出狱后，这些“爱好”都“坚持”了下来。由于几年前突发脑梗，在医生的建议下，当然也离不开师母的有效监督，先生戒掉了烟酒，但出差时还会因为远离监督而抽上几口。每每如此，先生总会孩子气地自我解释：“别人送的两包烟，不抽浪费了。”记得有次在宾馆，先生因吃多了饺子，肚子不舒服，他想抽烟时，我就对先生说：“您肚子不舒服还是不要抽为好。”先生回应：“烟是进肺的，跟胃没关系。”我则用身体本是一个有机系统加以反驳，先生只好悻悻然呵呵一笑，随即边掐灭手中的香烟边说：“这颗烟不大好抽！”

近些年先生喜欢看点电视。记得第一次陪同先生去北京开会，刚到的那天晚饭后，先生叮嘱道：“小孙啊，你先回房间去洗洗，一会儿来我房间看看电视，顺便聊聊天。”过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来到先生的房间。只见先生一边开心地笑着，一边大声地招呼：“快坐下，快坐下，看看这个男的能有几盏灯？”原来先生正在观看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在戒掉烟酒后，消遣的方式就变成了看电视，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就是《非诚勿扰》和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红高粱》。看《非诚勿扰》时，先生会饶有兴趣地对男主角进行一一评析，并对其能保留几盏灯、站到第几关、最后会选择谁进行预测。先生会为自己看中的男主角未能最终与女主角牵手而惋惜，也会为自己预测得准而高兴不已。在观看《红高粱》时，先生会对日本侵略军的残忍行为默默不语并眼噙热泪，也会对自己熟悉的枪炮进行性能讲解，仿佛置身于当年的军营。这样的场景是很难让人联想到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法学家的，那分明就是一位亲切的邻家爷爷。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大善人，自芳而芳人。我常想，遇上先生这样的老师，虽是我今世的缘与莫大的幸，但一定是我前世曾经的苦修才换得的福，我怎能不备加珍惜！

（稿件来源：原刊于《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4~229 页）

作者系法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石屋二老：纪念任凯南、李剑农两教授

夏道平

战前在珞珈山居住的校友们大概都知道“半山庐”，但没有听说过“石屋”。石屋是我为写这篇东西特地给半山庐取的一个外号（其实应该说是本名）。因为我觉得：石屋的“石”和我所写的两位主人公有些相同的属性，半山庐不过是表明这座建筑物的地理位置而已。

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校友们一望这个题目应该会马上想到两位教授：任凯南（懋忱）和李剑农老师。因为珞珈山的许多建筑中只有这一座石屋；这座石屋，在战前也只住过这单身的二老（老，是我们学生当年的印象。现在，翻开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一看，这两位老师的肖像比今天镜中的我要年轻得多）。

石屋建在珞珈山腰。矮矮的四面围墙，全是就山取材的花岗石砌成的。面积，用我们在台湾听惯了的用语来讲，大约有40个建坪。周围，除高高低低的花树和灌木以外，是一片松林。所以右上方相去约300公尺的那幢二楼小洋房（来宾招待所）叫做听松庐。

听松庐这个名称很幽雅，但它的风格不像石屋那样纯然古朴。

“石屋”与“二老”这两个概念在我脑子里发生关联，不只是因为“二老住在石屋”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一具体事实所蕴涵的抽象意义。

二老，在外形上有些类似之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大，重浊的湖南口音，而且都有点口吃；任老师蓄短胡，李老师戴眼镜，他们的面部表情同样庄严而又自然。稀有的笑容，像不多见的冬天阳光



那么可爱。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同政治学系的同学李俊绕山腰的马路散步。途中望见这二老从山下消费合作社那个方向走上来。我们故意放慢脚步，跟在后面看他们和他们的行动（学生们对于所敬爱的老师往往如此）。任老师长袍上罩着蓝布大褂、布鞋子；李老师穿一件古铜色的袍子、皮鞋。他们都带着手杖，也都把手杖挂在左肘上。两手呢？左手拿一小包花生米，右手一颗一颗地向嘴里送。边嚼边谈，边谈边嚼，谈些什么，我们当然听不清楚。奇怪的是沿路上看不到他们扔下的或唾出的花生皮。当时我向李俊开玩笑：你们湖南佬，吃花生米是连皮吃啊？玩笑是玩笑，事实是事实。山回路转，我终于从侧面望见他们是把花生皮捻脱在纸包里面的。

快走近石屋的时候，任老师的花生米吃完了。捏成一团的小纸包，从左手递到右手，往衣襟里面的口袋一塞，接着，右手在大褂上擦两擦，再拿起手杖，有节奏地一步一步走回石屋。石屋不紧靠马路，其间有山坡、有石级。

斜阳从洪山那边柔和地辐射过来，穿透枝叶疏落的秋林，摇晃地画在石屋的围墙上。

这些情景：柔和的阳光、松林、石屋、蓝布大褂、手杖、花生皮……当时的我，除了觉得有一种模糊复杂而未概念化的和谐美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今天，整整三十九年以后的今天，从体验上，从书本中，我对于我们生长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以及这二老深受熏陶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精神传统，多少有了一点认识。这时，再回想当年这幕似乎“无啥稀奇”的情景，自觉有了一个较明朗的概念化的认识。现在，我想我可以这样大概地说，石屋二老所代表的精神，有中国儒家兢兢业业的有所为（后面再讲到），和道家潇洒自得的无所为。手杖和花生皮，象征 Job Locke、David Hume、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 所建立发扬的近代西方人文传统——个人尊严和“群己权界”。

同住一屋的二老，任老是经济学系的教授，李老是史学系的教授。经济学系是我的本系，我与任老师的接触比较多。以下分别写



点他们的故事。

任老师教过我们“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这两门课，尤其是思想史，他是下过很大工夫的。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的B(S. ec.)学位，任老师不是轻易得来的。他从名师 Edwin Cannan 苦读了五年，回国后始终专心教学，而且锲而不舍地钻研。他造诣的境界，我们不得窥见；但其造诣之深，我们是可以领会的，从他上课时的那股劲儿领会到。他讲课时，口吃的湘音尽管叫人难懂，但我们从无倦意。相反地，我们更注意听。当讲到得意的时候，他使劲想把满肚子的东西一股脑拿给我们而又难以尽量拿出；好像一股上涌的泉水，涌到一个狭窄的出口那种情况。这时，他举手投足，面部的静脉管也发胀，甚至眼睛急得向上翻。遇到这种场面，我们就像球迷看球赛似的，全身肌肉随着球员的一举一动相应地紧张起来。不用说，此时的任老师一定是满身大汗的。像这样负责任、竭精力的老师，我这一生只遇到这一位。从这一点，我们也可想象他在伦敦大学经济科苦读的那股劲儿。

谈到任老师本人的经济思想，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当然辨识不清。但我记得有这么一次：这好像是我进三年级的时候，任老师带着新来的朱祖晦教授(教统计学)向我们班上介绍。朱教授在讲话中讲到当时在美国尚未失势的制度学派，并且大为吹嘘。接着任老师很礼貌地带着微笑给他一个软钉子。任老师讲的词句，我现在记不清楚，大意是说，制度学派不过是历史学派的延长，他们至多是经济史的解释者，算不得经济学家。这些话，我当时不懂得它的重要性。现在我从这几句话中认知了任老师经济思想的路数，是承袭 Cannan 教授的心传，植根于以个人尊严为中心的社会哲学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界，在欧洲的几乎风靡于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又以制度学派占上风。任老师在这当儿，固守原则，宁可在“经济学家”的正路上默默地走，决不趋炎附势，转入左道旁门，这是何等气概！目前各国的所谓经济学界，几乎都是经济工程师当道，真正的经济学家凤毛麟角。怀念吾师，益增惆怅。

任老师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记述。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也许是最不该记述的一点，这就是他终生没有出版过一本著作。他只在《武



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其间有这么一段故事：我在四年级的时候，为着毕业论文的写作，有过多到石屋去请教任老师的经历。有一次他的话题转到了一般的写作上，他特别郑重地向我讲：“你们在三十岁以前，应该大胆地就你们的知识发表一点东西，好坏没大关系，不然的话，过了三十岁就难得有勇气拿出自己的东西来了。”最后一句话，是任老师的现身说法，给我勉励和警惕。我惭愧，有负老师的厚望。三十岁以前既没有什么东西发表，三十岁以后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可拿出来，只是翻译了几本心喜的经济学名著而已。任老师是有“自己的东西”的，可是他谦虚、诚实，他所说的“难得有勇气”意思是自己尚未满意的东西，不敢拿出来欺世以盗名，这一点，也和他的老师 Cannan 一样。

Cannan 只有两本论文集子发表，没有成书的专著。任老师的论文，尚有《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在，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片段。

现在，我再来回忆李剑农老师。

李老师教过我们政治学、世界史和中国经济史。政治学好像不是他的专长，他用的教科书是高一涵写的，李老师似乎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世界史是以 Wells H G 的 *The Outline of History* 做教材，他一边教，一边把它翻成中文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把译文和原文对照，十分敬佩译文的信达流畅，丝毫没有生吞活剥的痕迹。那时，我就开始有点翻译的兴趣了。偶尔把尚未讲到的地方，挑选看得懂的章节试译两三段，送给李老师批改，他很高兴、很耐烦地给我指点，并鼓励我有计划地译下去。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原因是生字太多，翻字典太费时。

李老师所教的中国经济史，可能是他用力最多最勤的一门课。他的讲义大多是他的创作，许多材料搜自历代民间的笔记，再以自己的观点来写，而不是从史书的货殖传、食货志这一类的制成品硬抄过来的。可惜这本讲义我没有好好地保存起来。来台后我常常向同学们打听，也找不着一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李老师的这本名著，我没有上过这门课，可是这本书我是在某个暑假当中，



一星期以内读完的。我现在知道，写现代史是最难下笔的，尤其是在台湾这种政治环境下，更是难上加难。李老师这本书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分量怎么样，我没有资格评论。但就此文字与材料的安排来说，真可说好极了。

李老师的教学认真与做人之足以示范，与任老师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都是我一生铭记在心的恩师。

（稿件来源：选自《夏道平文集》，长春出版社 2013 年版；原载《武汉大学报》第 1518 期）

作者系经济系 1935 届校友



送别好领导好朋友陈继勇教授

张艳国

2020年10月25日，又是一个悲情的日子！去年这天，我失去了敬爱的老父亲；今年这天，我失去了尊敬的老领导、好朋友陈继勇教授！人的一生总要经历生离死别，这样悲痛的日子，总让人铭心刻骨，痛彻心扉。

我与继勇同志相识很早，他比我早生11年，我们因为各种交集和际遇，至今已有30多年的交往历史。我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认识交往，因于三种缘分：一是，得益于我们老师之间的深厚友谊，使我们得以认识认同。他读博士时的导师是著名世界经济学家郭吴新先生（1927—2019），郭先生早年留苏，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著名教授之一，与夏振坤老师素相交厚，有传统知识分子相敬相惜的美德。继勇同志博士毕业答辩之时，夏老师担任答辩主席，因此成为继勇同志的座师。继勇同志是很尊重师长的人，此后，每逢重大节假日，他都来看望夏老师，或在他一些重要的教研事项上，请益夏老师；因此，我时不时或在夏老师家里、或在夏老师办公室见到继勇同志，并得以认识。我对他尊老敬贤、不忘师恩的行为很认同并心存好感。二是，我们在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工作平台上偶尔见面并加深了解。继勇同志曾担任湖北省青年经济学会副会长，是很有活力的青年经济学家；我则担任湖北省青年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省社科联工作的活跃分子。对于省社科联举办青年学者为主体参加的研讨会、座谈会，或者学术论坛，继勇同志都积极参加，认真准备，踊跃发言。每次参会，他都西装革履，白白净净的面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三七分、黑黝黝地



闪着富有活力的亮光，十分精神。显然，他对于社科联的学术活动十分重视，特别是在两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上，继勇同志运用世界经济专业知识和他的研究，结合中国国情和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继勇同志记忆力惊人，语言组织力强，善于表达，不用讲稿或者PPT，这也是他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优势所在。三是，在我曾长期服务的社科名刊《江汉论坛》编辑部，我们时有见面并加深了印象。无论是他自己的稿件，还是他推荐学生的稿件，他都亲自或是携同学生一起将稿子送到编辑部来。这既体现了他对于杂志及其编辑的敬畏，也体现了他自己对于投稿的重视。即使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了湖北大学副校长以后，工作更忙了，他也坚持这样做。虽然我不主审经济学稿件，但他每次来编辑部后，总不忘和我聊上几句，很是诚恳。

我们深入地交往，并“腹心相照”成为知心人，是在21世纪之后。2000年秋季，继勇同志从湖北大学副校长的岗位离开，被提拔到省社科院担任院长，成为我的领导，因此我们联系更多，交流也更多了。对于办院治学、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我们有很多共识或者相近的看法。继勇同志入院之始，就开展了长达半年的院情调研，轻车简从，不带秘书或者随员，认真听、亲自记，坦诚交流，带来了一股清风活力，全院上下老少对他评价很好，大家对他推动改革发展给予很大期望。按照我院惯例，他作为院长也兼任《江汉论坛》杂志主编。因此，他调研的第一站是杂志社。他对于自己的调研有着清醒的定位，作为院长而不是主编，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即奔着问题来，朝着目标去，而不是清谈聊天，例行公事，或者做样子摆pose。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江汉论坛》面临着保质量、稳队伍的突出问题，大家都很关心。通过深入调研，研究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办法。在继勇同志的创新性努力下，《江汉论坛》杂志得以在湖北日报社印刷厂继续印制，并按时出版。他对杂志社编辑人员在职称评定上进行分类管理，分别参加研究系列和编辑系列评审；同时，他高度肯定《江汉论坛》的学术贡献和编辑者的敬业精神，支持“以编为主，编研结合”的工作方针，这给全社同志极大



鼓励。大家积极投入到创名刊、保名刊的事业中，积极性高，无怨无悔。在他院长兼主编任上，《江汉论坛》发展得很好。

从高校到科研单位，会面临高校所没有的短板、劣势，有的还是先天不足，这些并非领导者人力可为。继勇同志对此是了解的，但他从不气馁，更不怨天尤人，身上总有一种振作振奋的精气神，大胆向前走。他与时任党组书记刘宗发同志的配合还是不错的。所以，继勇同志在充分调研后，建议社科院形成一套固化稳定的办院方针——“改革活院，开放办院，人才兴院，科研立院，制度治院”，很快获得院党组通过，并成为全院共识，坚持了下来。在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上，继勇同志有深切的人才意识，“人才兴院”他说得多、做得也多，及时出台了鼓励在职读博的实施办法，为长远发展储备了后劲人才。以我为例，我在2001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之际，接到多所高校礼聘之邀，面临着去留选择。继勇同志在此期间多次找我谈心谈话，真心诚意挽留我，做到了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宗发书记也多次诚恳地挽留我，与我交流思想，帮我解决思想困惑。当年国庆节后，我被任命为科研处处长兼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继勇同志信任我，支持我敢抓敢管。后来，据继勇同志告诉我，这是他们商量好了的做法。在他的指导下，在宗发书记的大力支持下，院里通过红头文件出台了“科研精品工程”“科研管理考核办法”暨科研考核期刊目录，修订了职称评聘办法，理顺了分类管理、定量优质、分层规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促进、围绕科研配置行政资源、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留住人才与引进人才等重大关系。现在，精品工程实施办法和科研考核办法得到坚持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科研生产力，激发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还使社科院人念念不忘的是，他和宗发书记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想千方设百计组织并实施了9号楼工程项目。在申报立项中解放思想，寻求突破，一举成功。在方案设计上，突出专家楼人才房特色，住房面积按上限设计，使入住者既拥有一间梦寐以求的工作室——“书房”，又使书房宽敞合用。即便是在阳台设计上，继勇同志也高度重视，几次与设计人员研讨，多次听取具有分房资



格人员的意见。在住房分配上，继勇同志更是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坚持突出人才房导向，极大地改善了一大批研究人员的住房面积，一改社科院多年形成的“常常建房，总是新房换新房”的不公平现象，使专家学者对院党组勇毅果敢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他担任院长五年时间里，只要有困难找他，他从不推诿，总能耐心细致听取汇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对我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暴露的弱点，他从不指责，总是个别批评，交心谈心，启发指导，提醒鼓励。他指导我们取得成绩，却从不突出自己，总是在有利于提高我院专家学者知名度、效用度的场合，宣传和表扬我们。譬如，关于建立湖北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议，本来出自继勇同志的思考和智慧，他找我商量后，我十分赞成，便与袁北星同志（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任科研处副处长）一道执笔落实。这篇报告很快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批示肯定，并于当年建成省政府网。事后，继勇同志在多种场合表扬我和北星同志，自己从不揽功窃喜。与继勇同志相处，总是能感到阳光般的温暖。

继勇同志离开社科院后，依然继续关心帮助我进步。2008年年初，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处一位双肩挑青年专家通过考试选拔、双推双选走上了山西省一所重点高校副校长岗位，继勇同志设宴为他送行，并邀我参加。之后，继勇同志请我留下来，建议我考虑并学习这位同志的思路与选择。他说了一系列肯定我、鼓励我的话，让我坚持自我，砥砺前行。因此，继勇同志还是使我换一种工作方式、变一种生活样式的启发者和指导者。我到江西工作后不久，他就借指导我校商学院专业、学科建设之机，抽时间来看我，指导我在校务管理与业务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醒我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根据他的指导，我将本职工作之外的教学科研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院中，与专业、学科团队一道戮力同心、团结奋进。经过十年奋斗，历史学专业、学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现在，我校历史学专业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获批首批国家一流历史学专业建设点、获批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实现了师大几代历史人的梦想。我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绝不放弃的精气神，与继勇同志



的指导和教益密不可分。

人的精神是伟大的，但人的生命却是脆弱的。继勇同志在胰腺胆管切除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高兴，每年寒暑假我们都相聚交流，祝愿他健康。没想到，去冬今春突如其来的该死的新冠肺炎肆虐武汉，耽误了继勇同志的治疗，导致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去年暑假我们的相见相聚，成为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

继勇同志开朗、自信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如今人类寿命普遍提升的年代，继勇同志的离去，无疑是英年早逝。他的朋友、学生、学界同行万分悲痛惋惜。

人固有一死，死亦有先后，这是世间常情。重要的是，死后还能活在别人的记忆里，活在别人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对人有益、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这样的人，才真正活出了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陈继勇教授就是这样的人！

深情送别继勇同志，永远怀念继勇同志！继勇同志在天国有灵，一定无病无灾，一切安好！

作者系历史学院 2002 级博士后校友



师教如甘露 浸沐益终生

保宗悌

记得恰好是 50 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刚刚考进武汉大学物理系，新生教育中有一个内容是听老教授给我们讲怎样过好大学阶段的心得体会。原来以为只是一般的听听报告，想不到这个报告里的许多话，50 年过去后仍然记忆犹新。它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和学习，指导着我怎样对待科学、对待人生。

给我们作报告的是德高望重的桂质廷教授。他是我国第一代物理学和地球及空间物理学的代表之一，是开创我国地磁测量、电离层探测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报告中针对我们有些新生对自己的专业缺乏认识和热爱的问题和表现，讲述了自己是怎样爱上物理这门学科的，介绍了自己怎样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假期，自带仪器到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地进行地磁测量，建立地磁台的经历；还介绍了他的好友吴有训教授从事的世界著名的“康普顿效应”实验，为中国物理学界增光，等等。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前辈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拳拳之心。

桂质廷教授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现在要我重新选择志愿，我仍然选择物理。”这句话之所以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是因为他教育我们，既然你选择这个岗位，就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就应该、而且一定要培养热爱专业的激情；至于这个岗位是什么，倒是次要的。所谓“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道理。学习科学、技术，和学习诸如文学、艺术、音乐是相同的，没有激情和投入是学不进去的。但最重要的是敬业精神，缺少了它，专业再好也只能学些皮



毛，学些时髦花哨的东西，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1961年在武汉大学与桂质廷及5教研室同仁的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桂质廷教授，前排左起第三人为保宗悌

桂质廷教授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无线电(当时的无线电科学是指现在的电子学、通信技术等方面)这门科学发展很快，落后五年就很难再赶上去。希望你们年轻人接我们的班，加紧赶上。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实验、自己的设备、自己的基地，是无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在回想他的这段话，对照我们的实际，真是千真万确。我们现在的电子、通信事业受制于国际，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芯片。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电子、通信事业虽有蓬勃发展，但仍未解决最关键的芯片问题，如果在21世纪不解决它，振兴中国的电子、通信事业将只是一句空话，或者是只有表面上的商业式的繁荣，而无实质性的、立足于自身的实力。这无论对国防还是对经济都是最致命的。



在武汉大学与教研室同仁合影(1986年)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和几位同学听从桂老师的教导，自觉组织了一个无线电学习小组，用业余时间制作电子学的示教设备。我承担的是一台示波器的教学启发示教板，当时国内尚未有国产的示波器，全系只有一台，是从美国进口的。我们借用实验室，利用整个学期所有的星期日，从设计到制作，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在学期末制作成功。桂老师鼓励我们，还要我们向下一级的学生介绍研究心得。示波器的制作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但当年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还是十分陌生和困难的，何况当时还没有什么现成的电路或者样板可以模仿。这个示波器的制作，可以说是我学习如何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成功的第一件作品，它为我以后能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无线电波偏振仪打下了有力的基础。从此，我知道怎样去克服困难，怎样去取得成功。更可贵的是为自己建立起了信心，让自己敢于面对陌生、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个小小的业余科研制作，经桂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推荐，我被选上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相当于副博士论文的科学研究的，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我



的教学与科研生涯。

桂老师除了正面引导和帮助我们走上科研和教学的坦途之外，还细心地关注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挫折或错误。记得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国内某些人一时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虚假、浮夸风气泛滥，也蔓延到了科研和教学领域。当时提倡“破除迷信”，特别是动员学业和知识不足的人破除对老师和有经验的人的“迷信”，也动员老师破除对过去所有的知识的“迷信”。群众出于希望中国能迅速赶上英美、迅速强大起来的良好愿望，以为能以所谓“大跃进”的方式，改变中国长期落后的局面，用所谓“革命”的方法代替科学、踏实细致的工作。有一次，当听到几个低年级的学生说汉口有人能用广播电台的电波把家中的灯泡点亮时，我也用一些电感、电容和灯泡连接起来，试试能否把灯泡点亮。桂老师知道我这样做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对我说：“如果是未学过电波的辐射与传播知识的低年级学生，去做这种实验情有可原，你已经学过这些知识，现在已经是老师了，还这样做就不对了。只要你用公式算一算，广播电台离学校有多远，辐射出来的功率够不够，能否点亮一个灯泡就很清楚了。”

我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确，从理论上讲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是用科学的态度，我不会去做这种幼稚的实验。而我却去做了，这说明我缺乏对科学的坚信。社会上的浮夸，政治上所谓的“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连起码的常识也要怀疑，也要“破除迷信”。这正是因为我本身素质的欠缺才会迎合这种伪科学的东西。而桂老师当时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当时提倡反对学术权威，认为知识越多的人越保守、甚至越反动），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对我提出忠告，这种忠诚于科学、忠诚于教育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

从此，我再没有做这种傻事，严肃对待自己的每一个科学研究和教学环节，坚决与伪科学和弄虚作假划清界限。我十分庆幸有了桂老师早年给我打的这支“预防针”，它使我能在今天坦然面对社会上的猖狂、假冒、腐败的泛滥成灾，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50 年后的今天，我唯一的希望是将桂老师的这种精神——“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精神，在我们有光荣传统的华南师范大学传播开来，在莘莘学子中生根、开花、结果……

(稿件来源：《羊城珞珈情》2018 卷)

作者系物理系 1951 级校友



我的老师 我的母校

陈东升

1977年国内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1977级、1978级的大学生原来基本上都是社会青年，到1979年我上学时也还有一半是社会青年。我也算是社会青年考上大学的，之前当了四年工人。

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通过父亲的介绍，我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我一心想上大学，去之前我就问在研究所工作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我是不去的。他们说研究所每年有一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所以我就去了。那个研究所在一个镇子边上，很漂亮的建筑掩映在树林和棉田里，研究所里有图书室、实验室，挺好的。研究所不大，只有二三十人，一半是大学生，大多是学农、学植物保护、学微生物的，华中农学院的最多，也有武汉大学病毒系的。在微生物研究所当工人的四年间，我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名叫陈其武的技术员，是从北京农学院来的，性格很开朗，我最早知道“四人帮”就是他同学从北京给他写的信里提到的。那时候对“左”的一套大家已经很厌倦，年轻人好跟着议论。改革开放后，研究所的这些人要么考上了研究生，要么就被大学聘去当讲师、教授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挺大。

我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四年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武汉大学任命的校长叫刘道玉，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他曾留苏学化学，在苏联是反苏的杰出学生领袖，后来被苏联遣回，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1981年



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时 48 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在武汉大学做了很多教学改革。

刘道玉向西方大胆学习的改革措施包括开设选修课、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有北京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校长特别骄傲。我到哲学系选课，也是受益者。那时候武汉大学的学生很活跃，当时有份全国大学生刊物叫《这一代》，就是武汉大学发起、十多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社团在北京开会共同创办的。第一次的编辑权给了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一上来就开始针砭时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叶鹏的军人，武大中文系的，写了一篇《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的文章，批判当时的等级特权。因为太激进，这个刊物很快就被查封了，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

我喜欢读书，上中学时就坚持读《参考消息》，高中时读了《马克思传》，先读了五章，一点也记不得，更弄不懂，只是怀着对革命导师的无限崇拜，坚持从头又读，做读书笔记，花了整整半年才啃下来，可以说《马克思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高中时我订阅过很多刊物，像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科学院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不完全是考古方面的知识，也研究人类起源，什么东非大裂谷，发现大概三百万年前的肯尼亚人头盖骨，等等。我兴趣广泛，喜欢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学术思想在刚刚恢复的大学非常活跃，武汉大学也是，搞百科知识竞赛，我入学不到两年参加竞赛就获奖了。低年级学生能够获奖是凤毛麟角的事，于是就出了名。到高年级，我参加学校搞的演讲比赛，讲《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获得二等奖。学校活跃的大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搞了一个学习小组，起名叫“蟾蜍社”。蟾蜍是月宫里的癞蛤蟆，有一种美好的向往，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有这种做不到的事一定要去做的勇气，所以我叫它“蟾蜍社”……

想成为一名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情怀在支撑着我。我们平常讲一个人很像知识分子，很儒雅，就是指有一种人文素养、一种人文情怀在他的骨子



里，所以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有人文情怀的。博物馆对培养年轻学生的人文情怀很重要，我到国外的大学参观访问，非常注意这些大学的博物馆，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的广场上整套罗丹的雕塑都是别人捐的，亚洲部里面放着中国的字画、瓷器，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也有自己的博物馆。美术和音乐是可以启迪人们灵魂的，中国的大学同样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每一所著名大学都应该拥有一定的艺术品收藏，有一个好的艺术博物馆。因为我是做艺术品拍卖起家的，又做泰康空间这种艺术公益事业，泰康人寿也有很多艺术品收藏，了解博物馆的重要性，所以在思考要给学校做一些事情时，很自然就想到修建人文设施，决定向武汉大学捐一座艺术博物馆。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那里有我的老师们，母校和老师给予我很多，我对母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她之于我如同母亲一般。2013年年底，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的时候，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将会落成。这是我献给母校的一份心意。

今天，武汉大学里面还保留着一批古老的建筑，一入门的体育馆是黎元洪家族捐建的。如果说建筑承载历史，那么从体育馆可以看到武汉大学是有捐助的历史和传统的。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就像黎元洪捐的体育馆一样，造一个经典性的建筑、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丰富和提升武汉大学的魅力，成为武汉大学新的景观，同时希望能对校友们回馈母校起到示范作用。

回溯过往数十年，我做过的几件事发生的年代，这些数字间似乎存在着一些巧合：

武汉大学120周年，我捐建的万林艺术博物馆将落成。

2013年我大学毕业30年，迎来嘉德20年庆典，也是泰康空间成立10周年。

2003年在武汉，我作为杰出校友应邀在武大建校110周年校庆上讲话。

2003年在北京，我们庆祝嘉德成立10周年，泰康空间成立。

1993年武大百年，我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嘉德。

1983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



不知是否为冥冥之中的安排，或者是数字的巧合暗示了某种历史机缘。

我是湖北人，是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经济系非常有传统，最早的系主任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杨端六先生，他是中国金融和会计学的开山鼻祖，中文版《马克思传》就是他女儿杨静远翻译的。当年在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界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一个就是武汉大学的张培刚先生，有“南张北陈”的说法。哈佛大学那时已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很多最好的学生出自这样的学校，张培刚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从武汉大学毕业，40 年代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写的是《农业与工业化》，此论文获 1946—1947 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足以问鼎诺贝尔奖；张先生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的老师董辅初先生就是张培刚先生的学生，董先生再传承到我们，这就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师徒传承。“92 派”的三个典型人物都是我们经济系的，田源创办了中国期货，毛振华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我创办了中国嘉德和泰康人寿。

武汉九省通衢，福建的茶叶到武汉，通过武汉水路再往上运到长江以北的地方，武汉基本上是茶商的集散地。那时的武汉跟我们现代社会一样有教育问题，现在是农民工的孩子没有上学的地方，那时候是商人的孩子在武汉学习有困难，所以张之洞向朝廷递了一个奏折，要创办学校；1893 年自强学堂创立，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建校 120 周年时，他们把当年张之洞的奏折都找到了，并从故宫档案馆里“请”了出来。

自强学堂后来又延伸到武昌高师，再与武昌中华大学等一些学校合并成为新的武昌中山大学，就是后来的武大。真正叫武汉大学是从国民党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开始的，大概是 20 世纪 30 年代，民国政府决定建武汉大学，派李四光去考察。那时武汉大学占地有九千多亩，如今的武大四校合并后也只有五千多亩，比以前小了很多。

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是与胡适等人齐名的大学



者，集学政于一体。后来他做了民国时期的外交部长，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武汉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五大名校之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地位很高，经费充足，薪酬好，有很多名教授授课，比如台湾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在武汉大学当过一年的物理系教授；气象学家竺可桢也在武汉大学当过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还有闻一多、朱光潜等很多知名教授。最早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的“珞珈”二字不是“王”旁的“珞珈”，而是姓罗的罗，叫罗家山，闻一多做文学院院长时把它改成“珞珈山”了。在武汉大学的传统中，还出现过很多政治人物，像陈潭秋是当年武昌高师的，参加遵义会议的俄语翻译伍修权是高师附中的，董必武早期的革命活动也是在武大开展的。据说党的一大代表里有五个人与武汉大学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哲学家李达也是其中之一。

武汉大学在历史上很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非常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学教育学习苏联的体系进行院系调整，李达成为第一任校长，从此武汉大学改以文科为主，其他学院组成华中工学院，就是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跟武大齐名，以前的农学院成为现在的华中农业大学。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从沿海发展起来，东南沿海整体发展也相对发达，在大学的评比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好，浙江大学崛起了，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不用说，武汉大学在综合大学“十大名校”排名中一直徘徊在第七、第八的样子。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 1522、1523 期；原文选自《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

作者系经济系 1979 级校友



在珞珈山偶遇名师

珈言

在我年过半百的岁月中，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每天傍晚下班后心无挂碍地晃悠在珞珈山的环形道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和呼吸声萦绕在周围。这时的我，可以全身心地感受珞珈山的丰富和静谧；可以停下脚步长时间地眺望灰中带粉的天空，无所顾忌地与透过高大林木挤进视线的夕阳对视交流；可以把头昂到天上，也可以闭着眼睛勇往直前；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默默地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与另一个自己交流……自由自在、轻松闲适，在紧张工作了一天之后，尽情享受着人世间的最美时光。

当然，也可以边走边想、漫无边际地想，特别是在经过那一片让人无限遐思和景仰的十八栋——曾经教授中的教授的住宅，望着那一栋栋历经沧桑、内涵丰富，现已修葺一新的别墅群时，总会驻足观望，默默地感受着大师们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气息；也总会回想起在珞珈山偶遇过的大师们的点点滴滴……

曾经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名字光辉闪耀的大师们，以学术上的创新创造、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不懈精神，让这座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底蕴。

这时的我总会由衷地庆幸：为了这座山放弃一座城，真的是人间值得！

与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弘远先生的偶遇

杨弘远先生和夫人周嫦都是珞珈山上有名的教授，因夫人中风



多年卧病在床，孩子又远在国外，照顾夫人、出门买菜等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都由先生亲力亲为。杨先生曾经非常遗憾地说，夫人自生病后，每天最多只能在家门口站站，外面的风景都与她无缘了。

在珞珈山上见得最多的是先生穿着家常对襟粗棉布中式衣服，手挎菜篮子走在路上的样子，平实得如温厚的邻家大叔，举手投足间却尽显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智慧，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好诠释吧。

每次偶遇先生之后，回到家必定和儿子唠叨“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相关话题，和儿子探讨多读书、读好书的好处和妙处；告诉儿子什么叫“大家风范”。多读书能让人形成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底蕴和气质，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做事低调且内涵丰富的人。

杨先生经常会独自一人在珞珈山半山腰散步，我经常在那跑步，遇见多了也就成了熟人。在他不赶时间时，我们会随意地聊聊天，聊聊他著作的出版近况和市场发行情况。

有一次，当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为什么他的某些著述要舍近求远地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很认真地解释，因为很认可浙大出版社负责他书稿的编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他说那位编辑是博士毕业，且所学专业与他的研究相关，对他的著述及学术思想很了解，他们能很好地交流和沟通，合作得很愉快。

尽管知道他的选择很有道理，可我却还是出于本能的“敬业精神”，在那不自量力地游说着，告诉他武大出版社有很好的宣传推广渠道，有很敬业的、毕业于武大生物系的专业编辑，我们离得近，沟通起来更加方便；并且武大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出版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知名度和影响力，他的著作如果在这里出版的话，会在高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得到很好的收藏，会及时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会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和社会效益；学者的研究成果能让最懂的人知晓、研习，才是学术著作出版后的最好归宿……

有时我们也会聊聊他的母亲，我告诉他自已刚上大学时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本上见过他母亲的名字，拜读过他母亲的相关作品，很是敬佩；也会聊到他姐姐杨静远及其所著《让庐日记》；再就是聊聊武大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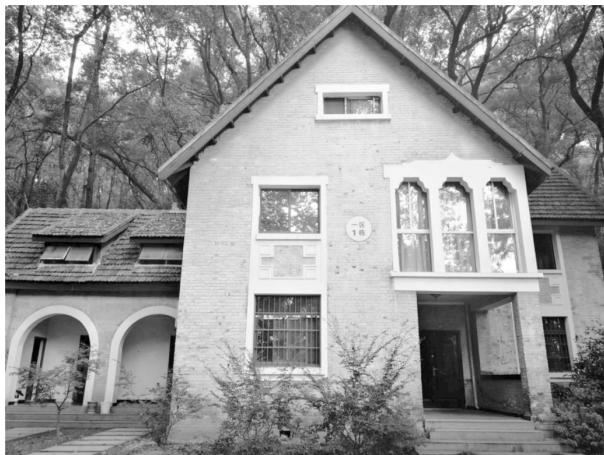
杨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地、安静地听着我的“胡说八道”。对于出版著述一事，他则说以后会认真考虑的。

之后，杨先生在武大出版社出版了自己重要的学术著作《植物有性生殖四十年》，并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我当然知道这与我的“游说”无关。

杨弘远先生出身名门，父亲杨端六是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著名教授；母亲袁昌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女作家，是“珞珈三女杰”之一（另两位是苏雪林、凌叔华）。

杨端六（1885—1966），1913年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任迁校委员长。

袁昌英（1894—1973），作家、教育家。曾两度出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是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出版过《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等著作。



武汉大学教授中的教授居住的珞珈山别墅群中的第一栋，杨端六、袁昌英伉俪曾经居住



杨静远，著名翻译家。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硕士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

杨弘远(1933.9.26—2010.11.18)，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武汉大学教授。195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



拜访著名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

2006年7月的某天，因刘纲纪先生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相关美学著作五种(《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周易〉美学》《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这是先生重要著作在武大出版社比较集中的出版，社里决定做一期专访进行宣传推广，就约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拜访先生，在他家聊了三个小时，有幸与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先生抽烟极为频繁，基本上是一根接着一根。采访完正题后闲聊了不少话题，聊到了美学界的许多人和事。

先生与我们聊了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经历，与李泽厚先生的



交往和友谊；谈到他与李泽厚先生一起主编《中国美学史》的经历，还拿出他年轻时和李先生的合影给我们欣赏；又聊到他的实践美学思想，再聊到当今的际遇……句句真诚实在，先生是性情中人。

先生说，自己本来1998年65岁时就退休了，之后评上了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待遇相当于院士），又重新开始工作，又开始带博士、硕士研究生。“本来不想再干什么指定性的工作，退休后潜心书画算了，现在教育部又拨了20万元后期支助款，让我们搞多卷本的《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我只能又开始准备工作了；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但任务也是挺重的……”先生很坦诚地叙说着，并不把初次见面的我们当外人和陌生人。先生的话语随着烟圈在挂满了书法和绘画作品的不算大的客厅里萦绕，朴实真诚。

在我的认知中，先生不是应该对这难得的相当于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针对我国没有文科院士设置的，是给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的崇高荣誉的）的头衔和待遇感到荣光和骄傲吗？

我知道先生除了美学研究之外，在绘画和书法上都造诣颇深，也许绘画和书法才是他退休以后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吧，随着荣誉而来的，是不得不重返既往工作轨道的辛苦和责任。不能专心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情，这也许是先生最为遗憾的地方。

告别先生后，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武大校园的一件与先生相关的趣事。原来，20多年前先生的名字在珞珈山就已如雷贯耳。

1985年6月的某天，一张小字报贴在了去往桂园食堂路上十字路口拐角处的“民主墙”（那时的任何消息都在此发布，从讲座、通告、喜报到电影消息等）上，好像内容格外吸引人，拿碗的、拿水瓶的，正端着碗吃着饭的，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对小字报的内容莫名其妙，有的则是会心一笑。

小字报上说的是前一天晚上在教三楼001教室的讲座：“昨晚两个牛皮达子为了达到自己出人头地、欺世盗名的目的，冒用教授刘纲纪的名字兴办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美的欣赏’讲座，其实是瞎



吹牛，浪费同学们的光阴，我们强烈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群受害者。”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大家以谈美为时尚、为高逼格的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首版）出版后，在新华书店可是要起早床排长队才能买得到的，赶时髦的我们几乎人手一册。所以广告打出的美学教授刘纲纪的讲座，让我们一个个心潮澎湃、趋之若鹜地去抢占座位了。

讲座七点开始，我五点半就到了。不到六点，能坐几百人的001教室已是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好多人自带小板凳坐在教室的各个能放下凳子的地方——走廊、角落，有的甚至自觉地趴到了窗户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祈盼着美学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精神上的盛宴。

可在我们翘首以盼几个小时之后，教授却迟迟未到，只有那几个不请自来的人在讲台上执着地贩卖着自己的“货色”。

——这就是小字报的由来。据说当时并没有联系到先生。

刘纲纪（1933年1月—2019年12月1日），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应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教授邀请到武大工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家、美学家。

光阴似箭！

文中的先生们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气质、道德文章、风貌神韵却永远留在这座校园里，永远留在怀念他们的人们心中，永远与珞珈山同在；他们的精气神已化作珞珈山的一草一木，永远陪伴着后学后进。

作者系中文系1983级校友



曾经在武汉大学工作学习过的黄冈名流们

李云贵 何 飞

武汉大学是一所蜚声中外的—流学府，具有 120 多年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1946 年，武汉大学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 6 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正如首任校长王世杰所言：“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所有崇高理想、—流水准的大学。”很快发展成为“民国四大名校”之—，在全国乃至全球享有崇高声誉。胡适先生曾对—位当时在北平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便知道了。”武汉大学创办 120 多年以来，大师云集，群星灿烂。黄冈的先贤、名流们在武汉大学不同阶段也留下了大量足迹，为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9 年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1920 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大。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第—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6 年 11 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



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和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筹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董必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1934年10月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和华北局书记。建国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董必武的这些诗句，道出了武大独特的美。（来源：共产党员网）

二、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4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以武昌高师附小为据点，建立了武大百年文化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武昌支部”，这也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1921年7月，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先后出席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杀害，壮烈牺牲于天山脚下。（来源：共产党员网）



三、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本名闻家骅，字友三。著名诗人、文学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5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年7月，应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之邀，回到家乡参与武大的创建工作；9月，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将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一直沿用至今。1930年秋，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秋，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四、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原名继智、升恒，字子贞，早年更名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学思潮的奠基人。1906年，参与日知会、同盟会的活动。辛亥革命时参与黄冈光复活动，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1919年至1920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1922年经梁漱溟推介，蔡元培始聘熊十力为北京大学讲师，讲授佛教唯识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后，1925年春，熊十力应石瑛校长之邀，到该校任教。是年秋，武大校长易人，熊十力返北大任教。抗战期间，熊十力在后方重庆一带从事研究著述活动，1939年曾到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讲学，代表著作《新唯识论》《读经示要》等相继出版。1956年以特邀人士身份参加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会议，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由教



育部评定为一级教授。熊十力生前出版的著作单行本有 20 余种，以《新唯识论》《读经示要》《原儒》《体用论》和《明心篇》等最为代表。

五、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字仲拱，原名李仲揆。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是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 年当选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李四光 1910 年 7 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 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 年以后，李四光长期担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同年 8 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 11 月，该委员会决议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珞珈山一带为新校舍地址；1929 年 10 月，新校舍落成，他与蔡元培等参加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及开学典礼。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 年 5 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 年 4 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 年 9 月任地质部部长；1955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 年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 年 4 月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 年 8 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六、黄侃

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字季刚，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章黄学派”创始人。1914 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20 世纪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陆宗达、殷孟伦、刘赅和黄焯等。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



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黄侃治学勤奋，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黄侃著作甚丰，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和《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七、刘赧

刘赧(1891—1978)，湖北武穴人，字博平。著名古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家。武汉大学中文系“五老八中”之一。1914—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1929年经黄侃推荐转武汉大学中文系执教，自此在武汉大学工作凡五十年。讲授文字、声韵、训诂、毛诗、周易研究等课程。1956年由教育部评定为一级教授。196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他的著作《说文古韵谱》，其中所附《中国语言文字音系略例》，系统阐述了他对汉语言文字的音义关系的独到见解。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的遗著《初文述谊》《小学札记》合为《刘赧小学著作二种》影印出版。

八、张培刚

张培刚(1913—2011)，湖北红安人。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博士毕业的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哈佛三剑客”。1946年任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初回国继续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武汉大学校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年底调任华中工学院工作。曾



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是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著有《农业与工业化》《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和《新发展经济学》等，其中《农业与工业化》被授予“大卫·威尔士奖”（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99年，被评选为第二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九、冯天瑜

冯天瑜，1942年3月出生，湖北红安人。著名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和《中华元典精神》诸书。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任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和《“封建”考论》等。其论著曾获中国图书



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和汤用彤学术奖。

十、於可训

於可训，1947年3月出生，湖北黄梅人。著名文艺评论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春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务处副处长、中文系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曾兼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通俗文学评论》执行副主编，《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丛刊执行主编，《写作》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出版《於可训文集》10卷，400余万字。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江汉论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百余篇，文学创作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数十万字。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十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十余种。曾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合作导师”“武汉大学教学名师”“武汉大学学生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十一、熊召政

熊召政，1953年12月出生，湖北英山人。1985年，著名教育家、时任校长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全国首创插班生制度，熊召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历史札记、诗集40余部。其中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1979—1980年全国首



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2002年问世后，被誉为中国新时期长篇小说的里程碑。该书于2005年以全票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近年来，其作品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历时14年精心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已于2019年夏天完稿，同年十月出版后，立即在京东、当当等多家网站占据畅销书榜首。其演讲录已结集出版《历史的乡愁》《文人的情怀》及《汉语的世界》三册。曾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文联主席、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客座教授。2007年，评选为第五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李云贵系中文系1987届校友；何飞系政治经济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再遇名师

齐邦媛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钟灵自古闻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苏东坡、乐山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1941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未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分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都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工作，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由于是同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位的启发。

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以朱老师的水准，原也安排了很好的阵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史”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 1943 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琬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应该可以胜任。她上课不久，即把重点放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中古世纪英文上。

她是位很壮的女子，用浑厚的嗓音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念了大约两星期，把我们震慑住了——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鸭子听雷”。好不容易到了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和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乌托邦》，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飘过斯宾塞“Poet of Poets”就放寒假了。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浮士德》，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弥尔顿的《失乐园》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即到了德莱顿。不到三堂课，突然老师请了病假，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然后大家都“复员”回下江去了——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学毕业时，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 1700 年，对德莱顿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是我多年的憾恨。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十五世纪以前，十六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台湾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大二、大三必修），用一切安排，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



另外两门课比较稳定，小说课的戴骝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他也是《时与潮文艺》的定期作家，言语不太流利，但课程内容充实，分析层次颇高。他讲到狄更斯的《双城记》时，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仍令我不寒而栗。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写法（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小说的老师，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

在现代文学课上首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在那几年，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专长是俄国文学，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作为现代的代表。

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缪先生身体壮硕，声音洪亮，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上课时如上舞台，走过来跑过去，从不踱步，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一男同学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铁盘”。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此书是一本极精彩的写懒人之书，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因为太懒，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在他之前和之后，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

（稿件来源：选自齐邦媛著《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原载《武汉大学报》第1487期）

作者系外文系1947届校友



我的恩师桂希恩

杨蓉蓉

有人借用“上善若水”来形容他默默奉献、与世无争的品德；有老乡集体为他立好了石碑；中央电视台这样评价他：“一个教授努力了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他，就是我的恩师桂希恩教授。

我刚读研究生时，桂老师从家里提来了一株奄奄一息的铁树，将它种在培训中心门口的花坛里。秋去冬来，这株铁树活过来了，而且长得枝繁叶茂，远远超过了周围的花草。转眼间，我已博士毕业，留在母校工作，有幸继续向桂老师学习专业知识和为医为师的学问。七八年的相处时间里，2500多个日日夜夜，桂老师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辆车身是紫色、座板却是黑色的自行车是他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上班时看到这辆自行车，就知道桂老师早来了；下班时车还在，就知道桂老师还未走。车在，人就在。周末和节假日，我们总能看到那辆再熟悉不过的自行车立在培训中心门口。如果你有事找桂老师，站在窗前轻声叫一下或打2880，就能看到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别人休息时，他却在整理讲稿、分析数据、查阅文献、修改研究生的文章，有时还给患者看病，接听咨询电话。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周末还看到桂教授骑着自行车往上班的方向去？”我无语，因为桂老师是一个从不给自己放假的人。不算每天多工作的时间，桂老师每年仅节假日的工作时间就比别人多4个月。

在他办公桌上放着一头铜牛，低着头，四脚蹬直，奋力向前。



桂老师属牛，他一直用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精神激励自己。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写给自己的打油诗——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常记得桂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什么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好。”任何事情，哪怕是给别人回复一封电子邮件，只要署名为“桂希恩”他都会认真检查两三遍。至于更长一些的总结、论文等，在定稿之前，修改从来未低于五次。桂老师亲自执笔完成的手稿，在数次修改后，他会暂时放置一段时间，等有了新的思路或想法，会再次补充完善。在桂老师眼里，从来没有完美的论文，只是在一遍一遍的修改过程中，与目标靠得更近了一些。这让我想到了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曾经有一篇专业论文，桂老师不停地帮我修改了整整七个月。后来，我将这篇文章成型前修改过的手稿放置在一起，才发现修改过几十遍的手稿的高度居然和第六版的《传染病学》一般高了。

最终，这篇文章被 SCI 杂志收录了。我感叹：“其实，文章不是我们写出来的，而是桂老师一个字一个标点改出来的。”桂老师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写出来的东西要确实对别人有所启发。”

桂老师关心、帮助艾滋病人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将奖励给自己的几十万元奖金放在公家的账本里，用这些钱来帮助困难的艾滋病家庭，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这样可随时给他人以帮助。我好几次看到他给患者路费，三百五百，几张“毛爷爷”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给出去了。

他对自己却永远是精打细算的。平时，桂老师身上是没有手机的。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连小学生、种地的人都随身携带手机，一个如此知名的教授却不用手机似乎太不可思议了，但事实就是这样。有人会问：“他从来都不用手机吗？”不是，他出差在车上需要和别人联系工作的时候会用，用完之后就关机。下车后，他会背着行李到处找公用电话。有次他从新疆回来后感叹：“手机和公用电话差别太大了！我打了三个公用电话才花了一块钱！”

出差在外免不了要住宿，桂老师也有自己的一套省钱办法。比



如到北京开会，他会优先选择坐晚上的火车，在车上睡一晚后正好直接进会场；开完会后再坐相同班次的火车，在车上睡一晚后正好直接到科室上班。这样算下来，两晚的住宿费就都省下来了，还能节省时间。实在免不了需要住宿时，桂老师总选择最便宜的小旅店，有时这些旅店简陋到房间连门栓都没有。有一次，桂老师早早地赶到乌鲁木齐火车站接我们两个学生，他双眼布满血丝，声音也沙哑着。后来才知道，他只花 40 元在一家小旅店住了一夜，住的房间没有门栓，总有人断断续续地来推门，所以没有休息好。

我们常常在想：桂老师啊桂老师，您在将一张张“毛爷爷”无偿送给他人时，哪怕只少给一张，也能让自己少受很多罪啊！

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好多好多。

这就是学生眼中那个让艾滋病人念念不忘的“好医生”的“琐事”。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 1538 期）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沐浴在自由的芬芳里歌唱

——创作《珞珈赋》的回忆兼答刘道玉老校长

何五元

题记：2019年11月底，突然收到刘道玉老校长的微信，想向我了解“创作《珞珈赋》的灵感是什么，写作时间，修改经过，校内外评价还有目前工作情况”；并说：“我认为，它将是武汉大学的千古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能把它写入80年代的成就之一。”

读到老校长的信息，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思，因为一气呵成《珞珈赋》34年来，从来没有想过创作的灵感，更没有想到老校长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这么多年来，随着大家对《珞珈赋》的关注加深，我更是羞于喋喋不休述说关于它的陈年旧事。没想到，不久老校长又来催交作业了。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文字，不到之处，还望老校长海涵。

创作和修改《珞珈赋》经过

珞珈山是一座神奇的山，也是武汉大学的代称。坐落在武昌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以其山水相映的自然环境和沧桑典雅的民国建筑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如今已然成为人气最旺的旅游景点之一。

狭义的珞珈山，位于武汉大学校园内，海拔118.5米，为东湖南岸临湖高峰之一，山顶可远眺东湖远景和武汉景色。武大校园依珞珈山临东湖而建，在世界名校中，很少有这样依山揽湖、独拥湖



光山色的大学校园。而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更是一段传奇。1928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聘任李四光、叶雅各等名士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他们提出并最终实现了将东湖边的好几座山，包括珞珈山、狮子山、侧船山，包括东湖很大一部分（看得见周边山峰倒影的湖面）都囊括在武汉大学校园之内。珞珈山原名落驾山，1928年，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改为珞珈山。

广义的珞珈山，和珞珈一样，是武汉大学的代名词。用一位校友的话来说，“珞珈山是象征武大的品牌，她不仅是一座山，还蕴含着武大的价值内核，是武大学子赖以依归的精神家园。每一位武大人，无论登得有多高，珞珈山始终在脚下，淡泊，宁静；无论行得有多远，珞珈精神始终在指路，明志，致远。”

“伴随着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东湖逐渐被纳入到武汉市区范围之内，武汉因此也被渲染上了‘山水城市’的色彩。武昌东湖从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泽演化为一个风景游憩地的最开始，武汉大学（就）扮演了极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是东湖风景区建设的主要拓荒者之一。”“武大所采用的这种以绿色琉璃瓦为最醒目特色的近代建筑风格，与东湖风景区的碧水青山和谐统一。它不仅影响了武汉大学，也奠定了日后整个东湖的建筑风格基调。”“今天的很多武汉高等院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和历史上的武汉大学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相当于‘母体’，分化并产生了很多分支，它们共同奠定了武汉作为‘大学之城’的气质。武汉大学创办以前，武汉在全国的教育版图上是非常弱勢的。武汉得以成为‘大学之城’，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奠定的。”（参见刘文祥《珞珈筑记》及相关访谈、评论）

之所以啰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在这座神奇的山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最经典的段子，莫过于一位师妹形容的：有个奇葩师兄，大学时写个作业，被武大刻在了石碑上。这篇作业正是其大学一年级时挥笔写就的随堂作业《珞珈赋》，如今被铭刻在武大正门口，被众多学子争相传诵。后来师兄被邀请谈这篇文章的创作历程，发了一句“永是珞珈一少年”的感慨，又被抢走作了武大名言，成为毕业典礼的主题。



1985年3月，我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年级下学期，在鲲鹏广场旁的教二楼上沈祥源老师的“古代汉语”课。沈老师布置随堂作业，要写一篇古文体的文章，内容和体裁自选。课后回到宿舍，我不假思索就以武大为主题，一气呵成写了篇《登珞珈山赋》。文章整体较好，于是作为范例，被沈老师全文抄录在他的备课本里，并在下堂课当堂诵读评讲。过后不久（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我改名为《珞珈赋》发表在《武汉大学报》上，不多时《珞珈赋》也在校内慢慢流传开，各种校园活动纷纷使用。那一年，我18岁。

2013年5月，武汉大学为迎接120周年校庆，时任校长李晓红很重视这一活动，他拍板建成了校门广场，《珞珈赋》刻碑的梦想也是他提出来的（当然一开始还没确定刻哪一篇），为此特别举办《珞珈赋》全球征文活动，征集珞珈赋代表作。我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征文活动。其间，我应时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副校长谢红星和学校的要求修订了1985版《珞珈赋》，略有增删，得到《武汉大学报》总编杨欣欣（我的同班同学）等“一字师”的大力帮助，增加了以下两段文字，以更有历史时代特点和文化韵味——

仁者乐山兮智者乐水，山高水长兮流风甚美！学堂名自
强，多难图兴邦。筚路蓝缕，朴诚有勇，育复兴之国士；颠沛
流离，玉汝于成，培干城之栋梁。风霜雨雪途，弦歌不辍；困
苦忧患时，奋发图强。壮哉！学大汉，武立国，铁肩担道义；
自强魂，弘毅气，豪情兮一何滔滔！

珞珈苍苍，东湖汤汤。山川壮美，泱泱兮养天地之气；澄
岚秀润，昂昂兮结青云之志。从来大师云集，兼容并包，岂分
东西南北；始终树木树人，英才辈出，皆为珞珈荣光。

同年10月，武汉大学官方评选后正式确定《珞珈赋》（2013版）
为武汉大学珞珈赋代表作，当年铭刻于武汉大学校门口的石碑。
2013年10月15日，武汉大学官方公告——

日前，经专家评审、学校研究决定，确定了《珞珈赋》代表作，
将在校庆相关活动和校园文化工程中予以使用，学校正面向广大校



友和师生征求意见和建议。今年5月起，学校举办了《珞珈赋》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校友和社会人士的热烈响应，共收到征文近50篇。武汉大学新闻网已陆续登出并将继续刊登其中的优秀作品。学校确定的代表作，系武汉大学中文系1988届校友何五元1985年在校期间创作，多年来在学校各类文化活动中广为使用，2013年又由作者进行了修改。

一周后，武汉大学正式公告确定《珞珈赋》代表作。也许是武大自由平等的传统使然吧，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把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习作，立碑镌刻于校门。晓红校长（学生们时称“晓红哥”）在任的时候，每年开学还会带着新生逛校园上开学第一课，也要专程读一读《珞珈赋》。

创作《珞珈赋》的前前后后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年高考之难、录取率之低难以想象，记得高考之前还要预考，要筛掉很大一部分应届生后才能赢得高考资格。我是以6门总分542、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号是8407001。第一次从繁重的中学课业里走出来（黄冈地区的中学），第一次从遥远的湖北罗田蕙兰山山脚下来到繁华大都市，第一次独自一人坐漫长的长途汽车报到，第一次踏入美如仙境在大学，第一次说普通话，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自由的，一切都是奇妙的！虽然我还只是一个面对女同学说话会脸红的腼腆的乡下小子。

自由和包容，从来都是武大的代名词。特别是在老校长主政的1980年代，这座享誉世界的最美校园给了同学们最无拘无束的成长空间。那时候珞珈山还有很多原始森林，我感觉自己就像原始森林里刚刚冒芽的树苗一样，向着阳光肆无忌惮地生长，没有人修剪和干扰，外围大树们挡住了暴风疾雨，挡住了寒流霜冻，天天风和日丽，茁壮成长。

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每个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日子（那时候乘老校长教改的东风，有课也可以不上，只要你学好了考过了就



行)，我都会带着书、带着面包和水徒步珞珈山，钻进原始森林里，用脚丈量走遍了珞珈山山山水水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候，珞珈山顶还竖有一座十几米的铁塔，应该是做防火瞭望之用。每次上到珞珈山顶，都要爬上塔尖这一几十平方公里的制高点，眺望四野（《珞珈赋》1985版原有句“山有铁塔，岿然耸立”，后来铁塔被拆了，2013版也就删掉了此句）。风声呼啸，塔身摇晃，但是远山含碧、近树扶苏的感觉十分爽利。那时候，学校和武昌城里都还没什么高楼，视野辽阔，一望无际，天清气朗时，远处的长江依稀可见。东湖碧波荡漾，像一面硕大的镜子，映照着珞珈山，时而有快艇飞过，把水面犁开，分外写意。雾霭蒙蒙时，云水笼烟，更有神女舞轻绸之感。站在珞珈山上，琉璃色的老图书馆、行政楼和樱园闪耀着光芒；寂静的山林，变幻的湖光，香气弥漫的植物，歌声欢畅的小鸟。没有比这更美的大学校园了，珞珈山东湖水涤荡着心灵，身在此山中，给人一片难得的遗世独立的宁静。正是，珞珈山上好读书，芬芳馥郁今最美校园，今夕何夕今最美时光！

记得一位教授说过，大学精神的本质，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34年前，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之灿烂，思想之自由，思潮之活跃，蔚为大观。正值花样年华，我追随着兄长的脚步来到了珞珈山。那时的刘道玉校长，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领风气之先，开启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这种思想自由的武大文化熏陶，赋予了同学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去追寻人生的意义。恰同学少年，发自肺腑地把阅读、探索、思考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痴迷于追求知识，获得知识的启蒙，并从此改变命运。

这种“空气里都弥漫着自由芳香”的武大文化，于我而言，如鱼得水，陶醉其中。对文字情有独钟，沉醉于书香中，肆意地做着书生梦，憧憬着以笔为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正是这样把灵魂交给了文字，交托给了我所挚爱的母校。

那时候，作为《武汉大学报》的学生记者，每天穿梭在樱花树下，低着头构思着采访提纲，一抬头就是云一样的花朵；在梅操一角的校报编辑部，肆意吮吸文墨的芳香，不禁四时变化，树影婆



娑；走近博学鸿儒，每一次的采访都能钩沉出老武大的气息，擦出思想的火花……那时的学生记者，豪情滔滔，一马当先，可谓校园里最活跃的群体。也曾走进校长办公室，与刘道玉校长面对面“交锋”；穿梭于名师大家中间，与他们进行思想的自由碰撞。

那一腔沸腾的热血，在文字激扬下热情澎湃。这样的豪情在20世纪80年代每一个大学生身上都是那么明显。以梦为马，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崇尚着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又时时刻刻被崇高的国家使命感所激励。这也许就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独有的历史烙印。

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下，我写下随堂作业《珞珈赋》。《珞珈赋》是一个符号，是我关于那个时候对母校的情感与记忆。看那时的文笔，意气风发，珞珈，就仿佛是我的神女，她的婀娜，她的神采，都在字里行间。《珞珈赋》，一篇课堂随笔，也是情感的一次自然流露，畅快而淋漓。于我，并没有想到会历经年而鲜活，影响此后一届届武大学子。

踏遍了珞珈的山山水水，熟悉她的一草一木。珞珈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树，四时变化，人文气象，最要紧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自由向上气息……无时无刻不激荡着我的心魄，让我感到有一股诗意的冲动要喷薄而出。这就是《珞珈赋》。《珞珈赋》根植于珞珈山，这里的一草一木会永远浸染着我的文字，我的生命。

创作《珞珈赋》的灵感来自珞珈山，激发这一灵感的大环境是刘道玉老校长创造的自由芬芳。《珞珈赋》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的一个音符，而老校长却是时代最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我，则是那个无知无畏的少年，在喧嚣的人群中，在世界面前，不由自主地大声歌唱。不是天籁，而是发自肺腑的自然吟唱。

《珞珈赋》写了什么

《珞珈赋》洋溢的是那个年代最由衷的自由的喜悦。

30多年前的武大青葱岁月，武大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学风，让曾经的珞珈少年拥有一段快乐、开心、自由的回忆，这种回忆渐



渐沉淀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基因。正如唐代诗人孟郊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形容他的情不自禁一样，《珞珈赋》写的是涤荡心灵，归于空性后的由衷喜悦。很多朋友告诉我，《珞珈赋》越读越觉得精妙，每一次读的感觉都不一样。无他，以我手写我心，以真情灌注，以自然流露的自由喜悦贯穿其中，其乐也陶陶，其情也欣欣！

《论语》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多么惬意喜悦！我愿意是那一起“咏而归”的一员。

作为中国最美大学，其美不仅在于四时山水，也在于人文风物。以珞珈起赋，抒写武大的美，美在风光，美在精神，美在气质，美在自由。珞珈山每一处景致背后，都是一幅幅令人追忆的时光剪影。与好友坐对珞珈山饮风弄影，陶醉于梅操的光影世界沁透心脾，遨游在樱顶老图指点江山，偷恋着执伞行于樱花雨中的婀娜少女……

“桃李满园，皆时代之骄子；学子盈室，俱一世之英华。淑女窈窕，书山跋涉；少年英俊，学海遨游。其意气一何绰绰兮，彼神彩一何风流！”——这就是那个年代武大的写照，也是那个年代武大学子的缩影。而能够徜徉于天地，广胸中之丘壑，做心灵的自由人。这也许就是母校对于我毕生的意义。

《珞珈赋》可以当白话文来读，也可以当古诗来吟唱。我希望以创新的古赋体写现代人文风物，以白话和白描抒情怀胸臆；以汉语文言的美感，以辞赋的对仗工整，又摒弃古赋的拗涩，取其优去其涩，用其工弃其滞；少用典甚至不用典，弃佶屈聱牙繁文琐节，去晦涩难懂典故华章，以白话通俗之言写胸中之感，写景状物，尽得风流。形式是古赋，但内容是现代诗。这是我推崇的新赋体。返璞归真，真情实感，行云流水，畅快淋漓。

一位读者评价：“《珞珈赋》其实就是一部武大人文风物的缩影——东湖水，珞珈山，湖光山色，东湖涛声；春桃秋桂，夏榴冬梅，樱花赛雪，梅朵胜缎；自强魂，弘毅气，学大汉，武立国；大师云集，树木树人，珞珈荣光等等，武大的人文气息，四季变幻，



山水草木，尽在此赋间。在《珞珈赋》的字里行间，不仅能读到武大的风物人文，也可窥得半个武昌城的景致：天际横江、龟蛇一体、浩渺东湖、长堤戏波、屈子行吟、东湖水、珞珈山、磨山影……”

很多年之后，我写了一篇《永是珞珈一少年》的同题随笔和歌词，歌词这样写道——

有一座山
没有谁比它更高
有一湖水
没有谁比它更宽
有一弯怀抱
回到她
永远都是 17 岁的少年

珞珈山
东湖水
梦绕山之麓
魂牵水之澜
踏遍千山万水
走不出那琉璃色的思念

那里的天
写满青春自由梦幻
那里的地
永远流淌火热诗篇
多少年岁月荏苒
依旧是珞珈翩翩一少年

这一直都是我对珞珈山最真实的赤子情怀！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依然会选择美丽的武大；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依然会做那



珞珈山头的翩翩少年。



附录：

珞珈赋

珞珈有山，雄峙东湖之南，遥踞大江之阴。东临碧水，磨山依稀弄影；西起洪岳，宝塔巍然可登；南极通衢，达中南之枢纽；北揽湖光，仰屈子之行吟。登斯山也，无车马之喧，有奇瑰之景；涛声约若，清风可饮。醉山色，叹古今，其乐也陶陶，其情也欣欣——已焉哉！陶令倘在，敢无厚美之情？

凭阑极目，远山含碧，近树扶疏。天际横江，轻纱一带；地尽屹楼，奇绮几何？一桥飞卧，挽龟蛇成一体；数舸直下，逐江渚几欲飞。东湖浩渺，云水笼烟；长堤戏波，一水绕碧。湖鸥点点，喧



声响遏行云；游子搏浪，意气浩振九霄。善哉！斯水有乐如此耳！

树耸山间，草肥谷底。林荫蔽日，郁郁葱葱；花繁满树，姹姹灼灼。千虫鸣唱，百鸟吟歌，山富芳草之鲜美，地耀落英之缤纷。春桃秋桂，夏榴冬梅——赏奇花一树，感彻肺腑；嗅清香几脉，沁透心脾。樱花赛雪，始发仲春之际；梅朵胜缎，笑傲岁寒之末。亭台楼阁，绿荫掩映；箫簧琴瑟，歌舞悠扬。芬芳馥郁兮最美校园，今夕何夕兮最美时光！

仁者乐山兮智者乐水，山高水长兮流风甚美！学堂名自强，多难图兴邦。筚路蓝缕，朴诚有勇，育复兴之国土；颠沛流离，玉汝于成，培干城之栋梁。风霜雨雪途，弦歌不辍；困苦忧患时，奋发图强。壮哉！学大汉，武立国，铁肩担道义；自强魂，弘毅气，豪情兮一何滔滔！

珞珈苍苍，东湖汤汤。山川壮美，泱泱兮养天地之气；澄岚秀润，昂昂兮结青云之志。从来大师云集，兼容并包，岂分东西南北；始终树木树人，英才辈出，皆为珞珈荣光。桃李满园，皆时代之骄子；学子盈室，俱一世之英华。淑女窈窕，书山跋涉；少年英俊，学海遨游。其意气一何绰绰兮，彼神彩一何风流！——异兮！斯人斯地，无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哉！

呜呼！有山美如斯，有水秀如斯，更兼有人风流如斯，珞珈无仙亦名耳！居中乐乐，快不可言，欣然命笔，为赋珞珈是也！乙丑年仲春何五元识于珞珈山下桂园之中，癸巳年季秋改于羊城天河。

（特别感谢沈祥源老师、陈广胜老师、陈文新老师、谢湘师姐、肖圣中及杨欣欣同学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难忘青春记忆 永远的珞珈情怀

王世进

1956年夏天，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烈日炎炎的8月，我从广州白云火车站上车，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才到达武昌，在座位上熬了一夜，下了火车后饥肠辘辘，在附近的竹棚里吃了一碗0.15元的牛肉面，感觉比后来吃过的牛肉面都美味。武汉大学的教学方式，与中学有很大的不同，入学第一年后，我逐步适应了大课堂的教学，印象较深的是：上哲学课要从珞珈山的理学院下山，再爬上狮子山到文学院上课。第二年同学们都熟悉了，照了第一张合影，从照片上看，班上的同学们青春洋溢、活力焕发，现在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令人不禁感慨时光的流逝。

我从广州第十中学毕业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武大，第三志愿是中大，当时中大、华南理工学院（后来改名华南理工大学）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武大。初到武大，我对武大老图书馆印象特别深刻，建筑整体宏伟、庄严，里面还有古典的桌椅，坐在那儿学习真是一种享受。古朴的一排排老斋舍下面是漂亮的樱花大道，校园外是风光旖旎的东湖，可以尽情游水和泛舟，正如朱德的题词“西湖暂比东湖强，东湖将比西湖好”，在这样有山有水的美丽校园读书，同学们都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中学时想游泳，我们要去很远的荔湾区，来到武大，没想到东湖就在旁边，游泳这么方便，同学们都特别开心！当年的文化生活较少，我们最好的娱乐是去梅园小操场看电影，即使去晚了到银幕背面看，也觉得高兴。放映的外国电影比较少，记忆最深的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当时没那么多禁忌，感觉也不一样。



高中毕业上大学前的王世进

武大的学习气氛非常好，给我们上“普通物理”的是从美国归来的梁百先教授，他在美国的《物理评论》等著名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比较具有权威性，作为知名大教授，他的“普通物理”讲得井井有条、概念清晰，深受同学们欢迎。“量子力学”是王志樾教授给我们授课，他也是从美国归国的，还有从英国回来的周如松老师，她的课程是“固体物理”，记得有一次答疑，我们搞不清各种各样括号的含义，她解释得十分清楚，这个代表“晶面”，那个代表“晶向”，多重括号代表“面族”。我们非常佩服这些教授，他们放弃了西方的优越生活，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回到了条件艰苦的祖国，在教学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唯有特殊待遇就是为他们配了交通车，从狮子山到珞珈山往返接送。那时候，比较好的学习方式是同学们组成学习小组，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半导体物理有很多东西很抽象，宏观物体知道了质量、作用力和X-Y-Z坐标、速度，就可以完整地描述它的运动轨迹，但是面对微观粒子就容易糊涂，它具有波粒二象性，有很多量子数，用德布罗意波来描写，还有测不准定律，如果自己弄不懂也没关系，几个人一起讨论就有收获。“量子力学”课程我学过两遍，第一次是在武大听王志樾教授讲解，第二次是毕业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



被送到北师大进修“量子力学”，讲解的是哈工大毕业的一位老师，但理论和讲述水平远不如王志樑老师。



6143 班团支部合影

在校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那时候政治运动比较多，我们1956年进校，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0年饥荒，1961年稍微好一点，贯彻政策和平反。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政治运动，生活上也“天翻地覆”，刚入学时伙食是八菜一汤，困难时期都填不饱肚子了。虽然学期后两年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但同学们学习和科研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大家不分周六周日，都是积极努力地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技术。我们虽然年轻，但我们的理想远大，我在高中时上物理课，学到牛顿三大定律、焦耳楞次定律、法拉第定律等，我就在想：中国是泱泱大国，怎么都是外国人的定律？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比较好，野心也比较大，希望当科学家，希望能有中国人自己的定律。刚进武大，桂质廷教授迎接新生并发表讲话，他激励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来到物理系，不是培养你们做工程师，是培养你们



做工程师的老师。”整个物理系 1956 级同学听到他培养我们当科学家的讲话，都十分激动，一齐热烈鼓掌，自己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大家勤奋攻读，刻苦钻研，生活再困难也能克服。“大跃进”年代，武大有一股搞科研、技术革命的热潮，当时我跟张峰生同学一起搞硫化铅光敏电阻，无线电系的保宗梯老师搞发射，他负责把红外线发射出来，我们负责接收，一直测试到半夜三更，成功之后马上报喜。那时候像这样挑灯夜战搞科研是常有的事，我们经常两三点钟才去睡觉。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到化学系取蒸馏水，等水的那一会儿，我坐在地上就睡着了。在劳动方面，同学们也不含糊，挑砖上楼盖房子，东西湖挑土筑堤坝，大家都积极主动、任劳任怨。毕业分配同学们也都不讲条件，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大家的理念就是学习知识，报效祖国，不管是新疆、青海还是西藏，只要国家需要都无条件服从。

我被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单位，提供涉及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方面需要的有色金属材料，比如说没有“铼”发动机叶片就做不好，没有“铍”就做不成反应堆。从 1958 年开始，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就要求将 54 种稀有金属和半导体，样样都要做出来，半导体锗、硅、砷化镓也在做，当时我们的水平跟日本差不多，同事们都拼命工作，热情高涨。但是，毕竟国家财力有限，主要资金投入了“两弹一星”，没有资金投入半导体研发，随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临，相关研究工作也停顿了，半导体研究就落后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现在半导体成了我国科技界必须奋起直追的领域。

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课余生活比较贫乏，业余时间除了看电影，其他时间都是做作业或者集体讨论，当时还要活学活用《毛泽东选集》，学后大家还要互相交流心得体会，除了偶尔有舞会，就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了。学习工具方面，没有收音机、录音机、复印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所看到的有用资料都是手抄资料，我们对这些技术材料都很珍惜。当年搞“教育革命”虽然有“左”的东西，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使我们懂得尊重劳动人民，懂得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武大毕业的学生，没有所谓“知识分子臭架子”。我们到了



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伙伴合影

工作单位后，参加了北京郊区农村的“双抢”（抢种抢收），跟复员军人一样干体力活，扛麻袋、挑担子，后来还到山西农村锻炼，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有这些我都能坚持下来，这与在武大的思想锻炼和劳动锻炼是分不开的。

夜深人静时，我时时回想起母校的那些老师、教授，他们以身作则，生活简朴，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有一种非常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在实验室一丝不苟地进行实验操作，看到仪器上的灰尘，马上掏出自己的手绢擦拭，这种对科研的严谨精神，对设备的爱护爱惜，都深深感动着我们。我从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退休后，与老同事创办了昆德科技公司，因为黄昆、谢希德两位老前辈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是我们上课时的重点教材，公司取名“昆德”，就是希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精神。我现在还在昆德科技有限公司做总工程师，有幸将当年所学的半导体物理学知识用于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研发。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涯已经远去，但留下了我们最真实、最难忘的青春记忆，珞珈情怀永远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武大学子心中。

作者系物理系 1956 级校友



我记忆中的作家班

於可训

20多年前，武汉大学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创立了插班生制，我当时在教务处任副处长，得以参与其事，并负责过一些招生和培养教育方面的管理工作，积累下了一些片断的记忆，尤其是有关中文系插班生（即通称作家班）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应约简述如下，也借此机会谈谈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和感想。

一、关于作家班的理念

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是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诗人安格尔共同创建的。1966年，他们把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主持的一个“作家工作坊”，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这个写作计划于是便发展成一个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文化机构。30年多来，世界各国有1000多位作家参加过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大陆作家萧乾、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苏童，诗人毕朔望、艾青等。聂华苓的祖籍是湖北应山，出生在武汉市，家人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在汉口似乎还留有房产。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夫妇来中国访问，就回过武汉，还应邀到武大作过讲座，安格尔即席朗诵过他的诗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国诗人、老作家徐迟翻译，气氛十分热烈。关于他们创建的写作计划，在这之前我



们已有耳闻，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们这次来武大，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后来在商议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时，掌握这个信息的教师、领导大多想到了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写作计划”，这个“写作计划”无形中也就成了我们创办作家班的一个参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认为，我们的作家班就应该办成这个样子。因为中文系的插班生议定招收的是已有创作成就的青年作家，所以我把它称为作家班，作家班的名称就这样约定俗成地叫下来了。但是，由于我们招收的是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插班生，不能越出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和管理规范上的要求，也难以组织正规的课堂教学，所以无法实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那种“自由聚会”的管理方式。尽管如此，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我至今认为，这个理想仍然可以付诸实践。作家班后来在培养教育上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我认为正是未能很好地借鉴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写作计划”的结果。

二、关于作家班的构成

武汉大学中文系(今为文学院)作家班，首届与后来两届乃至延续至今的插班生，其生员构成有很大的差别。首届作家班招生之时，正值“文革”结束后的文学复兴之际，各体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新进作家层出不穷，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获得过中国作协主办的各种文学奖项，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是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些青年作家绝大部分是“知青”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文革”结束后，由于各自的处境和诸多原因，也没有参加已经恢复的大学招生考试。加上当时的成人教育还未完全走上正规化，难以满足这些青年作家渴求学习和提高的需要。武汉大学通过插班生的形式，给这些已经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提供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可谓及时雨，消息传出，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中国作协及所属各地方协会，表示给予全力支持和协助。我们的招生工作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与其他各专业招收插班生的方式不同，中文系作家班招生首先要经过一轮推荐



选拔。推荐选拔的工作由中国作协及所属各地方协会配合进行。先由中国作协和各地方协会向武汉大学推荐若干人选，由武汉大学组织专家、领导审核推荐生员的创作成果及相关材料，确定入学考试资格，经过入学考试后，决定录取与否。

因为推荐的渠道主要是来自中国作协和所属各地方协会，所以选拔工作也是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层次是从中国作协推荐人选中直接选拔，另一个层次则是从各地方协会推荐人选中审核遴选。1985年6月中旬，我和中文系白巖岐同志受命赴中国作协挑选作家班推荐学员。中国作协领导十分重视，记得开会那天，除老作家葛洛因病告假外，其他书记处成员基本上都出席了会议。会上经过认真的讨论筛选，最后确定了20位青年作家作为报考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推荐人选，后来又有4位青年作家——其中两位因为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门类比较特殊，另有两位确有创作成就但年龄却超过了规定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经过讨论研究，也决定列入推荐人选，当时戏称“两特”“两超”，说明我们的遴选工作既有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因而得到了参选作家的广泛认可。这24名作家后来就组成了中文系插班生的第一班，所谓首届作家班，严格意义上说，主要是指这一班的学员。在这一班学员中，获得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奖的计有：陈世旭、水运宪、李斌奎、袁厚春、李延国、朱秀海、熊召政、邵振国等，他们的作品后来大多写进了当代文学史，是新时期各体文学创作的代表。其他作家如晓剑、严婷婷夫妇的“知青”文学和电影文学创作，王英琦的散文创作，罗辰生的儿童文学创作，陈松叶的诗歌创作和王梓夫，文新国的戏剧创作，以及晓宫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高尔品、郑彦英、刘亚舟、胡发云、吴雪脑等的小说创作，都有各自的特点，且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说明这一届作家班的推荐生员确有质量，颇能体现这期间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

中文系插班生第二班的学员因为主要是从各地方作协推荐名单中遴选，地域比较分散，无法一一派员前往，但所有寄达的成果材料，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审核筛选的。湖北作协因为是“近水楼台”，得知信息较早，中文系有些教师对本省青年作家的创作情况



又比较了解，所以推荐和入选的人数相对外省而言，就要多出一些。适逢湖北作协当时主办有一期文学创作讲习班，已经网罗了当时在湖北文学界创作比较活跃的一群青年作家，我们正好“就汤下面”，通过省作协的推荐，这个班的学员就成了我们的主要遴选对象。结果省内外有以下一些青年作家：陈应松、彭兴国（野莽）、周元镐、朱华姿、王伟举、张法德、宋骥弘、曾静平、龚绍东、洪琼、简兆麟、李云贵、吕新琼……成了这个班的第一批学员。外省学员中我记忆较深的有现今在出版界名气很大的周百义，入学考试时取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经查阅报考材料，才知这位青年作家原是河南省潢川县文联主席，自此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班的其他学员因为时间久远，已不能一一记起，但在我的印象中，也都是所在省份各体文学创作的佼佼者。相对于第一班而言，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可能稍逊一筹，但有些学员的创作实力并不在一班之下，如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在文学界影响颇大的陈应松，长期以来，因为各种机遇的原因，似乎未能广为人知，但一经发现，即被叹为奇才。此外，如周百义、彭兴国（野莽）在出版界所创造的业绩和成就，也是有口皆碑。凡此种种，说明这一班学员之中，也堪称藏龙卧虎。

从第二届起，虽然整个插班生的招生程序没有发生改变，但中文系插班生的招收方式，却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简化了由中国作协及所属各地方协会推荐的程序，全部改为自由报名，知名作家、评论家或专家学者个人推荐的方式。而且真正招收有成就的青年作家的作家班（即第一班），此后实际上只持续招收了两届（共三届），第二班则逐渐演变成招收一般意义上的插班生，即基本上是以考试成绩为主录取的学员。我因为不久后即辞去教务处副处长的职务，回系任教，逐渐远离了插班生的招生工作，具体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作家班的培养教育

按照预定计划，作家班理想的培养教育模式应当是以创作为



主，辅以专业知识的教学，而且应当力求结合学员的文学创作实际，以研讨创作和相关文学问题为主，旨在提高学员的文学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平。但是，由于前述原因，作家班学员入学后实际上从一开始便纳入了中文系本科生常规的培养方案。即随堂听课，完成课程作业，参加课程考试，记录成绩，修满学分，撰写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按期毕业。这样的培养教育方案，因为与学员的创作实际脱节，不能有效地回答学员在创作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很难引起学员的兴趣，有时甚至因此与任课教师之间发生龃龉和冲突，这无疑与学员的要求不完全合辙。当然，从理论上讲，创作的提高也不能急功近利，常规的学历教育，旨在加强学员的文学基础和综合文化素质方面的修养，最终自然也于创作有益，但就创办作家班的具体目标而论，完全迁就常规的学历教育，至少未能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当然，就学员一方面来说，并非完全被动地随堂听课，而是在课堂学习之余，仍然坚持各自的文学创作。有的在这期间发表的作品，还获得了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奖和其他各类奖项。比较集中的创作活动，有我参与其事的，是在《芳草》《奔流》《百花园》三家文学杂志上刊发过作家班学员的作品专号，我为这三个作品专号分别写过三篇综合性的评论文章，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推荐作家班的学习成果。从常规的学历教育来说，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社会实践的成果。

如果按照一种较为理想的培养教育模式，对这两个作家班学员的创作，教师和管理部門应当给予更多关注，对他们的创作活动和发表的作品，应当充分利用学校的教学环境组织专门的研讨活动，并将其纳入常规的教学环节。但遗憾的是，因为教师所从事的专业分科较细，与当代创作关系不够直接的专业任课教师，一般都不愿意、也无条件介入学生的创作研讨活动，有关管理部门则基本上是按照常规本科生的培养教育模式，对作家班实施教学管理，结果就难免南辕北辙。这也说明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能仅仅满足于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而是同时还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能够促进这个新生物生长发育的保证措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否则，新



的东西如果被装进了旧的躯壳，也难免要变成旧的东西或不新不旧的东西了。作家班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四、一点花絮

说到这两个作家班的学员，有些场景和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虽然在这之前，我就认识陈应松，但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被武大录取后，临到要报到入学了，却不知他人在哪，我们都很着急。那时候的通信又没有现在便利，只能借助电报和长途电话。我一方面嘱咐有关部门保留他的注册资格，一方面发动大家多方查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他还在江上放排。结果他成了最后报到的一个学员。

新生报到的那天，照例集中在小操场办理各项入学手续。但从安徽来的女作家王英琦突然发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不见了，于是大家帮忙，把行李搬到舞台上，里里外外地找了个底朝天，最后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才算是虚惊一场。王英琦后来似乎始终没改掉这个丢三落四的毛病，这件事至今在她的同学中仍传为笑谈。

因为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对武汉大学来说，这届作家班又属首创，所以在集体的开学典礼之外，又特别为作家班搞了一个入学仪式。记得地点在行政大楼的一会议室，校系两级领导、有关管理人员和教师代表出席，作家班学员中军人较多，那天都是全副戎装，其他学员也都穿戴整齐，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看上去真有他们戏称的“黄埔一期”的气象。

我因为是从中文系调到教务处的，在搞行政工作的同时，还兼有中文系的教学工作，所以与作家班学员的接触就比别人要多一些。加上有许多学员原来都很熟悉，有的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课余他们也常到我家走动，或聊天，或喝酒，情同手足。有时在我那间小书房聊到半夜，回宿舍只好翻墙越门而入。遇上来家寻吃喝的人多了，餐桌坐不下，就里外三层地围站着，照样吃喝得有滋有味。我至今很怀念那段虽然艰苦，但却快活无比的日子，这也是作家班给我带来的人生乐趣。



当然，这么多人组成的集体，又都是一些有个性的作家，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个人私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但这些矛盾、冲突和问题，当时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既没有影响学员之间的团结，也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业。毕业后，他们都顺利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撑起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片天地。有的还担任了各级文联、作协的领导职务，成了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核心力量。

武汉大学创办插班生制和招收首届作家班，已经过去 20 年了。每念及此，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深感这件教育改革的创举，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对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则用得上魏文帝曹丕的那句名言，堪称“不朽之盛事”。

(此文为 2007 年应约而作)

作者系中文系 1977 级校友



百年信管 盛世华章

——从昙华林到珞珈山

方 卿 傅兴荣

2020年，对于武汉来讲，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当人们还沉浸在成功主办“军运会”、喜迎庚子鼠年春节的欣喜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城。一时间，曾经繁华的都市陷入了不安与惶恐之中。然而，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并没有被疫情所吓倒，而是立即行动起来，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奋力抗疫。4月8日，在经历了76天的战疫后，江城迎来初胜，得以“重启”。然而，不幸的是，这场灾难旋即在全球降临，世界又因此陷入停滞。

正是在这样一种凝重的氛围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虽然国内抗疫初胜，人心甫定，但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前景堪忧，“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巨大挑战。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无心院庆，唯有全力以赴，共同抗疫，方为学人本分。原本规划的各种院庆纪念活动，选择了“让路”，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以抗疫实际行动为“院庆”献礼。

疫情期间，我们信管人秉承“智慧与服务”的文华精神，始终坚守岗位，各尽所能，服务抗疫大局。教师们坚守教学一线，停课不停教，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停课不停学，199门课程如期保质保量在线完成教学任务。21位在校在汉干部教师，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与社区“值守”72天，守望相助，服务社区居民。一些离汉干部教师，立足家乡，积极主动参加当地志愿者活动，服务社区抗疫工作。不少干部教师以及院友们，积极奉献爱心，慷慨捐款捐物。一些教师利用自己的所学所长，积极主动开展



抗疫科研，发表抗疫研究论文，提交抗疫咨政研究报告，开设抗疫学术讲座。同学们更是以自己的方式服务抗疫大局，如联合发起“共抗疫情、爱国力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联合开展“共饮一江水，抗疫两院情”“同心抗疫”主题党日活动，发表“同心抗疫，青年有责”致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青年学子的倡议书等。这些行动，为抗疫中的江城增添了一抹亮色，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希望。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们信管人用自己的行动、以这些特别的方式纪念我们的院庆，有一种别样的意义。

阳光总在风雨后，经历劫难的江城终将迎来新生。武汉的重启，意味着生活和工作秩序的逐步恢复。学院的各项工作也将陆续恢复常态。然而，由于前期抗疫工作和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影响，原本规划的系列院庆纪念活动，大多难以按原计划进行，或者改变方式举行，或者推迟，或者取消。如四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场以虚拟会议的形式在网上召开，一场推迟，一场取消。但是，规划中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纪念丛书”如期付梓。丛书包括《世纪华章——信息管理学院教师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辑(上)》《世纪筑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纪念文集》《世纪历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史(1920—2020)》《世纪映像——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画册》《文华图专珍稀史料图录》《文华图专存留文献书目集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校友名录(1920—2020)》共七本。我们谨愿借此机会对学院和学科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要回顾，并向广大院友和关心学院发展的各界朋友简要汇报学院与学科目前的建设和发展成就。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内容多，不足甚至错误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一、从文华图专到武大信管

百年信管，缘起于昙华林，成长壮大在珞珈山。从文华大学的一个专业到独立建制的专科学校再回归到综合性大学的二级建制，从教会大学到私立学校再到公立大学，从专科到本科再到本硕博结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从图书馆学单一学科到“图书情报与数据



科学”学科群。就这样一路走来，从一棵不起眼的幼苗得以跻身科学殿堂。期间的点点滴滴，无不诉说着学院初创、成长与发展历程中的种种艰辛和努力。

学院百年发展历程，粗线条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0—1949年，即从专业的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从文华大学首开图书科，到建设独立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再到抗战“西迁”的坚持与坚守，文华先贤筚路蓝缕，开拓山林，为成就学科之百年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1977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恢复高考这段时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学科专业没有领域上的拓展或规模上的扩张，但其办学性质从私立到公立、从独立建制的专科学校到并入武汉大学的转变，却是学院百年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没有学院性质的改变，没有融入实力雄厚的武汉大学，其后期的发展将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势。1977—2020年，从恢复高考到成立一百周年为第三阶段。这是学院高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学院的学科专业领域大大拓展，规模或体量迅速扩张，办学条件极大改善，学术影响和声誉不断提升。百年信管，业已初步建成具有较大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科和学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百年信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正是一代代信管人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的结果，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讲话的精神。百年信管之盛世华章，正是一代代信管人亲手谱写而出的！

以下是百年信管发展历程中学院建制演变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1920年3月，美籍学者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和中国学者沈祖荣先生、胡庆生先生等，于武昌县华林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开启我国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之先河。

1924年，文华大学改组为华中大学。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随之更名为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

1927年夏，华中大学停办，文华图书科单独继续办学。1929



年，文华图书科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董会”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立案申请，同年8月获准立案。1929年9月，华中大学复办，文华图书科仍为华中大学之一科。1930年6月，校董事会决议，“本校已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为办事便利起见，应行独立”。同年12月，正式启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印章，并于1931年正式脱离华中大学，成为一所独立的图书馆专科学校。

1938年秋，为避战乱西迁重庆。1947年，抗战胜利后回迁武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8月，政府接管了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改私立为公立。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相应更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1953年8月，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正式并入武汉大学，迁入武昌珞珈山，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图书馆学专修科改制为图书馆学系。1966—1971年，因“文化大革命”停办。1972年恢复办学，学制改为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学制恢复为四年。1984年，经原教育部批准，成立图书情报学院。1999年，图书情报学院与新闻学院及中文系编辑学专业合并，更名为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2000年，新武汉大学成立，原新闻学院被剥离，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加盟，学院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

二、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

百年信管，源于文华图专初创时的图书馆学专科，期间学科专业领域逐步拓展，至今已发展成为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为主体，同时涵盖“管理科学与工程”和“新闻传播学”部分二级学科的“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群。学院的学科领域和人才培养范围已大大拓宽，学科影响也不再限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

目前，学院现有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编



辑出版学、电子商务和数字出版 6 个本科专业；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出版发行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保密管理和数据科学 9 个科学学位硕士点；图书情报硕士、出版硕士、工程硕士和工程管理硕士 4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出版发行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和数据科学 8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学科建设是高校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建设一流的学科，才能建设一流的学校和学院。信管百年，正是一部以图书馆学为起点和核心的“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建设史。学院的“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群，不仅是图书馆学自然发展、开枝散叶的结果，更是一代代信管人以图书馆学为核心、为起点，守正出新，开疆拓土的必然产物。曾经名噪一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落下一个“关张”的结果，恰好从反面印证了百年信管学科建设的成就。正是百年来一代代信管人应时代变化与社会需求，对图书馆学学科内涵的深挖和外延的拓展，武大信管才得以傲立学科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成就学科伟业，谱写盛世华章。

以下是百年信管发展历程中各学科专业建立与发展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图书馆学：1920 年，武昌文华大学开设图书科，仿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办学制度，招收大学毕业和肄业学生学习图书馆学；1956 年，升格为本科；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2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5 年，获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情报学：1978 年，开设科技情报学本科专业，后更名为情报学专业，本科层次现名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1980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1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档案学：1934 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席；1940 年，开设档案管理科；1984 年，重建档案学本科专业；199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5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其中，20世纪90年代，在图书馆学专业曾招收过档案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编辑出版学：1983年，开设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后更名为编辑出版学；2002年，正式招收出版发行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12年，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其中，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学专业陆续在“文献与出版”“现代出版”和“出版发行学”等方向招收编辑出版发行学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电子商务：2001年，开设本科专业；2006年，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保密管理：2016年，组建武汉大学国家保密学院，挂靠信息管理学院。同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信息资源管理：2002年，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数据科学：2019年，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2004年，开始招收工程硕士和工程管理硕士(软件工程方向)研究生；2010年，开始招收图书情报硕士和出版硕士研究生。

三、从默默无闻到荣誉加身

百年信管，从一株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学院的声誉或口碑，获得学界及社会的广泛认同，学院和学科也因此获得了无数荣誉。这些年来，学院主流学科在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计划等国家高等教育重大建设战略工程或计划、教育部学科评估、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教育部“双一流”计划、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奖励计划以及各级各类人才支持计划中，均有上佳表现，取得不俗成绩，可谓“从默默无闻到荣誉加身”。

学院主流学科连续入选国家高等教育重大建设战略工程或计划。1995年，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入选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入选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19年，学院“图书情报与数据科



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计划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入选这些重大战略工程或计划，既是促进学院和学科更好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对学院和学科建设的重视与肯定。

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所组织的四轮学科评估中，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2001年、2006年和2012年的前三轮学科评估中，学科排名均为全国第一；2016年第四轮评估结果为A+学科。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涵盖“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大一级指标，是学科综合实力的全面反映。连续四次获得理想的骄人成绩，表明我们的学院和学科建设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成效显著。2002年，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学科同时被评为国家二级学科重点学科。2006年，国家增设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学院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被认定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入选国家重点学科，是对学院和学科教学与科研实力的最好诠释或印证。

学院在教育部“双万计划”建设中旗开得胜。2019年，图书馆学和编辑出版学两个本科专业，双双入选首轮国家级“双万计划”本科专业建设点。“双万计划”，也称“双一流”计划，是教育部以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为目标，实施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计划。入选“双万计划”，是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见证。

学院在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励评选中都有不俗表现，曾多次斩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和一等奖、“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在内的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励数百项。高水平教学与科



研成果奖励，无疑是学院和学科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最好反映。

学院教师中 30 多人先后入选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其中，国家级教学名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万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18 人次，省部级人才称号获得者 20 人次。一流的师资，既是保证学院和学科高水平发展的关键资源，同时也是学院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见证。

百年信管，桃李芬芳。数以万计的信管学子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为学院和学科带来了无限荣光。武大信管学子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全国，而且在全球；不仅在本行业，而且在更广阔的领域；不仅在业界、学界，而且在政界、商界。学子们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入学时的豪迈誓言：“今天我为你骄傲，明天你为我自豪。”

学院和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相关部门和产业界的肯定和认同，不少单位因此为学院发展给予无私的支持。1983 年，国家科委支持学院建设经费 140 万元以及学院办公大楼建设用地指标和部分建材。同年，新华书店总店无偿捐赠学院建设经费超过 287 万元。2013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三新书业、安徽时代出版发行有限公司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等出版单位无偿捐赠学院建设和发展经费 700 余万元。2016 年，武汉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余宝琳董事长无偿捐赠学院建设经费 500 万元。这些无私的支持，是建立在对学科和学院发展的肯定和认同基础之上的，自然也是武大信管所获得的宝贵荣誉。

学院和学科的国际影响和声誉不断提升。学院是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s)首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会员单位、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国际成员单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联、美国图书馆协会等国际组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丹麦、日本等 10 余个国家(地区)的信息管理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学院的国际交流频繁，近几年来，学院每年出访和来访教师或科研人员不低于 50 人次。其中，学院曾两次承办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即“全球顶级信



息管理学院联盟年会 iConference 2017”和 ACM/IEEE“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年会 JCDL 2020”。这两类学术年会，均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高校主办。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主办，很好地展示了学院的国际形象，扩大了学院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了学院的学术声誉，在全球产生了非常好的学术影响。学院教师中，有国际学术期刊编委 6 人，同行评审专家 13 人。在 2020 年 QS 全球学科排名中，我校“图书馆与信息管理学”学科位列全球 35 位，是入围 50 强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高校之一，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名。

四、一点感悟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科建设更是百年大计，需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没有一代代信管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武大信管也难以成就今天的影响和声誉。图书馆学，本乃西来之学，在西方也仅是一个小众领域，影响也相对有限。然而，我们武大信管人却能将之发扬光大，守正出新，在小领域做成大学问。

图书馆学进入我国的初期，文华学人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结合我国传统的文献、版本、目录、档案之学，建构本土化的学科体系，给这门西来之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也充分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这应该是图书馆学进入中国且得到绵延发展和不断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图书馆学科的影响初露端倪。当时的图书馆学系和图书情报学院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契机，及时增设学科专业，拓展学科范畴，重构学科体系。学科得以从单一图书馆学发展到更具生命力的图书情报学。这可以看作百年信管历史上的一次“华丽”转身。没有这一次转型，很难有学科今天的发展。

世纪之交，西方图书情报学院纷纷改走技术路线，学科更名、专业调整、内容重建、课程重构，图书情报学科危机四伏，甚至面临存亡危机。正是在这种极端背景下，学院完成了从“图书情报学”到“信息管理学”的“惊险一跃”，跳出了危机，为学院开拓了更



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进入 21 世纪，新一代信管人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同心协力，将学院和学科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初步实现了在“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这一更大更高的学科平台上的更好发展。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广大信管人的不懈努力，武大信管的明天将会更好！

方卿为信息管理学院 1983 级校友，傅兴荣为物理系 1983 级校友。



珞珈山十八栋的前世今生

涂上飙

珞珈山上的“十八栋”，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将其发展历史展现出来，十分必要。

一、“十八栋”的产生

1. 修建“十八栋”的缘由

在珞珈山上修建“十八栋”，是缘于大学发展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批有现代意义的大学逐步产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急需建立一批新的大学。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国的学术重心开始逐步南移，于是江浙及长江流域的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得到迅速发展。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国立武汉大学作为中部的一所重点大学，要想得到顺利发展，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当时有大批人才南移(如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李四光、皮宗石、刘永济等)，其原因除了国民政府大力支持长江流域大学的发展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东北华北受到日本的侵略已无法潜心学术。武汉大学如何才能获得和留住这些人才？当时学校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筑巢引凤”。学校决定在珞珈山的东南面修建“十八栋”别墅，以引进一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2. “十八栋”的修建

“十八栋”别墅在学校的第一期建设工程中完成。1930年11月开工，1931年9月竣工，建筑面积7067平方米，砖木结构，层数2层或3层，层高2.7~3.0米，造价28.27万元，单价每平方米40元。包括8个单栋和10个双栋，可住28户人家，1932年年初正式投入使用。



第一教職員住宅區

1931年年底在珞珈山东南坡落成的第一教职员住宅区(一区“十八栋”)

1933年学校开始第二期建设工程，又续建了1个双栋和2个单栋，扩充为21栋32户，但在习惯上仍一直号称为一区“十八栋”。后续几栋1933年开工，建筑面积972平方米，砖木结构，层数2层，层高2.7~3.0米，造价3.89万元。

3. “十八栋”的编号

关于“十八栋”的编号，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最初的编号，21栋的编号是从301~332号，从最东边一栋开始排号，总体由东往西排，再由南向北具体编号。1935年的编号是：

301 皮宗石(现在的8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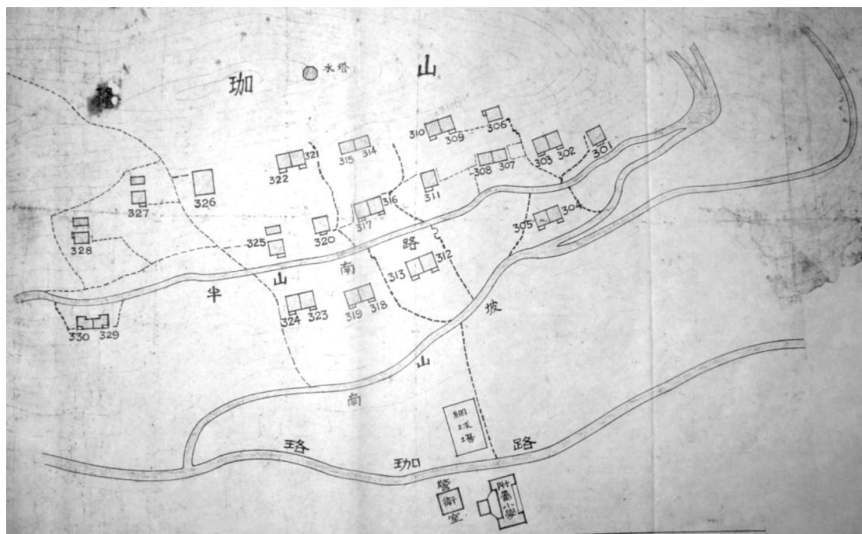
302 吴维清(现在的9栋左边，面朝马路，下同)；



- 303 余炽昌(现在的9栋右边);
- 304 李儒勉(现在的7栋左边);
- 305 陶延桥(现在的7栋右边);
- 306 汤璪真(现在的21栋);
- 307 刘秉麟(现在的10栋左边);
- 308 汤佩松(现在的10栋右边);
- 309 刘永济(现在的20栋左边);
- 310 黄叔寅(现在的20栋右边);
- 311 周鲠生(现在的11栋);
- 312 高翰(现在的6栋左边);
- 313 缪恩钊(现在的6栋右边);
- 314 陶天南(现在的19栋左边,后面周恩来在此住过);
(没有315号的居住记载);
- 316 徐天闵(现在的12栋左边,黄琪翔曾经在此居住);
- 317 张有桐(现在的12栋右边,郭沫若曾经在此居住);
- 318 蒋思道(现在的5栋左边);
- 319 郭霖(现在的5栋右边);
- 320 叶雅各(现在的13栋);
- 321 丁燮和(现在的18栋,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三位校长
在此居住过);
- 322 刘正经(现在的18栋右边);
- 323 钟心焯(现在的4栋左边);
- 324 陶因(现在的4栋右边);
- 325 邵逸周(现在的14栋);
- 326 王星拱(现在的17栋);
(没有327号的居住记载,现在的16栋);
- 328 葛扬焕(现在命名的15栋,实体已经不在);
- 329 查谦(现在的2栋左边);
- 330 陈源(现在的2栋右边);
- 331 朱祖晦(现在的3栋);
- 332 杨端六(现在的1栋)。



上述以3为头的住宅编号与现在命名的栋数的连接，主要是依据下面的图进行推测，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21栋里面有20栋是能够对上的，18栋是有出入的。



1933年以3为头编号的第一教职员住宅区

为什么编号前是“3”，目前没有查到依据，估计是在珞珈山上的意思。当时学校3000多亩地，规划为十个区。二区、三区及四区都有教师住房，相对来说都在山下，只有一区的房子在山上。

二是在现在的编号之前，还出现过一种编号（主要用于计划经济时代），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它是按一区从1号编到32号。郭沫若曾经住过的那一栋门牌号编为20号（叫一区20号），周恩来曾经住过的那一栋门牌号编为27号（叫一区27号）。

三是现在的编号。它叫栋，即1~21栋。实际上只有20栋，第15栋目前没有实体。其分布在半山南路下面从西南向东北编号有1~7栋；在半山南路上从东北向西南分布的是8~14栋；再由西南向东北向山顶分布的是15~21栋。依山分布的20栋，呈一个“之”字形走向。



4. 20世纪30—40年代住过“十八栋”的人

20世纪30—40年代，在“十八栋”里面住过的人，目前能够明确的：

1935年的文献记载有皮宗石、吴维清、余炽昌、李儒勉、陶延桥、汤璨真、刘秉麟、汤佩松、刘永济、黄叔寅、周鲠生、高翰、缪恩钊、陶天南、徐天闵、张有桐、蒋思道、郭霖、叶雅各、丁燮和、刘正经、钟心焯、陶因、邵逸周、王星拱、葛扬焕、查谦、陈源、朱祖晦、杨端六。

2001年档案馆在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曾经请在“十八栋”里面住过的皮公亮、查全性两位先生回忆过一个名单。他们回忆的名单中除了上面的一些人以外，还有范寿康、刘迺诚、席鲁思、方重、陈鼎铭、吴于廑、刘秉麟、方壮猷、袁昌英、陈华癸、周如松、王世杰、许宗岳、凌叔华、桂质廷、高尚荫、胡稼胎。

按现在的栋来划分，第1栋住过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第2栋住过朱祖晦、刘迺诚、刘永济和陈源、凌叔华夫妇；第3栋住过查谦、桂质廷；第4栋住过范寿康、陶因、刘迺诚、钟心焯；第5栋住过郭霖、蒋思道；第6栋住过缪恩钊、高翰；第7栋住过陶延桥、李儒勉；第8栋住过王星拱、皮宗石、刘正经；第9栋住过查谦、余炽昌、吴维清、席鲁思；第10栋住过汤佩松、方重、陈鼎铭、吴于廑、刘秉麟；第11栋住过周鲠生、刘秉麟；第12栋住过徐天闵、张有桐、方壮猷；第13栋住过叶雅各；第14栋住过邵逸周；第15栋住过高尚荫；第16栋住过皮宗石、葛扬焕；第17栋住过杨端六、袁昌英夫妇，陈华癸、周如松夫妇；第18栋住过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第19、20栋住过周恩来、汤璨真、黄叔寅、刘永济、胡稼胎；第21栋则住过许宗岳。

5. “十八栋”的优越生活

十八栋的生活条件非常舒适优越。尤其在20世纪30—40年代多灾多难的中国，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十八栋的每一户是假四层楼。一楼是厨房和佣人室，二楼是饭



厅、客厅和书房，三楼是卧室、洗手间(配有抽水马桶)，四楼是储藏室。电话、冰柜等一应俱全。厨房的炉灶烧白煤，炉膛有盘状水管，可以为三楼洗浴间提供热水。

十八栋的教授薪水都比较高，薪俸分为九级，分别为 500、475、450、425、400、375、350、325、300 元(1935 年以前是大洋，以后为法币)，级差 25 元。校长薪俸最高 600 元，后涨到 680 元。每家一般都会请佣人，相对阔绰的家庭会请一个男工一个女工。女工是保姆，负责清洁卫生；男工是厨师，负责做饭、买东西及重体力活。若设家宴，会请粮道街的魁星楼酒店的厨师送菜肴配料等。如果准备西式茶点，会请汉口合昌西点铺的人送货过来。

当时为了通行的方便，在第一排(1~7 栋)和第二排(8~14 栋)之间，有一条可行驶车辆的山路叫半山南路。“十八栋”距离学校教学区步行至少需要三十分钟，学校为了方便教授们上下班，专门开通了从半山南路至教学区定时往返的交通车。平时，十八栋的教授们完成了一天的教学科研任务后，会在半山南路散步。查全性先生回忆说，有的教授爱到磨山打猎，那里有鹿子和野鸡，叶雅各教



周鯁生教授与长女周如松在家门前留影